我们到底要什么

"三农"问题专家

CCTV 2003 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之一

温铁军 著

53
2

. 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九亿农民就像是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而温铁军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吴敬琏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带有反思性质的国内外经济问题论文集。作者的主要贡献在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重新解释我国在近现代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其内在规律。作者不仅关注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和战略问题，还把批判矛头指向90年代以来横扫神州的史无前例的“赶超”。尽管中国多次承诺要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但直到进入21世纪，各地政府官员们认同的目标仍然是“世界工厂”，尤其是不计代价地跑步加入全球化以后，发展的思路更加集中在如何跨越式高增长和创造GDP高速度上；这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界人口大国、资源小国将继续着殃及子孙的“饮鸩止渴”，当然会导致更多的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和更大程度的被国际金融资本剥夺。

也许，这一切都只是迫不得已，难道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当大多数人热衷按照西方勾勒的现代化模式亦步亦趋的时候，作者却在扪心自问：作为跨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到底要什么……

策划　刘海英　李雪飞
责编　李雪飞

封面設計　鐵路DESIGN

ISBN 7-5080-3467-8　　定价：29.00 元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504022
F12-53
W622

温铁军 著

F12-53
W622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藏书

"三农"问题专家
CCTV 2003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之一

我们到底要什么

華夏出版社

6504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到底要什么？/温铁军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4
ISBN 7－5080－3467－8

Ⅰ.我…　Ⅱ.温…　Ⅲ.国情问题－研究－中国　Ⅳ.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9301号

我们到底要什么？
温铁军　著

策　　划：刘海英　李雪飞
责任编辑：李雪飞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4年5月北京第1版
200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1/16开
字　　数：180千字
插　　页：2
定　　价：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温铁军，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经济管理学博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有11年的“工农兵”和11年的“农村试验区”经历；因性喜“周游列国”，长期坚持“用脚做学问”，经100位著名学者和记者投票推举为2003年度“最具影响力”的CCTV中国十大经济人物之一，是其中惟一的学者。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担任过多项国家课题的主持人，从事过联合国、欧盟、APEC/PECC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合作项目，20年来已在近40个国家进行过调研和交流，近年来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比较研究。

他不仅以“三农”问题研究见长，而且是一位实践者。2002年7月他和同事们创刊了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次年7月又应农民要求在河北定州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他自称，这些都只不过是继承上个世纪先贤思想的“改良主义”做法。

主要研究方向：国情与增长，乡镇企业与城镇化，政治体制与税费改革等问题。主要著作有：《认识与实践的对话》、《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等。

我们到底要什么?

序　言*

近年来，理论界关于如何认识"全球化"问题讨论多多，并且在决策上亦有所反映。从报刊上可以知道，世纪之交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三大趋势：全球化、跨国公司、科技进步，并认为这些趋势不可逆。可见，我们基本上已经摸准了、接受了西方放在河里的那块石头，但这是否意味着在新世纪开端，中国已经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有些提法特别需要重视。**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同**。这两个概念应该有本质区别：前者是指世界范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应该包容任何一个国家；后者则意味着世界按照某种制度和标准被整合进一个体系。很多人都以为，中国追求现代化就得按照美国主导的方向被整合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已经别无选择，现在领导人决策是"打左灯，向右转"，实际上搞的也是全盘美国化。这种看法实在大谬不然。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领导人还从来没有承诺过中国要纳入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尽管中国在加入 WTO 的谈判中做了一些让步来换得经济"全球化"的人场券。

即使排除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就从中国的国情制约来说，我们也没有追求美国式现代化的条件。**中国不可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赶超目标**。这个观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不可思议：难道要让我们中国人放弃追求现代化的希望吗？

对于中国这样世界上惟一保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自己应该明白到底要什么。现在的人们似乎迫不及待地要进入 21 世纪，节奏快得连世纪末这一年都想略去不计了，因此

---

* 本文原载《天涯》杂志 2004 年第 4 期。

似乎没有人需要反省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思想历程。也许因为我近年来突然从繁忙转为"赋闲"，所以还有时间停留在世纪末的研究和思考之中。一百年来，很多事情确实值得认真反思。我们不妨先从近代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和当代史上的"文化大革命"谈起，因为这两次都提出过"批孔"的口号。

一、在两次"批孔"中认同西方符号体系

中国追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过程一直伴随着痛苦的自我文化批判、自我思想革命。在世纪之初的资产阶级文化革命性质的新文化运动中，不仅改变了中国自己的语言规范，彻底地照搬了英语语法这种语言符号的使用规则，建立了"现代汉语"语法，而且还开始从"师从苏俄"中找到了革命道路。

那次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殿"，是在积弱不振的中国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危机之下，迫于内忧外患，知识分子发出的呐喊，认为传统文化制约发展，要科学要民主，就必然彻底要与儒学决裂。那时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甚至提出"全盘西化"（后来又改称为与当今"全球化"提法颇为相似的"充分世界化"）的口号，这与清朝统治阶级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相比，是有进步意义的。但21世纪再看那个提法却是幼稚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全盘西化"其实只能是"邯郸学步"。

无独有偶，后来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在国家初步工业化进展困难、资本原始积累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时**候，一方面提出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另一方面又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似乎贯彻了不破不立的辩证思想：在打倒延续传统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以群体为基因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全面继承了产生于西方工业化进程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对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孔”运动人们有更多的解释，但从客观效果上看，**这两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目标趋同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都为中国全面认同西方符号体系，或者服从西方的话语霸权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就中国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经济背景而言，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以群体为本的，是中国特色的原始灌溉农业文明这种必须以群体生产为基因的社会的文化表现。孔夫子的“仁学”强调“仁者，二人也”，不是西方理论强调的个人主义或个人利益最大化。

西方以个体为基因的文化根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狩猎和采集文明，那种生存方式可以突出个体。这与中国自“神农尝百草”就发展起来的原始农业，必须共同使用黄河水系灌溉，同时又得联合起来抗洪的生存方式根本不同。后来西方工业化原始积累是海盗掠夺、“圈地运动”和殖民战争。所谓“开发新大陆”，就是把大部分土著杀光，掠夺占有别人的资源。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就争夺开发海洋资源、南北极资源；然后是太空、外太空资源。

如果说，**西方在工业化期间只是以传统的手段争夺传统的空间的话，那么，近代新增加的手段则是争夺符号资源**，由传统的争夺物化资源转化为控制符号资源。有的学者指出，广义的符号资源包括所有在人类信息交换中形成的规则和软件体系，包括所有的标准，比如 ISO 质量认证体系和相应的制度体系等。也有的学者认为，符号体系包括最基本的“话语体系”，符号体系的控制从人类开拓非物质资源的时候进入到空间体系、高科技体系乃至于话语体系。还有的人认为，当前关于知识产权的范围界定有利于发达国家，计算机软件的所有符号系统也是由西方控制的。各种对发展中国家侵犯知识产权的制裁和引起的争端表明，**符号的发明权、制度的创制权和体系的控制权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霸权**。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不带任何批评地全部继承了西

方思想和规则。但从客观上看，我们过去确实没有机会对同样来自西方的“批判的武器”开展“武器的批判”。因此，除了战争年代在血的教训中对“本本主义”的批判和整风确实值得借鉴之外，其他时期即使有批评，也难免偏颇。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用了一个世纪才亦步亦趋地从邯郸学步蹒跚到现在的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下一步过河时，前面的石头就是西方规定的新符号规则。如果不按照这个标准就非掉河里不可，那该怎么走？因此，近年来部分态度严肃的知识分子才似乎更加困惑，尤其与那些庸俗的趋炎附势者不同的是，他们在反思中的分化和重组也加剧了。这就是所谓“新左派”、“新保守”、“中左”和“中右”等各种理论派别逐渐形成，并且纷纷从信奉斯大林主义的老左派和跟从西方自由主义的新右派中分化出来的原因。

二、强调制度变迁，需要以史为鉴

要深刻认识当前全球化的问题，就有必要以史为鉴。

20 世纪历经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类性质不同的政府，但这三种不同的政府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追求西方式的工业化；不过有的被迫，有的主动。

满清以列强为师的工业化失败了；接着是民国以英美为师，大局甫定即开始追求官僚资本主导的工业化也失败了；再后来，新中国以苏联为师，朝鲜战争硝烟未散，就开始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这次相对成功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代价当然不小*。现在又提出以英美为师。看来人们真是有必要好好回顾一下 20 世纪这一百年的历史，否则搞不清楚现实。

满清 19 世纪末期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时还不打算接受其话语体系，只想借助其个别“奇技淫巧”。可是 19 世

* 本书收入的“新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成本和收益’”（原载《99 独白》第 3 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年版）对所谓“代价”有详细分析。

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被人打得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一个甲午战争，日本人所得到的战争赔款加上"赎辽费"共计2.3亿两白银，是它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是中国17年的海关税收。就等于说，即使在双方平等的条件下，日本可坐地超越中国4年。再加上17年中国政府没有关税收入，也就更没有能力投资于工业化。实际上，这一次战争就使日本在工业化上超前了中国15～20年。接着，1900年的庚子事变又给八国联军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相当于满清政府约38年的关税收入）。前后两者相加与初步工业化的日本相比，就得落后30～50年，更何况西方那些早期工业化国家。

就是在这种"落后——挨打，越挨打——越落后"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发出"打倒孔家殿"的最后吼声，这既是迫于国势衰亡的无奈，又是**客观上对民国建立初期为列强控制的军阀政府适应国际环境而重新结构话语体系的无奈**。是的，中国人就这样被迫接受了西方话语体系，否则，中国怎么进步呢？

其实，在民国建立之前，由**清朝政府推进的戊戌维新已经在强调兴修铁路、开通邮电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提出了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学等教育体制改革**。因此，如果我们不刻意重视朝代更替，就应该注意到那个时代清朝政府实际措施的采取以及随后的民国初期知识界"打倒孔家殿"、"实行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上，这两者不仅在原因上是相连系的，而且在内容上也是相类似的。那么，**一百年前政府和知识分子这种"默契"递进的结果**是什么呢？

首先，过去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靠的是**科考取仕制度**，这**个制度内含着非常重要的且具有双重功能的社会稳定机制**。我不知道现在学校的历史课还讲不讲这种机制。一是**断绝了这种科考取仕的晋升体制，意味着农村小知识分子永远改变不了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农民身份**。没有科考，不安分的小知识分子就将和造反起家的农民（如鲁智深、李逵之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小知识分子的加入，是农民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二是

封建皇帝利用科考制度可以建立起维护政权的"清道夫"队伍。你想，那些"锥刺骨"、"发悬梁"，"囊萤映雪"、"十年寒窗"的农民青年一旦考上了，满脑子就只剩下"圣贤之道"了。经过皇帝殿试，面对面地了解这种人"傻"的程度，赐给一柄上方宝剑，出去当"巡案"微服私访，其实就是做"中央调研员"。有群众告状，"傻"巡案调查属实，不管这个官员是否对发展地方经济有政绩，是否有皇亲国戚的背景，该罢免就罢免，该杀的就拔出上方宝剑。当然，如果巡案杀不了地方官员反而被人家干掉了，那也给了皇帝一个警告信号：这个地方已经"尾大不掉"了！皇帝就得借茬杀这个地方官员。于是，这个官员就可能"调京候旨"，弄得好给个虚职，如户部"员外郎"之类，差的就只能"候补"了，再派出特务盯梢密报，看京里谁跟他近乎。这些官员对大权旁落当然不满，吟诗作赋之间难免有所表现，于是也就有了"文字狱"之类的戏。这样，虽然有些冤假错案，但至少这个科举制度起到了为保皇权、反腐败、建立"清道夫"机制的作用。

如果可以与现代的"应试教育"作比较，人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在拔擢底层小知识分子的功能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今天的"应试教育"没有反腐败、建立"清道夫"机制的作用罢了。

其次，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口岸后，连内河港口都强迫开放了。在这以前，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是靠广东九龙一个口岸出口的，需要成千上万的运输从业者，恰恰给那些贫苦的或者破产的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那时很多帮会组织就是以这些脱离氏族传统村社控制的无助的农村游民（现在被报刊叫做"盲流"或"流动打工人口"）为基础组成和发展起来的。农村资源短缺，大量农民少地、无地，又属于低素质劳动力，至少当"脚夫"还能养家糊口，否则只能偷盗或为匪徒。而很多口岸的一下子开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劳动者失业。

历史经验表明：**只要这部分最有组织的行会性质的流氓无产阶级和不可能再改变自己命运的小知识分子有条件结合，造**

反就有成功的可能。所以，20世纪初叶就是这种条件具备之后的农民革命端掉了满清王朝。

至于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不仅当时没有几个人了解，实践中也不断失败，不得不改变为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动员旗帜。后来导致列强控制的军阀政府割据，并且在这种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打倒孔家殿”的激烈口号，则客观上起到了与西方话语体系接轨的作用。

今天的人们也许可以这样考虑：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在本质上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弱势政府在被迫对外开放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过程中的崩溃。实际情况如上文：革命的主体是那些被废除科举制度断绝了出路、不能再靠孔孟之道改变自己阶级地位和平民身份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加上那些以流民为主体的最有组织的帮会。流民在多口通商后被断绝了生计，再加上旧中国军队相当部分是流民成分，而流民又是由帮会控制的，因此造成了革命党和帮会的结合，然后革命党利用帮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严密的封建性质的组织系统起事。孙中山的所谓“民主革命”无论理论上如何民主，实际上只能利用这两种势力。革命发生后军阀窃取权力，各地被分割控制，则又给帝国主义列强以可乘之机。不仅如此，其实一百年来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几乎没有资产阶级的中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可能成功。

这就是我看到的中华民族的悲剧性的近代历史。

三、在“两个11年”的实践中形成观点

中国到底要什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到底要什么？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每天的舆论导向宣传的都是些成功人士，好像现在的“大款”成为社会主流，老百姓要是不像他们那样好像就白活了似的？许多人做出各

种努力想成为“大款”，但是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而且在追求的过程中是很痛苦的。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要么苦恼要么心烦。他们唱“我让青春闪了一下腰”，其实是让“现世”闪了一下腰。因为他们即便再怎么努力追求，也达不到饕餮趋向的舆论展示给他们的那种现代化生活，尤其是农村青年。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发展经济所依据的理论体系该怎样建立？这是很难简单答复的问题。在学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服从于改革前30年的国家垄断体制需求的，这套理论体系是非常牢固的。而新一代的学者大部分受西学影响，与传统的理论体系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要想在两个不一致体系的边缘立足很难。毛泽东曾说过“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但目前作为什么性质的“毛”要附在什么“皮”上生存，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皮”？这些问题是很难考量的。

这样说当然包括我自己。我的思想形成于“两个11年”：从1968年插队开始到1979年考上大学之前，我曾有过11年的基层工农兵的生活经历；在1983年大学毕业后18年的政策调研经历中，又有11年是下基层搞农村改革试验区。这两个11年对我的思想形成确实有决定作用，因为恰恰是长期基层实践经历终于把我这根毛安到普通老百姓那张皮上了。这种基本立场和观点可以从我收入本书的这些不断引起争议的文章中反映出来。

1988年，在我自己开始形成思想的时候，曾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危机论”，那是我第一次发出有影响的文章。当时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是符合周期理论的，应该用周期理论来分析建国以来直至8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周期。那年8月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即引来了很多的批评。因为那时候传统理论还占优势，因而主要的批评是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根本不存在危机周期。尽管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的，但也

被认为是不对的。

1991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在80年代提出的观点，1992年回来后陆续发表了“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宏观波动与发展”、“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等一系列引起讨论的文章，大多数是《中国软科学》、《战略与管理》等刊物发表或《新华文摘》转载的。这些文章都明确提出，**国家资本是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国有经济改革应该通过还原劳动者剩余价值来形成初始产权**。这时候，学术界已经是西方理论占绝对优势了。可能是由于现代的西方没有剩余价值问题，于是已经西化的理论主流又有一些批评，因为那种否认剩余价值理论而不承认中国劳动者产权的观点占多数。

这些不同的批评基本上是从不同的理论规范出发的，本来都是搞理论研究的人的立身之本，既然关系人家的饭碗，当然无可厚非。好在我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1987～1998年这11年间，我下基层去搞社会科学“试验”。理论界从事规范研究的朋友观点不同可以互相对立，但无论什么派别，都还能够接受或者容忍我的观点。其原因大概也是我一向不从理论规范出发，多年来埋头基层，不介入理论界的争论，认定自己只是个搞试验的。**我这个“试验员”所能够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直接从实践中提取感性认识。这些认识尽管与规范研究不同，但如果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我所形成的观点就是有深厚的本土化研究基础的。**

进行科学研究不外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前人的经验加以分析、比较，再去验证它；另一种是试验法，即把某些观点、思想经过一个试验的过程来证明对错。到现在为止，我认为社会科学中法学、广告学、商品学都可以用试验方法，但它们都是一种小范围的对比组试验，比如，法学试验可以用一个“单面镜”来观察接受试验的对象。经济科学很少能够使用试验方法。

我们搞农村试验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意义就是把自然科学的试验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当然，这需要大量调查研究，从最基本的理论范畴的重新界定开始，逐步认识不同范畴之间的本质相关联系，才有可能形成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基本概念。只有通过这样不厌其烦的工作，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把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本土化"。

当然，从一开始就有人说，我们搞这种试验不过是为了验证政府的政策有多么正确，但官方搞试验是很难发现真问题和反映真情况的。其实这要看试验者本身，看从事具体项目的操作人员的敬业态度。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学者，除了秉承上级的旨意来进行某种分析外，还是可以在试验中做很多科学研究工作的。我并不是标榜自己属于这样严肃的学者，但我确实在做这件事上一直是很认真的。进行试验中我得罪了不少人，也有些同事、朋友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试验结果，甚至有时候被领导批评。当今官场风气是"报喜得喜，报忧得忧"，按照经济学的"理性"，我们中有的人即使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这种坚持**"报忧得忧"的人，良心上也是"利益最大化"的。因为即使得到些批评，也是有益于心智的。从这个角度看人生，我觉得心平气和。**

我们这种试验涉及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试验中得出的结果也不是只适用于农村。

例如，很多人相信中国只有搞私有化才有出路，我开始也抱着能搞的观点去试验，在这个领域得出的结果是：至少农村土地这个中国现在最大的资产还没有条件私有化，政策上只能继续强调"稳定集体所有制"。因为，在试验进程中我们认识到农村不具备私有化的前提：由于政府不可能对 9 亿农村人口提

---

* 农村试验区是从 1986～1987 年开始的。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动员了 10 个省的农村政策部门，把一些关乎农村中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转变成不同试验项目，分别在不同的地区进行试验。不久就发展到 11 个省；11 年后已经有 2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164 个县市加入了试验区的行列。

供社会保障，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有能力为中国这种大量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建立社会保障。所以，**农村耕地承担了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因此，国家向村社集体让渡土地所有权的条件是由集体承担对农民的基本保障。除非有一天政府能像对城里人那样，把农民的医疗、就业、保险、教育等问题解决了，那么农业也就可以完全商品化了，那时农地也许有条件私有化了。**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认识到：**农村经济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模式来形成制度，因为“交易费用”太高**：农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资源少，农户家庭经营的农产品除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外，能作为剩余投入市场的数量按人均计算就很有限。因此，小农作为这样一种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的行为主体，其有限的、高度分散的剩余并不能完全被市场左右。再加上农业生产又是一个自然性很强的过程，连保险公司搞农业保险都不合算，所以农民有限的剩余又必须用来防天灾人祸。农民要自我积累，要积粮备荒，可以进入市场的部分就越益有限。

可见，无论何种主体，如果直接与亿万小农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都会由于交易对象的数量巨大且分散，而每个交易额又细小，必然出现交易成本高到无法交易的问题。

总之，**覆盖中国70%人口的这种小农经济对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形成的制约是根本性的。**当然，也许谁有本事像欧洲那样，通过殖民掠夺把矛盾转移出去。主张中国全面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人也许愿意考虑这样的前提：有一天，中国突然得到一个机会，要么占领某个比自己本土还大的“新大陆”，要么寄希望于彻底实现“市场自由”，通过劳动力市场“全球一体化”，把过剩劳动力连同其赡养人口一起迁移出去……。

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一个接一个，历史上革命的主体都是农民，革命发生的原因中几乎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那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根本矛盾，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我称之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这个分

析很多人都做过，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大规模的战争都表明了这一点：表面上看是发生了天灾或者个别事件导致了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些事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人口与资源的严重不匹配；而且是那个社会坚持少数人占有更多资源的制度。**

很多人对我的说法提出过质问，因为至少中国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远远高于日本。其实简单提出这种比例关系是有问题的：

第一，日本全国人口与耕地面积之比显得很低，但实际上日本的农业人口与耕地面积之比高于中国3倍，因为日本的实际务农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不足5%，而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所以说，拿一个国家的人口和耕地资源来比，日本比我们要低，台湾、香港、新加坡也是如此，但它们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

第二，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无论日本、印度耕地占国土面积都比我国高。中国尽管国土面积大，但按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例来比，则远远低于它们。

第三，就是按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来看，日本、韩国都要数倍于中国。美国的劳均耕地面积（即劳动力人口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为828亩，而我国只有4亩多，也就是说美国的劳均耕地面积是我国的200倍。这是绝对不可比的。虽然从矿产、海洋资源等方面来看，我国确实比有些发展中国家有优势，但惟独农业资源是不可比的。中国现在仍然是世界平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

在长期的实践中我认识到：**中国的问题的确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不仅是土地的问题，还有就业的问题，以及9亿农民依存的农村的发展问题，农业问题实际上只是派生的。**所以，我一向强调"三农问题"，认为中国并没有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尽管人们常说，中国如果出问题，就是农业的问题。所

---

* 参见温铁军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有的报刊杂志上都能看到类似的说法，其实"农业出问题"只是现象形态。记得大约在1989年前后，有人说农村改革超前了，因此要等解决了城市问题之后再重新发动。同时又在政策上只强调农业问题，甚至进一步把农业问题简单地强调为粮食问题，结果造成这10年来农村改革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我们的教训已经足够了。经济是个有规律的过程，没有说谁要停下来等谁改革的问题。农村改革一旦停下来就会累积矛盾。现在的情况就是农村累积的矛盾正在释放出来，它已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明显的制约。

四、中国在21世纪面临三大"结构"问题

可以概括地说，因为中国是一个资源过于短缺、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家，最近20年的高增长又被人们承认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增长"，因此21世纪中国人的资源更短缺。**在这样的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的矛盾之下，少数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就必然导致大多数人没有资源。私有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曾经发生的革命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就是这样的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

其实，**无论是占有资源的人还是没有资源的人都不愿意出现这样的革命或冲突**，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近年来大量暴露的矛盾已经让人们在教训中开始反思，因此，也许我们还有说服有关利益集团进行结构调整的机会和可能。

第一大问题是就业结构问题。

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大约15%，但劳动力比重仍然占50%左右。这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不上去：**一方面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也就上不去，负担就重，与地方政府矛盾就出现对立趋势；另一方面农村资源短缺对流动人口的持续外推，出现连续多年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整个社会就不可能维持安定团**

结。我国"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延续了10年以上，就是一种表现。

这种事实上的**政治压力又反作用于经济政策，迫使国家必须注意维持增长速度**，没有客观需求就用政府财政投资顶上，你要把基建调整下来，上亿低素质的农村流动劳动力就可能出大麻烦。当农业现代化已经被"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所取代的时候，"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也渐渐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第二大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问题。

现在连老外都逐渐明白了"大中国，小市场"的道理。说是有12亿多中国人，却只有30%在城市里的人是市场化的消费人口；另外70%农民人口还是自给自足或者半自给的，与市场消费关系不大。**没有成规模的城市人口，就没有成规模的消费，也就没有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我之所以把这两个结构放在一起谈，就是认为其中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因为即使在发达地区第三产业比重都上不去，还反过来制约了就业增加**。按理，第三产业是最能够吸纳就业的。

第三大问题是区域经济结构问题，这个提法包括了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

改革开放20多年，不仅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没有根本突破，原来提出的东部带动中部和西部发展"梯度理论"也不成立了，因为中部已经落到了西部的水平，只有东部"异军突起"，造成严重东西差别。**中西部的问题关键是资本高度稀缺，而可以向资本转化的经济资源又被垄断部门所控制**。东部地区人口、资本密集，资源短缺，从而使它的"出口外向型"经济不得不依靠"大进大出"。而经济上如果过度依赖于海外市场，政治上也容易受制于人。

这三大结构性矛盾是20世纪留下的，那么21世纪中国应该怎么办呢？现在多数学者似乎都很"现世"，少有人愿意对这样的"宏大叙事"进行讨论，还在诸如我们要不要私有化这种过

去的所谓热点上磨蹭。

中华民族在21世纪怎么生存？怎么发展？下个世纪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不同利益集团当然也有不同的蓝图。在不能搞议会民主的条件下，就有可能允许有人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去认真总结。而要认识这些基本矛盾制约下的重大问题，就要回顾20世纪的经济发展历史，要提出一些问题让人们反思，并引起关注和讨论。

五、我们怎样可持续发展

既然提出三大结构性矛盾，就得讨论如何解决的办法。

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第一大矛盾，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就业问题。无论怎样决策，都应该把它作为第一国策来考量，任何具体部门政策安排也都不能脱离就业来考虑。因此，中国继续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就有可能“东施效颦”。无论我们趋向什么体制，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必须符合整个中华民族中长期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少数大资本集团的短期利益需要。国家必须严格规划测算引进外资的投资项目与扩大就业的关系。那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工业项目尽管十分高效益、十分现代化，如果不能带动就业，就不能盲目地上。我们引进了很多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线，这些都是劳动力短缺的西方发展起来的，可以通过节省工人来提高效益，但在中国，让这么多人都到哪里去？所以通过追求资本增密参与国际竞争，强调企业资本收益最大化等理论，都值得我们反思，必须考虑它排斥了多少就业。

尤其是农业，有些发达地区搞资本密集型农业，当然在电视画面上很好看，什么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大拖拉机等大型的现代化机器在地里开，似乎这不是在中国，但对中国平均只有0.4公顷耕地的微型农户有用吗？谬种误传，贻害匪浅。

这个批评也适用于这些年来的基本建设工程。20世纪90

年代我们国家上了不少基本建设项目，但基本建设投资上项目是否考虑到数以亿计的农村低素质劳动力不能就业或就业不足的问题？我们宁可速度慢一点，但必须考虑就业。比如在建高速公路和修铁路、大坝等大规模基本建设时，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搞？简单地用BOT，好了，别人的大机器来了，他们倒是质量很高，速度很快，干得也不错，但是钱被别人拿走了。如果是用劳动密集型的投入，钱转化成劳动力收入，劳动力收入转化成消费，消费拉动轻工业生产，内需不就扩大了吗？

中国到底要什么？我看就是要一条就业之路。现在为什么运力过剩？就是因为建设方式有问题，建设方式的背后是没有考虑到人们需要就业，需要消费。如果用技术思维的方式来处理中国人口过于庞大、资源过于短缺的问题是有害的，要从中国的具体命运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超英赶美。所以说，就业必须是国家第一国策。与此同时，必须考虑基本建设工程尽量用劳动力，少用机器，非用不可的话，也要尽可能把投资转化为劳动力收入，转化为消费来拉动整个经济。

此外，**解决这个第一大矛盾还得要靠发展中小企业。**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吸纳最多的劳动力就业，因为新增就业的80%以上是在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本来应该是重大国策，但国家真有政策吗？直到最近两年才有人系统提出发展中小企业的建议，报纸、杂志也才开始讨论，在这之前，除了20世纪80年代对农村乡镇企业有一点优惠政策外，其他要有也很少。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也在90年代随着“宏观改革”而取消了。

发展中小企业必须要求有适用于中小企业的投资工具，可没有哪一个商业银行是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没有哪一个资本市场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我们的政策最近向高科技倾斜。不是不可以搞高科技，搞高科技是对的，不能比世界水平落得太远，国家必须用一定的财力支持高科技发展，而不是完全商业化地靠市场来搞高科技，但国际经验证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需要发展中小企业，国家应该建立必要的金融工

具和资本市场来服务于中小企业，也就是应该采取放开民间市场、放开区域资本市场等等制度安排。发展中小企业也就是发展高科技，这两方面都应该为促进就业这个第一国策服务。

第二大结构矛盾要通过开通城乡来逐步解决。如果允许那些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赡养人口都转化为城市人口，并让这些人变成完全市场消费的一部分，这样市场不就扩大了吗？可以先一步步地走，先放开 30 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镇。我国目前大量的县级城关镇人口在 3～5 万，至少县级镇可以先放开嘛！可以按 10～30 万人口的规模发展。按国际经验，30 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它的基础设施投资成本收益是能够合理平衡的，低于这个规模就存在浪费。我国有2 700多个县、市，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发展空间。

不过，**开通城乡不只是一个口号，所谓"城镇化战略"也不能只是在文件上强调，它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需要综合改革。**

它需要解决户口。现在农村人口加入城市户口必须先退掉承包责任田，退掉宅基地，否则不能解决户口。但退掉责任田和宅基地后进了城的农民又没有社会保障，一旦遇到风险和没有生活来源就会演变成贫民、黑社会。所以，应该给进城的农村人口建立一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怎么建立呢？**国家垄断征占的土地不要倒来倒去，变成腐败和少数人牟利的手段，而是把它证券化，变成国家建立的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这样一来，进城的农民即使丢掉土地也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生活保障。**

垄断征占的土地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各种开发商和建设单位每年"以国家的名义"征占大约 300 万亩土地，**按平均每亩 10 万元计算，地价就是 3 000 亿。**而这个庞大的数字以前基本上分散化为各级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的"寻租"资源，造成空前的腐败风潮和开发商的超额利润。甚至连带造成城里的房子卖不出去。报刊上一般认为房子卖不出去是因为房价太高。房价高造成积压，简单的原因是说人们收入不高，但实际上不

是这么回事。因为房价中的2/3价格是不合理的。

原因之一是地价。国家说土地是国有的，是不卖的，但开发商却都得买50～70年的开发权，它等于事实上的地价。如果像前面所说的土地都证券化了，变成了基金，地价打入房价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现在的房价有1/3是地价，消费者买的房子只有房屋的产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而消费者却支付了地价，这是不合理的。

城市房价很高的原因之二是任何一个小区中的邮政、电力、供水，甚至小学、幼儿园、商店、银行等所有的设施所占用的房地面积都是由消费者来支付的，而消费者在使用邮政、电力、供水时还得再支付费用，配套设施实际上又都归相关部门了，如小区内的邮电、电力、供水、供热等设备归国有公司，教育、卫生、治安等设施归政府下设单位等，这就等于剥夺了购房消费者为这部分国有财产支付的货币。如果减掉这不合理的2/3房价，还剩余1/3是真实的建筑安装成本，这才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如果可以只买地面物而不用支付地价，这样房子怎么会卖不出去呢？

因为垄断征地既剥夺了农民又剥夺了城市买房的消费者，所以，要开通城乡就得改政策，改政策的第一条就得改垄断，但改革直接涉及到垄断部门的利益，政府能主动改吗？可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怎么能让这个社会平衡发展？所以说，解决大政府、小市场的问题就得开通城乡，但开通城乡又确实面临一系列的体制问题需要深化改革，而改革又得政府对所属垄断部门实行自我革命，这个逻辑几乎是在注解“与虎谋皮”。

接着的问题是怎么实行城镇化战略。有谁给县以下的城镇建设提供基础设施投资吗？没有。即使在没有金融工具、没有财政投资的条件下形成新的小城市，政府却仍然在照搬老的政治体制，这对吗？也不应该。我国政治体制不是已经开始改革了吗？具体到民间投资形成的小城镇怎么改？新的城市保障体制应该怎么建立？公共事业建设应该怎么开支？这一系

列问题都摆在这儿，没有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所以说，开通城乡尽管是一个已经提出的大政策，小城镇建设也被肯定为大战略，但目前都还仅是一个口号，真正实行起来恐怕很困难。

第三大矛盾是东西差别。去年中央已经把西部开发作为大战略提出，国家计委也成立了专门班子，但重要的是怎么吸取东部的经验教训，怎么加快西部的资本市场建设，怎么带动国土整治，解决资源与人口的不平衡问题。

我看西部开发有4个字缺一不可：水，路，人，地。

上学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有一条经济地理分界线，被称之为“瑷辉—腾冲线”，就是从黑龙江的瑷辉到云南的腾冲划一条直线，中国人口70%居住在这条线的东部，但东部只有不足30%的资源。而西部虽然资源条件好于东部，资本却高度稀缺。怎么动员东部占70%～80%的过剩密集资本向西部流动？**假如说资本市场是国有的，假如说金融工具是“国家”而不是财阀垄断的，那就请国家垄断能够控制的这部分金融或国家资本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率先向西部流动，从而带动民间资本向西部流动。**现在民间不是没有钱，温州地区有200多亿的资金没处去，纷纷花高价换美元向欧美移民，两广、福建一带也是如此。仅1998年，就有300多亿美元资本非法流出。

而现在的西部开发，在习惯于传统体制的人那里又是既往的计划方式，上公路、铁路等项目和资本密集的工业项目。试想一下，在西部搞开发，可以从人口稠密、人地关系紧张、资源短缺的省份（如有9 000多万人口的河南省）动员劳动力到西部去，**规定凡是国家投资上马的一些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必须促进劳动力就业，实行以工待赈**，向劳动者提供食物和必要的生活用品。那些过剩的积压的轻工业物品，如布匹、粮食都可以调到西部去，让这部分劳动力到西部去修路、开渠、种树、种草，改善那里的生态环境，通过以工待赈这种方式**带动人口密集、缺少资源的省份人口去西部，允许随路或者随水落户，干一年给一份地，两年两份，干三年可以分得十亩地，**会没

人去吗？这方面的教训莫过于我们搞的三峡移民，平均每个移民9～10万元的移民费，但大量被挪用、贪占，真正分到移民头上的很少，动员他们搬迁就是不搬，不得不就地往后退，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完全用现代市场经济投资的方式去搞西部开发是不行的，中国只能用中国的方式。有人说是农民不愿意走，他家乡已经没有地了怎么会不走，是政府没有给他们一个好的机制。所以**说西部开发搞基础建设应该利用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客观条件，先解决水和路的问题，哪怕是先开出一部分水渠，先灌溉出一块地，先修出低等级的公路，先调去一点人，如果以水利建设促进垦荒，30年能调过去1～2个亿的人口，能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就是最大的成就。**否则，我们中国人在21世纪20～30年代达到人口最高峰值之日，也就是将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最后机会之时。

结束这篇序言的时候，我想起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民国初年我国曾经“师从欧美”推行西方交通秩序，洋学生上街拿竹竿像赶牲口一样让进城的农民靠右行走。一百年过去，你到中小城市或县以下的城镇看看，老百姓照样还是挑着担子“逆行”，大城市里那个横穿高速公路的人被撞飞起来的录像至今还让人触目惊心。诚然，一百年来我们在经济上有重大进步，但那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条件下取得的，是有巨大代价的。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不过跨越了邯郸学步阶段，总的来说，现在才进步到学会“摸着石头过河”。

CONTENTS

目录

第一篇　改革与发展

[壹]　百年中国　一波四折/3
[贰]　中国改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13
[叁]　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35
[肆]　民间资本原始积累与政府行为/59
——温州调查的理论推断
[伍]　西部开发与中国发展战略的两个思路/65
[陆]　中国的西南开发与南下战略/67
——中国大西南与湄公河走廊的“亚区域”综合开发

第二篇　国际问题

[壹]　新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77
[贰]　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粗放型增长的趋势性问题/91
[叁]　巴尔干三篇/105
[肆]　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总体性危机与中国改革/123

[伍] 东欧原国营企业“民营化”的产权问题/139
[陆] WTO原则对我国农业的影响/151

第三篇 经济周期与形势分析

[壹] 中国经济略有复苏迹象，启动经济还需深化改革/165
[贰] 宏观经济波动之下的改革与发展/169
[叁] 1994：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问题分析/193
[肆] 建国以来的经济周期及其相关调控政策分析/203
——兼论1995年的经济趋势问题
[伍] 危机论/219
—结构性危机向周期性波动的转化

改革与发展

1. 百年中国一波四折
2. 中国改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
3. 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
4. 民间资本原始积累与政府行为——温州调查的理论推断
5. 西部开发与中国发展战略的两个思路
6. 中国的西南开发与南下战略——中国大西南与湄公河走廊的"亚区域"综合开发

百年中国　一波四折

我在探索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困惑之中，逐渐涉猎近现代史的研究，今年又在杜克大学那片森林中读了几个月的书，有机会把过去在实践中遇到的难以用现行经济理论解释的问题，结合这十多年的大量实地调查和资料研究[*]，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对20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认真作了梳理，以下就是我尝试提出的**“一波四折”——20世纪中国问题研究的基本假设。**

中华民族延续了五千年的厚重农业文明史，翻到20世

---

* 这是我1998年以来准备了二年的著述《20世纪中国史述要——经济卷》的研究提纲。原来打算2000年底出版，结果却越写越感到困难。于是，干脆先把提纲抛出来看看反映。此文先后在《改革内参》2001年前2期连载，在《读书》2001年第3期上公开发表。

我在过去10多年对现实问题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以“两个历史阶段和两个基本矛盾”为主的分析框架。其中两个历史阶段，即指建国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和近20年的地方工业化都不可能逾越的、现象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却相同的资本原始积累。后来又对建国前大约100年的各种调查做了排序研究，丰富了既定的研究框架。现在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其他学者做的研究予以比较，对所能够收集到的满清和民国的历史资料做整理，目的仍然是加深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解释能力。我感到无论在思路上还是在主要观点上，我的成果都与两种相对立的主流理论有所不同。因此，这个研究到目前为止，的确还是十分粗浅的，值得批判的。

纪，终于到了一个非改变不可的特殊阶段。但当她要按照西方人的样子改变自己的时候，**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却并不给她改变的机会**。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在这一百多年里进行了四次以自我剥夺为主的复杂的工业化历程。每次都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对我们这样资源严重短缺的人口大国而言，任何成本大于收益的制度安排都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革命。因此，我才把百年来四次追求工业化的进程称为"一波四折"……。

我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概括起来可以形成如下假设：

1. 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在险恶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压迫下，主要通过政府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及现代化的经验过程。

有鉴于此，如果把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概括为四次工业化，则为：满清的"洋务运动"及随后的民族工商业发展；民国的20～30年代的"黄金10年"和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其后是改革20年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

2. 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由于政府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的亿万传统小农，因此，进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交易费用奇高，于是，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政府就失败，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政府就成功，其所建立的制度就应该被认为是收益大于成本。

简言之，满清在安定了两百多年、政府已经不能更腐败的条件下采用加税剥夺的传统手段，民国在战乱频仍中也没来得及有条件创造出相对有效的制度，于是都自亡于过量提取农业剩余引发的社会冲突。惟独新中国，利用长期战争对执政党和人民的教训以及战争中形成的军事化集权体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业化的动员机制和组织，初步完成了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手段的原始积累*。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发生了从1个中央政府演变为约7万个地方政府（现在约为5万个）都进行地方工业资本积累的戏剧式变化**。由此形成持续20年的高增长。

随之，中央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现初步工业化以后，倾向于强调可持续发展，但这与地方正在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间又出现了几乎难以协调的矛盾。

3. 不同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产生不同的、正反两方面的制度经验。

新中国通过高度集权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短时间内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要求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改变。其实，这两个阶段都是经济规律使然，本来无可厚非。

当然，我们也有制度成本：由于我们是**在地缘政治关系压力以及人口与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条件下重工业超前发展，必然产生"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必然由于长期就业不足而压抑城市化。进而，国家在"工农两大部类难以交换"的矛盾之中，不得不强化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

4.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迫使后人在市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面对区域差别扩大以及资本异化于劳动造成的两极分化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遇到的矛盾。

上一代中国人在追求经济增长中产生并且延续下来的问

---

* 参见温铁军"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新华文摘》1993年第12期；《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题，已经命中注定要由21世纪的新一代中国人在资源环境更加恶化的国内解决。而且，既然百年来的四次工业化都必须搞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其后的工商业与金融资本收益事实上都由政府或其部门为主来占有，我们当前面临的也就是"世纪难题"：

在这个难题制约下，**一方面使得"权＝钱"、形成垄断的制度成本极低，因此任何类型的国家资本都趋向于追求垄断、占有超额利润，于是必须在公平竞争条件下才有效的市场经济机制难以产生；另一方面，资本原始积累的苦难却要由全社会特别是付出几乎全部剩余价值的工农劳动者承受**。而其在高度无组织和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根本没有谈判地位，又使被剥夺者的自发反抗越来越趋向于破坏性极大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长期以来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安定团结的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认真提出过，更没有通过讨论影响决策，因此才有我们这百年痛苦的波折：要么被动地在外来势力干预下发生革命或分裂，要么不断形而上学地按照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进行体制变革。

无论如何，百年来理性的中国人只能寄希望于改良。如果代表资本力量的团体和日益与其对立的劳动者都愿意接受过去的教训，并且都不想最终走向革命或者动乱，那么，在劳动者群体不可能正常释放压力的单极社会里，就只能由愿意维持长治久安的统治者对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进行调整。

5. 几点启示

中国人一百年来从跟西方人牙牙学语，进步到"邯郸学步"，再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再前面，是资本经济的汪洋大海。难道，我们除了亦步亦趋就没有自己的路？本来应该有，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前苏联。但历史不存在假设。现在，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回顾历史，也就没有评价现实问题的依据和为了下一个世纪探寻第三条道路的可能。

中国的工业化真不容易，因为几千万人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国人的真改革更是谈何容易。因为它常常与“车裂”高度相关。然而我们必须改革，倘若改革不成，则中国必然走向革命或者动乱。

我们都从自己亲身经历知道：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往往都是逼出来的，都没有约定或事先设计好批准了再干的。近百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英国式的通过贵族阶级“光荣革命”使统治者“自觉”让渡部分权力和利益的先例。更何况中国重视传统价值的贵族早已经在战争和革命中消亡，新贵族还正在自身形成之初的无序掠夺之中。

此外，传统知识分子作为“精神贵族”，在1919年和1966年两次文化革命中要么“失语”，要么自残。侥幸存活的，也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新生代知识分子制造的技术思维型的浅薄中明哲保身。其中，还多少有点“本土文化感”的人往往轻易地被主流排斥。而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本来就没有任何真正的左派诞生的土壤。因为在劳动力绝对过剩压力下的分散劳动者没有与资本对抗的条件，知识分子于是便没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机会，除非出现外忧内患、国难当头、底层社会民族主义汹涌澎湃、而统治者又严重失策的特殊情况。

新中国工业化派生的新一代技术知识分子被戏称为“有学问没思想，有知识没文化”。他们大部分在本质上与新贵族相似，而且这些更强调“学而优则仕”价值观的现代知识分子主力，如果不是被逼急了，从来都是主动地、拼命地与统治者（无论是谁）相结合的。大众当然不至于蠢到连自己被剥削的感觉都没有了。但既然知识分子放弃了社会责任，他们便没有新的理念指引，于是有想法的往往回到传统之中去寻找；没有想法的大多数，则成为具有潜在犯罪心理倾向的“流氓无产阶级”。后者就是中国自从1989年进入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期”之后、便在峰值上长期下不来的客观基础。

再于是，理论界强调的"效益"与大众追求的"均平"之间就越来越难以调和了。

但愿，当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到18亿、而资源却在已经过去的四次工业化的粗放增长中消耗殆尽的时候，后辈人能够因为比我们更聪敏而渡过难关。

6. 21世纪的两个选择

我们有必要在国际竞争带来的危机压力下，讨论以下选择的现实性：

一方面，**应该把调整城乡差别和东西差距作为世纪之交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首先通过改革让劳动者占有大部分以他们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国家资产**，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落实到经济制度上，实行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的财产社会化占有，**使民众"有恒产则有恒心"，才能够解决这些本质对立的矛盾**。

另一方面，立足于弱化这种内部结构矛盾的"软着陆"改革，21世纪的决策者可以基本解决"跨世纪难题"，从而以更低的制度成本使原来以国有为名的150 000～200 000亿实物形态的资源转化为可进入市场交换的资本，并且对应增加至少100 000亿货币发行，提高以资本实力为表现的综合国力，尽快把中国的经济总量提升到可以与国际资本集团较量的350 000～400 000亿。我认为，这可能是使中华民族在下个世纪的激烈国际竞争中有立锥之地的必由之路。

社会化的产权制度是构建合理政治制度的基础*。

(1) 财产关系影响政治改革的故事

先从一个故事开头，叫"私营企业家联合起来保卫党支部"。

广东全省推行村委会直选的同时撤区建村，把原来的管

---

* 这是作者2000年5月在西安参加国家信息中心举办的研讨会时的发言记录稿，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理区（村公所）改成村委会，这是不折不扣的农村政治制度变革。在我调查的那个村子里，竞选时有人指出了党支部领导的一系列问题，在群众中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发生了数百人包围党支部的现象。当时，市和镇的党政组织都做了很多工作，却没能够把农民的上访告状压下去，最后是私营企业家们联合起来才解决了问题。

先是由这个村最大的私营企业家站出来竞选那个对党支部书记反映最大的自然村的村民组组长，他承诺个人向村子无偿提供200万投资用于修路、通水等等，接着全村的私营企业家又召开企业家大会，发布联合声明，号召全体村民跟从他们投党支部书记的票。这样，才把书记的位子保住了。

我在介绍这样的案例时没有作出价值判断，只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市、镇、村党的系统没有解决的政治问题，靠私营企业家们联合起来解决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以往私营企业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往往跟地方或上级的正规组织做交易，通过带"红帽子"使财产合法化，以公有制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为名经营。"十五"大尤其是四中全会以后，地方企业改制的动作比较大。在我调查的这个村中，带红帽子企业全部重新注册为股份公司或私营企业。这样一来，从统计报表上看，这个村两年来集体资产大幅度下降，改制中，财产制度与分配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个矛盾在换届选举时总爆发。如果企业家不把自己在与地方干部集团重新交易中得到的"集体"财产交出一部分，并明确公布用于公益事业，让大多数村民有好处，老百姓可能就不会接受那个村原来的正规组织继续掌权。

（2）财产制度安排制约政治制度形成

如果从目标来看，20年改革中已经有四次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叫政府体制改革，这四次是否都有目标，还是迫在眉睫不得不改，回顾起来，似乎都是迫不得已才改。

政府体制改革是绕不开初始条件的，我把它解释为最初财产关系怎么形成、产权制度怎么安排的这样一个前提。举个例子，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在于第一步改革就把政府部门控制的最大资产——农村土地，一次性地社会化分配，把产权让渡给了农民。当时所有权没有给农民，所有权让给了村社集体。**政府在做这种改变的时候，它的交易是什么呢**？

原来，政府把本来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让渡给了村社集体，村社集体获得了以集体为名的土地所有权，这时候的所谓公有制，**实际上演变为边界清楚的、具有私有制排他特性的社区共有产权**，村社集体得到土地产权的同时，承担了对社区提供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物品，因此才在大包干稳定下来以后的1988年，相应出现了一种乡村自治或村自治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安排。它的前提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家都相对认可和接受的产权制度。

政府体制改革绕不开财产制度这个约束条件，就是我们现在的第四次政府体制改革，也与财产关系的调整相关。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绕不开产权制度改革。人们说国营企业改革必须先改政府，所指称的最大问题是：企业资产仍然是以政府名义上占有权益的国家所有制，但是这个说法其实不是真的。人们难道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吗？显然，我们早已经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集团化的部门垄断资本了。这种难题是绕不开的。那么，假如政府不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场农村改革一样，向广大职工社会化地让渡企业资产，它就形不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

城市改革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不成功，就是这个财产制度安排的难题绕不开。

更清楚一点讲，**有觉悟的私营企业家在提出自己“淘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的艰苦经验时，都承认自己是有“原罪”的。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谁把政府当年淘第一桶金的**

原罪告诉大家，大家都认为政府理所当然是全民资产的所有者。其实，当年中国是农民国家，“一穷二白”，政府啥也没有，连国库的300万两黄金都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最初发行的货币都是“毛票子”。以后形成的国有资产，不全是老百姓的血汗积累吗？

既然谁都承认农村改革搞“大包干”的实质是农民按照村社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并没有让农村老百姓付钱去买地，那么，现在为什么城市改革却不“分”，而一定要让国有企业职工买房、买企业资产呢？

况且，现在条件比当时搞大包干要好得多了。9亿农民得到土地，没有提出对国有资产分配中还原农民提交的原始积累的要求。3亿多城里人之间，只有1亿多人要分配，其余2亿多人在私营企业或者非国有企业中也不要分配。所以，对这1亿多人哪怕认真分配一次呢？

总之，如果形不成社会化的产权制度，就形不成合理的政治制度。

中国改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

一、中国与西方式的私有化制度不同的历史根源

中国在漫长的农业社区文明中，社区和农户之间自发性的合作并经历史沿革而成的“两级产权”，与西方私有制经济制度下的产权关系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国不可能第二次再走西方指示给我们的道路。

1. 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公民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依据。马克思早就看到，即使是西方的私有制经济，当它在向生产的社会化和股份制发展中，也在扬弃着私有制。他说：“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扬弃的”。（《马恩全集》，第25卷，第498页）此处所说的后者就是合作制。他还在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及其一切矛盾”。中国的城市改革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消极扬弃的”，以为可以通过股份

* 本文是根据作者1996年在对地方试验区干部培训时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的，收入本书时有删节，题目也是修改时加上的。

化改造企业产权构成；而农村改革之初的分地和后来"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却在实践着"资产的社会化与生产的社会化相结合"。

在这个历史性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之中，"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却长青"。应该注重的是从实践中去发现问题，提炼出一些带有理性的经验，而不是用传统的或西方的理论结论或理论概念，套用到现在生动活泼的经济现象上来。农村的分田到户，并不意味着私有制的产生，而是集体经济"产权两极构造"的又一种实践形式。

2. 东西方不同社会基因的形成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西方的"个体化"的私有制经济，是建之于西方自己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的；而东方这种"群体化"的共有制经济类型，则是建树在自己五千年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文明发展过程中的。

据我所知，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知识界对此有过争论，80 年代初，我在大学里也对此有过讨论。带着这些争论中未决的疑点，我曾经有机会在马克思做研究的大英博物馆认真地做过观察分析；后来在法国的卢浮宫，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俄国的冬宫博物馆，德国的日耳曼博物馆……，在那些瑰集了人类文化财富的地方，认真地做过一些研究分析。

尽管我并非历史学家，但作为一个有心人，我感到震憾的是，在三千年乃至五千年前的那些古墓葬挖掘出来的文化遗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极其悬殊的差异：西方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地中海沿岸的采集、狩猎文化，那些地方出土文物所表现的人，是充分"个体化"的人。无论是古希腊的雕塑还是壁画，所表现出来的人物各个不同，但主要表现的是人的体魄的强健。

而东方，包括古埃及、古印度、古代中国，所有这些立足于原始灌溉农业的古代东方社会，挖掘出来的墓葬壁画却

都千人一面，体现出典型的"群体化"特征。即使是部落酋长，比如说大禹，也不过是个头高点。大家都着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面孔；甚至那种多年延续的一样的单线平涂式的表现手法，也体现不出东方古代社会人的"个体化"突出特点。

古代东方社会可以总结为浅显的"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形态；西方社会则叫做"以个体为基因"的社会形态。这两种社会形态导致后来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类型。我认为，这种基因是决定东方无论如何照搬不了西方的内在原因。

从经济基础上看，地中海文明首先发源于古西腊、古罗马，这些地方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优势。即使现在到意大利半岛去看，还是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原始氏族部落制的时候，西方狩猎文明或采集文明，体格强壮的人伸出手就能拿到果实，扔出石头就能打到野兽，如果没有自然资源或者资源不足就会发生战争。所以，西方古代社会第一部成文的历史"荷马史诗"反映的是战争史。我们读过伊利亚特奥特塞著名的"特洛伊木马"反映的战争故事，这个故事表面是讲因海伦而发动的战争，实际上是资源配置而导致的一场战争。乃至于后来，当西方社会在进化过程中，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也还是一样以战争来控制资源和市场。

而东方古代社会产生于原始农业，比如，中国最开始崇信的是"神农氏"，因为他"尝百草而事农耕"，所以这位原始农民就成了"三皇五帝"之首。后来，第一个从部落酋长转化成国家统制者的则是大禹。大禹治水也迥然有异于西方。为什么中国的最初国家权力形成于治水政绩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德行，而非西方式的形成于战争或暴力？因为，原始的灌概农业这种经济类型要求必须结成社会群体才能防御水患，才能利用水力，才能引水灌溉。所以，它突出不了个体，一个人开不了一条河，一个人防御不了洪水，依托大江大河的原始灌溉农业，演化孕育出的必然是群体基因的社会

形态和德政的政治形态。

3. 中国应该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始经济基础决定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基因，奠定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底蕴。即使发展到今天的这个世界格局，也仍难脱其窠臼。

到现在为止，我们实际在走着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的“第三条道路”；但却还没有产生于自己脚下这块热土的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理论界实在是非常苍白的，还没有从我们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脚踏实地调研，一个一个地去界定社会经济范畴，去发现它们之间的本质关联，去挖掘出质的规定性，去总结提炼出我们的基本理论概念……要么照搬俄国的理论，要么照搬美国的理论，照搬理论是没出息的。我相信“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古训就是注重调查研究、注重交流，特别是从基层调查研究当中产生感性认识，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材料。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危机的成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能改变经济的周期性规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不仅仍然表现为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缩短，原因迥异：

1. 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引发国家资本部门垄断和地方政府原始积累

如上文所述，1982～1984 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涨。其中非常重要的变革就是为减轻财政负担，实行“利改税”、“拨改贷”和“财政分灶吃饭”。从过去的财政“统收统支”体制改造成各部门“留利交税”，财政对企业投资改为银行贷款和中央地方财政“分级承包”。

所谓“统收统支”，就是任何一个单位所创造的每一分钱

利润都要逐级上交财政，所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由财政统一安排下达。这是全民所有制存在于财政并对全民进行分配的必要条件。财税改革在调动了各部门和地方理财积极性的同时，客观上以“单位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带来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一是财政改革以后，出现了各个部门根据自己实际占有的国家资产来决定上交和留利的情况；于是，出现了部门之间的财产分割，也就是“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

在财政体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是有绝对权力的。因为，各个部门资产都是全民积累的，是农民、工人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这个国家从一穷二白、完全的农业国发展到70%以上产值来自于工业，发展到改革开始时国营工业固定资产达10 000亿元，这是全中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因此，中央政府代表全民有绝对的财产权力，甚至连各部门的人都认同这是国家的财富。

但财政改革使各部门突然有了收益权；从收益权就开始转成财产占有权，因为收益权来自于对财产的实际占有。于是，就开始出现了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其实，权力份额最差且最无资本利润可占的是农口，因为农民把财产先分包到户了，人民公社也解体了，农口各部就成了几乎没有资产可供垄断占有的政府部门。

部门之间的收益差别现象导致了后期的部门垄断资本形成。现在所谓的“块块之争、条块之争”皆起源于此。每一个条条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就有部门之间出于利益，在决策上反映不同意见，进而再让人大通过部门为自己起草立法并予以合法化的情况。这就使部门利益已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了。

部门垄断资本形成也是中央调控失灵、“设租寻租”型政治腐败泛滥，陡然加大制度变迁成本的直接原因，只是人们对此无可奈何罢了。

二是“拨改贷”改变了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性质。企业从银行贷款进行扩大再生产投资，还贷后所形成的资产，按理应为该企业全体职工劳动剩余转化而成，视为共同所有。现在则因产权改革滞后而已经演化成为“单位自有资产”。政策理论上不承认拨改贷后企业资产性质上的“共有制”变化，片面强调“国有”，实际上是部门垄断资本自我保护的政策表现。

三是“财政分级承包”启动各级地方政府为自己的财政利益而进行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只完成了国家一级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这意味着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大中型城市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地县以下普遍是工业基础薄弱。于是，在财政改革后，全国形成了各个层次的明确的收益主体，数千个县、市，乃至数万个乡镇便都突然有了一个要求：完成各级地方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

大家看到：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有一个现象——“跑步进京”。就是地方政府到北京跑部门，从部门垄断占有的国家资本和收益中挖一块给这个地方。甚至拉高干子女当地方官，于是官场腐败应运而生。随之就出现了 80 年代中期投资规模的空前膨胀。而又由于整个国营经济的内部分配机制是完全不能制衡的，新增投资约有一半要转化为消费基金，于是，投资的膨胀又导致了消费的膨胀。

由于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上述问题，就出现了投资、消费双膨胀，形成改革以来的经济过热问题，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2. 危机调控政策分析

1985 年经济出现高潮，也导致财政出现了较高赤字。这时提出的经济调整的口号基本上还是“调整、整顿、充实、提高”，和上一次发生危机的 1980 年的八字方针差不多。不过，1986 年提出的“拍、租、转、股”则因其触及国有企业

产权改造，而显然比上一次的"关、停、并、转"有本质上的进步意义；但这个进步由于仍没有进步到承认企业资产中的职工劳动剩余价值的深度，因而得不到广大工人的响应。加之种种体制环境原因，终未得到认真贯彻。

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当时的投资膨胀使国有企业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于是 1986 年开始提"乡镇企业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但实际上因为外贸垄断，只能是"两头在外贸"。

不仅是中央控制的大中城市投资、消费双膨胀，而且由于财政体制改革创造了层层利益主体，大约 7 万个地方政府也都尽力争取投资，试图完成地方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这就在全面经济膨胀之中产生了地方差异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级政府不可遏制的"现代化攀比"。这是中央 1985 年即已提出紧缩政策、而到 1988 年仍未能见效的主要原因（统计上看只在 1986 年投资略有回落，但并不构成一个周期）。接着，从现象上看，还是由于供给不足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造成了 1988 年夏季的大抢购，并导致了当年 18.6%的物价上涨幅度。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大抢购只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特殊现象，此后则不足为训。

因为我国处在开始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政策语言上刚开始讲商品经济，并不承认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上也还是非市场化的。当时老百姓面对的可进入市场只有两个，就像一个翘翘板：一头是高档大件消费品市场；另一头则是生活必须品即粮、棉、油、肉、菜、蛋市场。那时没有股票、房地产，没有任何资本市场；也没有听说过谁买医疗、养老、财产等社会保险；当时连旅游都不是市场化的，大家都抢出差机会借机出去旅游。因为这些消费都是非市场化的，是国家包着的，所以对于市民而言，除了基本生活用品和高档大件消费品两个是刚放开的消费品市场之外，没有其他消费品市

场来分散资金投向。因此，抢购就集中在这两极翘翘板上，任何一极消费压力稍微加大，都会导致物价波动过大。

当抢购高档大件消费品使物品价格上涨时，对应政策是增加高档消费税。间接大幅度提高了高档大件消费品的价格，这又客观上无异于刺激市民对价格上涨的预期；无处释放的社会消费就只能转向基本生活用品，甚至抢购布、盐、粮食……

由于两极化的消费使物价波动显得很大，所以随即引发了公众挤兑。为了防止银行存款下降，政府又较大幅度提高了存款利息，同时实行保值贴补。高利吸储虽然确实使银行存款随即大增，但在贷款利率未调而且严格规模控制的政策作用下，银行当年即出现数百亿元的亏损，并导致财政赤字相应增大。于是，接着就必需调整贷款利息。这时，地方和企业在紧缩政策于 1989 年之际突然有政治条件实现的同时，又遇到资金成本突然大幅度上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作用，终于使国民经济在 1989 年以后进入了萧条阶段。

对于后来者，这种宏观调控政策及其作用过程本应引以为训。

3. 萧条和复苏

1990～1991 年是很典型的萧条期。企业“三角债”一度高达 3 000 亿元，库存占压达 2 000 亿元。为了安定团结，银行被迫增加贷款，用于收购企业库存，甚至给亏损企业发工资，导致不良贷款大幅度增加。这样延宕到 1991 年，中央一方面继续实行紧缩方针，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只能实行“点贷解扣”。此时的农村，直接表现是农民收入连续三年下降，负担相应增加，干群矛盾激化。

到 1992 年，逐步适应了当时政策的各种民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经济开始有所回升。此时“邓南巡”仿佛一剂猛药，突然使地方经济以大办开发区为特征猛然进入到高涨阶段；当

时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所反映的效益并未提高，但在股票、期货、房地产三大投机同步作用下，再次出现1993～1994年投资与消费都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和物价都过度上涨的局面。

另外，1992～1995年间，每年360万亩农民土地的非农占有，约等于每年从农民手中拿走3 000亿元的国民收入。

4. "信用膨胀、生产停滞"型的第四次经济周期

1994～1995年，连年的高物价上涨起源于两个与80年代不同的新因素：

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中，必然伴随产生"经济货币化"（或称"资源资本化"）所推动的货币超发。

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放开，90年代社会公众所面对的市场显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两极化翘翘板"了；金融资产的多元化以及投资结构的多样化，加快了我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每一份在原来产品经济时代不用货币即可分配的资源，在90年代的市场条件下，则必然要求对应增发一份等值货币，以实现通过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和资源配置。在节省货币的信用手段和契约化的信用关系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当然会促使货币大量增发。

二是高利率造成"信用过度膨胀、企业生产停滞"的恶性循环。

有经济学家说，1994年全国贷款总规模是34 000亿元，当年的官定贷款利率是在年息10%左右。但实际上大部分企业拿到贷款的利率一般都在20%以上。这中间至少有十个百分点利差，折合人民币3 400亿元。若不是银行，那是谁吞掉了这3 400亿元？这个问题无法直接解释。

据《金融时报》说，中央财政历年亏损对银行透支已经超过了银行的自有资本金。财政部1994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说：今后赤字不再向银行透支，靠发行国债弥补。于是当年国债是1 000亿元。1995年增加到1 500亿元。

1996当高于上年。大规模增加的国债只能高息发行，这就客观上推高了银行的负债率和资金利率。

而银行在上一轮周期之中被迫放贷，已经有大量的不良贷款收不回来，只有用剩下的可回收贷款去牟取高利才能偿还存款人本金，以及只有在存贷款利率倒挂的不利条件下硬挺着支付利息。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如三年期以上的存款加保值补贴，1996年1月到期时年获利约24%，而贷款按调整后规定的利率年息只有约13%。存贷之间差十个百分点以上，这还不加银行经营费用。

现象上看是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但这只是按照国家法定利率计算的。事实上全国大部分银行单位都坐好车，发高额奖金，盖好楼……；这就客观决定了对于银行而言最起码的经济选择：官方银行既然官定不能破产，只能采取某种追求利润的行为——变相放高利贷。既然规定不能高息，那就只好通过搞财务公司、投资公司的违纪拆借等手段，由这些相关公司去高利放款，这就是企业到银行借不到款，而要拿到贷款就得都是高息的原因。

另外，银行在利率倒挂条件下，存款增加就要多支付利息；但是还必须大力吸收存款，因为贷出去的款已经收不回来了。可如果不增加存款，就没有新增贷款能力，所以一定要增加存款。这就是信用膨胀。

一般而言，在资金利率高于10%的条件下，除非投资于银行或"泡沫经济"，否则在实物经济领域中的任何投资都几乎是无利可图的。这也是近年来"公款私存"和社会存款都大量增加的直接原因。

信用膨胀的直接结果是：企业之间的连锁负债至1995年第三季度已经突破8 000亿；库存占压约5 000亿。二者都是上一次周期的2.5倍。并且，企业在负债率高达80%、资金利润率又只有约3%的情况下，亏损面必然扩大，从而导致生产停滞。

接着是恶性循环：企业不良债务导致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恶化，贷款大量转化为坏帐、呆帐或预期贷款、不良贷款。到现在为止，金融系统承认的不良资金大约占贷款总规模的不到 30%；其他部门说法不一。理论界最为极端的说法是高达 50%以上。

5. 经济危机中的地方政府

1994 年以来，60%以上的县级财政赤字；80%以上县级工业亏损。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信用状况都不断恶化的同时，有些地方政府行为也发生本质性变化。

一是变相吃存款。政府指使银行给县办工业贷款，在贷款的同时把税扣下，银行则先把利息扣下，以此满足本届政府眼前需求、包袱甩给后人。

二是配合某些外商掠夺资源。在国内资金利率过高而且受规模控制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往往不顾环境污染，以有限资源置换引进外资。

三是剥夺农民地权进行原始积累。在缺乏外部资源的地方，政府伸出手去以地生财，大规模征占农地垄断出售。

6. 有关讨论意见

根据金融资本运行规律，既然银行信用的基础只能是政治强权，那么信用恶性膨胀的下一步将导致政策支持下引入浮动汇率制，或对商业银行注入低息资金，从而通过不断扩张信用，避免金融破产及其连带的政府信用危机。作者认为，对此惟一可做出的早已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制度成本分析。

对于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可参阅我另一篇文章："建国以来四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宏观调控政策分析"，发表在 1996 年第 1 期《发现》杂志上。文章分析了信用恶性膨胀的结果，认为按照经济周期规律，近期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是信用崩溃，直接表现为孔夫子所担忧的"礼崩乐坏"，即广泛的社会性"赖帐"。不仅企业、银行，各部门和地方之间也互相赖

账。一旦银行赖账，"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信用危机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于决策者而言，也就是到了不得不作出取舍及抉择的岔路口上了：是要产业资本还是要金融资本？

企业不景气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把现在国有企业没有积极性、经营效果不好归因于高的负债率，那么，农村也有同样的问题。全国乡镇企业统算账，资产负债率67%。其中，大型乡镇企业（经营规模最大的1 000家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78%，接近国营企业。这反映出企业自我积累能力过弱，资产负债率过高，是经济危机和萧条阶段的普遍问题。

一般而言，企业的债务率达到50%，效益受到影响（不包括流通企业，我国流通企业相当多是全额负债的），因为利润中有相当一块要变成银行利润；当企业负债率达到60%时，一般产业几乎无利可图；到60%以上的时候，企业出现负利润；而如果达到80%以上，多数就该破产了。

理论界有人说，银行应把债权转为股权，就是把企业欠的债务转成银行对企业的股权，也就是银行的左口袋拿钱，右口袋装钱。也有人说，过去从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是改革，现在改回去，把企业债务再算成财政拨款。总之，还是在原体制内循环。

还有一种说法，向管理要效益。认为只要加强企业管理，就能增加效益等等。十四大确定的总书记政治报告中明确讲，建立市场体制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化，就是先要搞产权制度改革。不能以加强管理来否定产权改革。好在从"十一届五中全会"起又讲明晰产权了。只讲加强管理的说法早在1978年就提过，但就是执行不下去。当不触动产权的城市改革导致企业的亏损面进一步扩大时，1986年才认识到要调整、盘活存量资产。从那时起，因为非经济环境变化又耽误了十年。现在企业负债率进一步提高，坏账率进一步增加，当老路再走不下去的时候，才终于又走回来。

与产权改革对立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有资产流失"。事实

上，从建国起两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都转化在国有企业资产中间了。如果不承认劳动者在国有企业中的产权，只给他们一个劳动合同，一旦他们遭解雇就失去了生存基础，这当然不是“主人”；也无以防治工农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大幅度下降。所以，如果不改革现行产权制度，就不能防止资产流失。

有一派国际知名的理论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但是，农村改革一开始就是“突变式存量改革”，就是大包干让农民分地。第二步农村改革的突破也是南方率先开始搞的“股份合作制”。就是要把包括土地在内的农村资产进一步以股份形式量化到人。“不动产权的改革不是改革”。建立新的财产关系是其他制度创新的基础。而由于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74%，也就是大部分中国人是动产权的存量改革。也许渐进式增量改革只反映城市，但那块只是渐进，却并没有增量；而且存量越来越少，差不多全变成负债了。再若延宕，无异自弃。

三、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与发展

1.“抓大放小”存量调节

中国的国有工业固定资产统算账将近40 000亿元。国有房地产统算账，按重置价格计算也是大约40 000亿元。这样，城市固定资产总规模仍然在80 000亿元左右。农村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包括土地在内统算账，应是80 000～90 000亿元。现在资产总存量仍在160 000～170 000亿元之间。中国的希望在此，发展的基础在此。

流量调节已无出路，存量调节迫在眉睫。如何减少存量调节中的社会震荡，就看如何作出调存量的决策。

1995年中央五中全会提出的“抓大放小”是重大决策，几乎雷同于80年代初农村改革中保留4 000家集体工业发达社队不分包到户的安排。现在按40万家企业计算，抓住1 000

家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尽管政府仍占有国家资产总额和利税的约70%，但是毕竟放开了其他39.9万家国有企业，这就可能较大幅度地开放资本市场。

2. 国有资产社会化

资本市场放开应体现“国有资产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原则。形式上并非照搬规范化的股份公司，而是根据国情，至少搞一定比例的“劳动贡献股”，推行体现工人产权，可产生较高积累率的“企业职工股份合作制”，再通过拍卖、租赁、转让、破产等形式来市场化配置资源。

产权改革的实质是：必须重视对劳动者财产权利的承认，还原他们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付出的劳动剩余价值。改革存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自己财产权利的觉悟之中，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乞求贵族再光荣一次”上。

开放资本市场是存量资本调节的最关键环节。这一步迈得大、动得快的地方将占很大“便宜”。因为最稀缺的、流动性强的要素仍是资金，只有资本市场先放开，货币要素才能较便宜地集中流入。工业省大中型企业较集中，如果能够率先开放资本市场，在存量调整上先走一步，发展速度可能非常快。

3. 中西部加快发展与资源资本化

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差距表面是差在收入上，由此对应产生“财政转移支付”的扶贫政策。但收入是一个变动幅度大、变动频率迅速的变量。收入之差这个现象所掩盖的本质实际上是资本量所产生的资本收益之差。西部有自然形态的资源优势，但不是资本优势。深化改革的制度安排有可能创造极大的制度效益。

例如，湖南怀化的山地制度建设试验，只是通过把原来按人均分的山地改变为可流转的“山权长期租佃制”，就使24亿资金流入这个贫困山区。

又如，地处黄淮海盐碱地区的山东济阳县孙耿镇，“集地滚地”1 700亩办工业开发区，三年之内镇财政从40万跃升到8 000万，办法就是每个农民拿出半分地，从远村往近村滚地，最后集中到镇区国道两侧变为工业用地。只要保证农民地权不变，就能实现从传统农业进入现代工业的零制度成本。

如果西部能够加大改革力度，打破部门对资源的分割垄断，有权自主加速资源资本化，加速开放资本市场，西部的资本量就能陡然增长，甚至无需财政转移支付就可赶上东部。因为其人均资本收益会随之大幅度增加。

4. 完善农村财产关系

农村资产90 000亿中的80%是地产，现在农村即使已经建立了合作社或乡镇企业的集团，也没有把这最大的资产计算进去。各个地方乡以下应该抓紧实现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重构和完善农村财产关系

曾经有过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重构财产关系、创造经济高速发长的经验。从那以后，农村经济已经发展成了工、商、建、运、服、农、林、牧、副、渔十业并举；形成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初步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框架。但财产关系基本还停留在人民公社解体时农民大包干分地时的那种状况，因此大有调整余地。

完善财产关系应包括乡一级在内。因为乡一级政府一般不存在国有资产；乡政府现在占有的资产就是原来人民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在社一级内部平调或积累的资产，人民公社解体后，转化成了乡镇政府占有的资产，其属性仍是集体所有。所以，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要特别强调把乡镇以及政府部门占有的、以原人民公社社一级集体积累资产为基础的那块资产的属性明确为乡域内全体成员共有的集体财产，并予以作股到村民组。只有这样，农村产权关系才能清晰。村委会更应该是在村社区范围内推行全员资产股份化，通过配股

折股量化到人。

完善农村财产关系应包括乡村全部工商业固定资产和农业固定资产。农业固定资产当然包括土地资产。不抓紧作股量化工作是重大失误。中央文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强调农村要素的市场化流转。不把土地从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土地无法流转，也就难以真正实现分工分业、规模经济。要素市场化流转的前提是首先要全环节地实行农村资产股份化。

5. 以小城镇建设吸纳农村过剩人口

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发展较快的地方，乡镇企业产值已经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0%～80%（在地方工业产值中占40%左右），约50%以上的劳动力在乡镇企业或其他非农就业；发展到这个阶段上，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加速城市化、尽快转移农业人口的条件。应及时把乡镇企业和非农就业人口集中到小城镇，把土地所承载的过剩农业人口转出去，缓解基本国情矛盾；只有土地承载的农业人口降下来，才能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才能提高农业的商品率、劳动生产率和积累率，农业才能市场化，也才有可能逐步改变分散的小农供给和城市成规模需求在体制上不对接的状况。

非农转移受财产关系制约。原来大包干分地时，大部分社队是按公平原则分的。只有把社区资产包括农民的土地都作了股，社区成员占有股份，可以在进城进镇后保留家里的那部分股权，产生收益凭股分红，农业剩余人口才能转移出去。如果不把土地从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谁离开就意味着谁丢失了已经实际占有多年的利益，那农业中的多余人口是转移不出去的。因为农村资产总量80%以上的地产约值80 000亿元，而且越是发达地区地产越值钱，农民为什么要丢？更何况原来大包干时土地的第一次分配本来就是按公平原则分配的，而且实际上多数搞了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地方第

二次再分配股权时仍体现了传统社会的公平原则。

这个问题在广东刚兴起开发高潮的时候表现得尤其尖锐，农民开着拖拉机包围政府，在开发区的推土机前静坐。广东46%的上访告状是因为土地纠纷引起的。而原来广东农民并不要地，到处弃耕撂荒。但是，一旦土地当作商品化开发，农民就不干了，那是农村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财产，怎能让人白白拿走？地方政府往往3万块钱1亩征，30万块钱1亩卖，中间90%的利润流失。

在土地纠纷非常尖锐的情况下，广东省政府发现一部分地区基层创造了农村股份合作制，经规范化在全省推开后，上访告状没有了。

让农民占有股权收益的办法同样可以有效促进小城镇建设，这个制度安排的效益非常大。因为城建占地要投入，而土地股份化可以不占地，初始投入可以节省下来用于城镇发展；只要政府允许社队和农民土地以股份形式参与商业开发或工业开发，按股享受红息，就可以节约制度成本。这本来就是最节约制度成本的办法。

6. 降低乡镇企业团地化的门槛

乡镇企业集中进入工业小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村以下乡镇企业发展快，主要是劳动力极度过剩条件下社区追求就业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的结果。企业办在村，可以得到社区土地资本增殖收入转移的好处。

乡镇企业创办之初，没有多少货币投入和设备投入，主要是地便宜，劳动力便宜。企业办在村受自治法保护，"大盖帽"们一般不下乡；可以土地不交钱，劳动力不付钱；不用搞行政后勤系统，也不用职工宿舍和食堂；一切社会福利保障都不要支付。这就节省了乡镇企业启动资本。如果企业经营不下去，产品卖不出去，老百姓不发工资回家种地去；什么时候卖出去再给钱，这又节省了一块机会成本。如果连行

政干预和市场风险都可以低成本避免，企业当然办在村更好。由此造成的破坏资源、污染环境，是现行的制度成本；只有改革，别无良策。

政策上强调乡镇企业集中进入工业小区，实现规模化、团地化发展，前提是先要降低进入乡镇企业小区的门槛。企业一旦离开本村，地得买，宿舍、食堂也得盖，企业成本就得提高。此外，乡镇企业的进城高门槛，还在于政府垄断征地、开发商再转手倒卖的地价太高。

县以下不实行国家征地，允许乡、村两级土地作股，可能有效地降低门槛，从而降低制度成本。乡镇企业进镇也是农村用地，为了农村经济综合发展，企业用地可以让地权股份化，这样既可以解决乡镇企业进城会增大成本的问题，也可以至少保证无地农民仍有股息收益。

如果在一个县或镇的范围内，能够让四乡八里的乡镇企业向小区集中，还可大量节约土地，节约出的土地既然是股份化的，也就便于流转，便于区域化种植，从而实现农业的规模经济。

7. 重建农村积累制度

积累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动积累；二是资金的积累。其中特别应重视的是资金积累。

在生产力要素中，资金要素是起组织作用的龙头要素。所谓重建农村积累制度，就是紧紧抓住资金这个龙头要素，在现在这样对立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下，保住最为奇缺的资金要素尽可能少地流出农业和农村。

千投入万投入，真正的农业投入主体是农民。中央决定加强在农村投入，但实际不到位，因为不存在投入机制。国家银行不可能对应 2.4 亿个小农户，现有的金融工具在小农户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上都无法进行金融运作。信用社最基层在乡一级，不能对村以下农户小额信贷作审查监督；农户贷

款成本过高，风险过大。所以，尽管1994年农行统计仅6%的资金投入农业，而农业生产照样增长。实际上，改革以来这些年，维持农业投入的主体是农民。

但是农民这种高度分散的小额投入不利于提高农业积累率。资金这个龙头要素如果形不成规模，就不成其为有组织作用的要素，就没有再扩大生产的能力，也就改变不了农民自给自足、农业商品率低的局面。

积累制度建立仍要把“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作为基础。

首先，明晰集体地权，促进土地从资源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其中，无论是实行“两田制”、“租佃制”还是“股田制”，或是实行“四荒拍卖”，都意味着转换了一个重要机制：从原来按公平原则、完全按人分配所侧重的福利功能转换为侧重生产的功能。除了保证农民基本生存需要的自留地（口粮田）外，体现生产功能必须是土地要竞争才能包得到。农民要把竞包的承包费先交给集体才能种地。四荒拍卖也是竞争拍卖才能种地。一旦实行了这样的制度按排后，农民自然会主动交钱给集体。于是，包地交钱这种制度按排连带产生了大于农户投入规模的资金要素。

其次，承包费和拍卖金都要作为农村资金积累制度建立的基础；要及时建立农民合作基金会，把所有农村中产生的资金成规模地集聚到村、乡两级。农村积累制度建设是中央早已用政策语言明确规定了的。从调查看，比较好的县一级农民合作基金会，集聚的资金规模大体上能达到三四个亿；比较好的乡一级农民合作基金会规模能达到三至五千万；极端的能达到一个亿。

再次，可以利用农民合作基金会这个载体搞生产要素在流动中的优化组合。比如专业户承包开发，到农村合作基金会融资，应允许以拍卖到的山权、林权、地权作抵押，如果经营不善收不回资金，抵押物和不动产期权可以收回重新发

包。因为农民合作基金会是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内部的信用组织，所以，全世界范围对这种合作信用组织都是给予足够的优惠的，如社区性基金会免交八种税费，不注册，不登记，不纳税，这样资金成本就比银行低，且利率还可以上下浮动。

第四，要严格执行不对外搞存贷款的政策界限。会员都应是乡、村两级合作组织成员，只进行会员内部的资源融通。由于乡镇企业也是会员，所以，乡镇企业的产权流动也可以通过合作基金会柜台交易。山区开发果园期权转让、山林期权转让，都可以通过合作基金会开个窗口，以便于规范转让，防止纠纷。

再进一步讲，可以在会员、社员之间进行结算。在乡镇企业范围内、在不同专业和环节之间不用走现金，节约了现金的在途，也就节约了资金，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一块资金量。

8. 第三产业的规模效益

第三产业的规模效益也要靠发展农村小城镇来实现。

工业的规模经济是能够创造规模效益的，但这并不绝对化。因为工业产品是可运输的，所以工厂相对分散仍能生产。对于规模经济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第三产业，因为第三产业没有规模人口和规模消费就不可能存在。

就在胶东、辽东、苏南、浙北这些集体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由于忽视了产权制度建设，因此尽管小城镇和县级城镇超前现代化，大楼盖得很好，马路修得很平，路灯都很美，但就是没有第三产业。在苏南很多小城镇，一到晚上七八点钟以后，农民下班回到村里去了，镇区里边街道是“这儿的傍晚静悄悄”。第三产业是不能放在轮子上移动的产业。饭店、理发、洗澡、娱乐业等等，没有成规模的人口，就没有成规模的消费。所以，农民人进不了城，就发展不了小城镇，就没有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

大凡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按照国营工业的模式搞

福利，按照城市模式搞农村现代化：村村通柏油路，村村通自来水、通电话；家家盖别墅，户户买轿车。然后搞村级公园，村级敬老院，村级办公大楼。高度分散，高度浪费，这些全部都进入乡镇企业成本，造成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这不仅是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在这么大工业比重的情况下，城镇不得不“带状分布”；产业结构得不到合理调整，第三产业得不到发展，农业人口也转移不出来。

所以，小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都必须以产权制度建设为前提，只有在要素从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之后，才可以加快向城镇流动，农民才可以在占有收益而不直接占有实物资产的条件下“离土离乡”。

9. 农业产业化

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最大难度就在于城乡对立的二元格局至今没有打破，农业的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两头是在城市被垄断的。部门垄断资本是当前改革的一大难题，导致市场经济条块分割的也是由部门垄断所造成的。所以，推进产业化首先强调的第一条还是打破加工、流通、金融等部门的垄断。

第二个难题是产业化要保证农业生产者获得平均利润这个目的难以实现。其背后的核心矛盾仍是产权问题。泰国正大集团可以让养鸡农户和加工企业分享利润，因为它在资产权益清楚的条件下倾向于长期收益。所以，有恒产就有恒心；无恒产就无恒心。假如城市的产权没有通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城市的企业家和职工都无恒产，那他就没有恒心，就必然是短期行为。当年城市企业搞承包制的时候，就是厂长、经理和职工一块拚光耗尽设备，增大短期收益。如果没有长期目标，不追求中长期收益，就形不成平均利润，产业化也不能发展。因为产业化就是要在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上大致都能得到均等收益的前提下，这个产业链才能形成。

所以，检验产业化是否成形的根本标准就在于：能否形成产、加、销各个环节的平均利润率。

以上所有农村改革的步骤尽管历年都已被中央文件所明确规定下来，但是，真正的贯彻执行还有待于宏观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当然，在大的环境逐步改善之下，地方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创造出有利于发展的小环境。

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

本文可能引起争论的观点如下：

（一）**东西方社会的主要差异源于不同的资源环境和不同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不同政治体制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基础因素。**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进行东方式原始积累的国家，她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对外掠夺扩张，而是主要对内“自我剥夺”：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村提取积累；另一方面以票证形式计划、分配维持城市劳动力再生产的限额消费品，从城市提取积累。

（二）中国历史上，农村社会管理一向是“社区自治”，村民们根据传统道德规范以及对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大小，筛选出“社区精英”组成“管理集团”，对农村社区进行管理与统治。应该认识到：**上下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只有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个特殊历史阶段，政府控制才真正下伸到农村基层，**它凭借的是“农产品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种相辅相成的制度。这时，政府对全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实行集权控制；而极端化意识形态的

---

* 本文最初是作者于199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演讲时的提纲。回国后整理成文征求有关杂志意见获得积极评价，但却由于当时某些方面的困难，没有任何刊物的负责人敢于公开发表，只好在我工作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内部刊物《改革与试验》1993年2月10日第2期上首发。那期刊物发出后所留下的上百份存底很快就被人要光了。

随后，本文在《发现》杂志1993年秋季号上公开刊登。《新华文摘》1993年第12期随即转载（删去了第二部分）。此后，《战略与管理》主编坚持要求再发，于是本文1994年第6期第三次在该刊发表。一篇文章被多次转发，也许说明在当时确有一定的价值。此次收入本书时，略去了图表和注释。

作用则在于国民动员的有效性。

（三）**对财产的控制和对资源的配置是权力的出发点和归宿。**集权体制建立在国家对全部资源实行垄断占有的基础上。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过程中，原有的以“按级分配”为标志的全民所有制，已在“利改税”之后渐变为“单位所有制”，**国家资本蜕变为部门垄断资本；而又由于后者并不是剩余价值的直接付出者，因而根本无权占有国家资本及收益，其法权占有必致腐败。**在中国大城市发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症结就在于此。

（四）中国当代的改革其实应被看作是毛泽东时代由亿万劳动者积累的约三万亿国家资本的一次再分配。**国家资本的再分配是“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它意味着城乡经济主体有机会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条件，在重新获得必要的启动资本的基础上，不计代价地以劳动投入替代资本投入，重建自己的财产权利结构。正是基于这一基础以及社区血地缘关系这种传统中国农业文化在国家资本再分配中所起的作用，中国近年来的农村改革和发展才能取得成功。

（五）具有家族（家庭）结构特征的农村社区组织在经济上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区域资源配置；二是收入、福利的整合。在农村组织创新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这两者都是无成本或低成本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重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因为它不仅在民间资本的再积累过程中，而且在减少制度变迁费用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

（六）基于农村改革中农户家庭凭借社区成员身份对地产和农业固定资产进行再分配的成功经验，**人们必须在城市找到一种方法，即能像分房“打分”一样来核算每个劳动者拥有的与其工龄和贡献相应的国有资产份额（包括消费性固定资产），可以让这种“劳动者份额”在政府注册之后继承、抵押或抵顶政府税费，但不许兑现。**只有当这种社会化了的国家资产在新的产权关系促进的高积累中增殖，才可以进入股

票市场兑现。

（七）研究中国体制问题的焦点在于认识城乡差别。**中国存在着两种社会，两种体制，两种政府。**城市政府相对于农村政府恰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不同的财政来源导致权力方向上的不同。而这种城乡矛盾的对立统一又正好是中国社会得以在稳定中渐变的基础。近期的改革选择是：要在城市中对国有企业和政府资产进行界定，重建一种财产关系清晰但产权结构复杂的资本形式，一步一步地打破部门资本的垄断，形成政府与各种经济主体的契约关系。

（八）**国有资产社会化再分配问题对于多数东方国家是相类似的。**如果一味地等着外国投资或本国公众购买国有企业资产（这些企业资产按理本该属于为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无偿地付出了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那么这种做法将会使国家资产在产权矛盾造成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中日益贬值。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改革，正越来越多地撞击着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对于大多数已经在新中国 40 年国家资本形成过程中付出了艰苦劳动的人而言，**改革的确走到了必须选择的岔路口上：要么，通过新的产权制度按排还原劳动者在国家资本积累过程中付出的剩余价值，并以此作为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要么，任由已经成形的部门垄断资本分割国家资源，造就出一批既不具有任何现代市场经济特征，更有悖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官僚资本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作为一种体制被确认下来之后，那些一向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们甚至还来不及感受最初的欣慰，就和社会公众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资产的瓜分狂潮忽然莫名其妙地堂而皇之起来；**尽管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感到“资本主义的丑恶”，然而又大都无可奈何地把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视为非法的政治权力控股和垄断剥夺当成市**

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同胞兄弟。

显然，一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以能代表中国人民最大多数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听任一部分已经事实上垄断性地占有国家资产的既得利益者，无论以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为名，还是以市场体制下的“股份”为名，攫取本属劳动人民的资产和收益。当十四大政治报告明确地把理顺产权作为深化改革、发育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前提时，不期然抛出的这一块“试金石”，便对所有认同或号称改革的人作出了检验。**那些大多已经在国家资本利润分配中稳定地占有既得利益份额的人，那些意识到手中含金量很大的权力正在资源重组之中渐趋弱化的人，或是那些曾经有条件借助于权力造成的财产关系混乱以“公有”谋私的人，几乎都乐得接受以往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但却几乎都不愿看到“产权清晰化”成为现实。**于是，恰恰是他们，成了国家资产瓜分潮的始作俑者……

本文的理论发现不仅仅在于对改革前30年的重要政治事件与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因果关系作出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对15年改革中非官方的民间资本再积累作出分析。民间资本这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再积累恰恰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时代由亿万劳动群众自己剩余价值形成的国家资本进行再分配的基础上的。我认为，如果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那么我的全部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当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国家资本社会化来还原劳动者在前30年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的剩余价值。**对此，我将以模型和公式来解释劳动者个人或家庭如何计算他们在国家资本再分配中的份额，以及怎样与政府重建相应的经济契约关系。

人们需要一种通俗而又系统的思想来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却又困扰了他们40年的重大历史问题。好在我们这两代以自己的剩余价值无偿投入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劳动者还在；好在用我们的血汗积累而成的国有资产不论在账面数额上还

是在可供分配的实际价值上都还不难计算。

一、国家工业化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

1. 历史不存在假设。分析历史的目的也并不仅仅在于批评判断某一事件上的谁是谁非，而在于找出一定历史时期各主要事件的合乎逻辑的本质联系。国外许多历史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总过分看重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制度"和"文化大革命"等经济、政治事件的个人影响，因而无法解释10亿中国人的积极投入。毛泽东其实是"英雄政府时代"的代表，战争赋予他们这一代英雄的光环和统治的权力。无论如何，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仅用了28年即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进步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留下了约值两三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资本，包括工农业固定资产和房地产。同时，还留下了一个表现为对立壁垒状态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

2. **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极短时期内以极高的速度完成的，这就必然带来众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在做制度成本分析时，决不应仅仅考虑经济因素，同时还要考虑政治因素。

1949年建国初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落后的农业国，只有15%的城市人口，5%的工业人口，15%的工业产值和50美元的年人均国民收入。没有海外殖民地，没有国际市场，除了苏联之外，没有外部资金投入，而苏联投入伴随着无法接受的条件（当然，在朝鲜战争中苏联曾给予过援助）。中国自1950年以来，地缘政治环境险恶，朝鲜、台湾、印度、苏联、越南和柬埔寨等区域战争和边境争端接连不断。战争需要工业，民族独立需要工业。毛泽东作为"英雄政府时代"的代表人物，拒绝以主权为代价换取苏联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中国人只能靠自我剥夺来完成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即马克思所揭示的最大限度地把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转

化为资本。**至于是由资本家或是由国家来实现这种转化，则是原始积累这个任何国家任何不同历史时期都无法跨越的历史阶段所派生的问题。**从经济实质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已有明示："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第1版，第783页）

为了实现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政府在接收了仅值一百多亿元的原国民党的官僚资产、使之成为国家工业化启动资本的最初投入之后，不久即进行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造，使之不能与稚弱但又是垄断性的国营企业竞争。于是，国家拥有了实现工业化的"启动资本"。然而，处于幼稚期的国家工业要求有稳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可它面对的却是有五千年历史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传统的农村集市交换。台湾学者柯志明曾在分析大陆20世纪50年代的原始积累问题时提到：1952年政府还可以购买到70%的贸易粮，但1953～1955年，政府购入的贸易粮却迅速从800万吨下降为仅200万吨。这是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工业劳力和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粮食的市场需求上涨导致粮价上涨（柯志明，塞尔登，1988年）。而政府恰恰在1953年开始推行统购统销，试图保住国家工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其实质是推行"剪刀差"——高价卖出工业品、低价购进农产品，这样，政府可以在买卖双方获利，国家把所获利润通过政府财政二次分配投入到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之中。

但是统购统销在推行之初不仅"统不了"，而且还适得其反，其问题在于分散的4亿农民。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不可能照搬列宁的方式让武装的工人以革命的名义强迫农民上交粮食。因此，毛泽东提出合作化，并进一步发展为人民公社制度，即把自治形态的农村社区变为准军事化的

人民公社，使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成为公社社员，这就奇迹般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政府的控制下伸到农村基层。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代表国家占有了除简单工具和居住用房之外的一切农村财产，执行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经济环节的计划控制。

1958～1978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40 年的当代史中，只有这 20 年可以说是集权体制，实践证明这个体制在国民动员上是极其有效的。这是一代人以革命的名义无私奉献，为了国家工业化而自我剥削的 20 年。从国家固定资产的投资额来看，年积累率最高可达 30%～40%，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由 200 亿增加到 600 亿以上。就这样，最终给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即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与再调整留下了一个两三万亿元的基础。

3.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中国屡次进行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回顾危机周期之前有两个因素必须首先考虑：一是在集权性的政府经济体系中，财政是最重要的核心部门；二是在 1980 年之前，除了通过国家财政再分配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投资以外，没有其他资金来源。所以，财政收支变化直接反映经济周期变化。

第一个经济危机周期（1958～1968 年）。1958～1960 年，危机发生期。政府财政赤字占收入的比例从 5.6% 增长到 14.3%，三年赤字总额达到 200 亿元，1960 年以后，由于财政投资能力下降，就业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动员大约 2 000 万城市人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

1961～1962 年，经济萧条期。国家财政年收入进一步由 572.3 亿下降到 313.6 亿。从 1982 年公开出版的 1964 年政府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60～1962 年这三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呈下降趋势，“未增加人口”大约为 2 000 万人，这其中大部分人可认为死于饥饿。人们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1963～1964 年，复苏期。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机压迫下放

松了经济控制，允许农民（人民公社社员）搞“三自一包（这种以‘放’为特征的经济改革15年后再次重演，只是改名叫联产承包了）”，因此，使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由原来的8%上升到22%，财政形势好转。

此时，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路线上的斗争越来越明显，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无法解决基层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孕育阶段（以后的章节里我将阐述这方面的观点）。

1965～1966年，高涨期。国家在经济形势初步好转后，增加了对工业的投资，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紧接着财政赤字再次出现……随后，1968年上百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其真正原因仍在于城市无法解决高失业率。

4. 第二个经济危机周期（1978～1986年）。1978～1979年，危机发生，国家财政赤字每年约为200亿，占总收入的比例高达20%，比上一次危机爆发时的比例还高5%。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只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影响，还有“洋跃进”——大规模举债用于工业投资以及中越边境战争造成的非预算性开支。

1980～1981年，经济萧条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分户经营，承包土地，开放集市贸易。这就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这不仅是上一次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而且很像是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通过战争获取新政权的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而采取的“均田免赋”政策。与上一次经济危机不同的是，没有迫使城市人去农村解决失业问题**，因此，城市犯罪率增高，监狱暴满。

1982～1983年，复苏阶段。由于对农村土地的再分配和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开放，粮食产量每年增加20%，这三年的总增加量约为75亿吨。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农业产值也提高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

1984～1986年，高涨阶段。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加快，同期财政赤字每年大约增加100亿元。其中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年“利改税”之后形成的国有资产“单位所有制”。由于国家垄断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财政投资的无偿性，因此，相对于较高的物价水平而言，任何单位获得投资本身即是意味着吃进利差，这就必然造成投资膨胀；又由于单位内部“利益同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一般有30%～50%的部分会以各种渠道转化为消费基金，自1983年以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于是，消费膨胀接踵而至。在投资和消费双重膨胀压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转化的超发货币量终于引发出全面通货膨胀危机。

5. **正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危机导致了第一步农村改革一样，80年代中期的危机也促进了城市改革。**农村改革中，人民公社解体，使农村发育出各种独立的经济主体，并成为商品经济的基础，农村社会恢复了自治形态。从而以人民公社体制作组织保障的统购统销制度难于运作，农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渐次开放，真正具革命性的商品经济新体制于是在农村形成。同理，城市改革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触及产权，城市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份化使政府部门垄断和计划控制相对弱化，工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也渐次放开。因此，假如没有新的战争把现在的中国“平民政府”再一次造成“英雄政府”，则中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6. **1988年全国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危机和1989年的社会政治危机相继发生，**如果可以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来分析政府决策，则可以看到，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强行压减投资、消费双膨胀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政府于1988年末开始连续大幅度调高利率，存贷款利率一度升高70%～80%。**这种流量资本调节的极端性措施是在不触动存量资本的情况下运**

作的，因此，必然会由于企业产权虚置而造成极端性后果：银行高利率造成企业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动资金贷款最多的商业企业被迫减少资金占用，改购进为代销向生产企业转嫁成本负担——生产企业如法炮制缓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业转嫁产品成本占压资金负担——连锁负债迅速波及全社会。在这样恶劣的经济环境之下，企业管理效益每况愈下，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可供中央分配的资源和利益份额减少，调控能力随之下降，各部门与地方之间“条块”矛盾加剧，终于，传统体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又都走到再也走不下去、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了。由于过去不动产权的改革已经给政府留下了足够的教训，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触及“公有国营”经济单位的产权关系。

二、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经济周期与重大政治性事件的关系

1. 中国改革前30年所发生的那些引起世人非议的政治运动，大多数与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本身的严酷性有关：**大规模聚敛资源、财富，短时期内高速度完成国家工业化，支付社会代价作为制度成本当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越是贫困，社会财富的分配就越是要求平均化，即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一种政治文化。于是，不发达国家中社会物质财富分配上任何“不均”，都易于表现为一种阶级不平等关系。这一点早已被列宁认识到了，而后来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的。

2. 不妨从刘少奇、邓子恢的“砍社”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开始作分析。如前所述，统购统销在推行之初是不可能单独运作的，因为中国的农户是处于分散状态的。接踵而来的是1955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和“组织起来”。刘少奇和邓子恢的确意识到农户并不愿意加入合作社，因为他们在

"土地革命战争"中付出了生命和鲜血才获得新中国政府分给他们的小块土地。全党通过的刘少奇有关"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述与农村集体化运动并不一致。邓子恢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理当保护农民利益，于是他们同意那些不够条件的合作社解散。但这一切与毛泽东决心搞国家工业化、从农村中提取积累的战略思想显然是对立的。因为国家工业化又必须以集体化组织作为载体保证统购统销。结果，中央农工部被撤销，邓子恢被免去职务。

3. 若不是本文作者在1978～1979年为20年前的右派进行平反的工作中亲手整理过150多份历史档案，我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会至今迷惑不解。**我在阅读那些案卷中发现，很多"右派"提出的意见大都反映工农群众生活苦，劳动者受剥削；他们当时所引用的理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精辟的剩余价值学说**。更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有个知名的始终未平反的"右派分子"竟在后来的文化革命中指出，今天红卫兵所做的（指打倒党内资产阶级）正是昨天我们想做而没做成的。纯粹借用解剖学的价值观来看待1957年，似乎应该认识到，**毛泽东若想继续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原始积累，只能用政治手段制止知识分子们并不为过的"反映"**。同理，也可解释1958年庐山会议制止彭德怀元帅并不为过的批评。

4. 毛泽东本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并不强调阶级斗争，反而认为"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伟大时代"。因为1953～1960年，中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从90.159亿元迅速增加到410.658亿元。国家工业化初期的积累速度和幅度都是惊人的。不过，**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来迫使弱小的私营资本演变为国家资本是容易的。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以集体化运动迫使占人口85%的小农交出生产资料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则是十分困难的，这无异于维系了数千年的以自给**

自足和村社自治为特征的传统农业文化发生断裂。当代表农民利益的中央农工部被撤销，反映农民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彭德怀元帅被打倒后，农民就开始怠工、损坏劳动工具、虐待牲畜等。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劳动力的积极性下降直接影响农业产量。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农业产值占绝对份额，因此，农业的危机即成为全社会的危机。

5. 对50年代末开始的危机周期，上文已有表述。在危机和萧条阶段，当许多农民因饥饿而家破人亡时，大多数社队干部还能保全家小。这种“你死我活”的现象也可看作是四清运动的起因。但由于农村普遍贫困，“老四不清干部下台，新四不清干部上台”则可看作是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起因。就在同一时期，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一批高级干部在农村基层实际情况的触动下，进行了类似“畅观楼会议”的政治活动，此后并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获取了经济调整权。然而这一切，又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因，因为“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便又发生了”。

6. **毛泽东从提出阶级斗争到最终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用了15年时间。但直到他去世，也没能改变这一理论“用头站在地上”的遗憾，因为他始终未能说明到底是谁怎样占有生产资料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而这一点又正好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得以用脚站立的基础问题。**尽管毛泽东晚年提出“三有一高（即有保姆、有汽车、有房子，高工资）”概念作为判别“党内资产阶级”的标志，但仍只是说明了最终消费环节上的差异现象。

无论如何，毛泽东和他代表的“英雄政府时代”以极大的自我牺牲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留给后人两大历史功绩：一是留下约二三万亿元的工农业固定资产和房地产——以国家占有为名的巨额资本，以使后人在改革再分配的经济运动中有产可分；二是留下了一个有别于其他周边社会

主义国家的独立主权国家，以使后人在开始改革时不必担心街头会出现外国坦克。诚然，历史不存在假设，但行文至此，仍不免假设一下：如果当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加入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那么今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会瓦解吗？

三、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比较分析

1. 中国与前苏联、东欧诸国在国家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中国十年改革的成功之所在，即在于从国家垄断资本控制最薄弱的环节——农村入手，将国家以人民公社名义所拥有的土地资本再分配为以农户承包为形式的小额劳动者资本，创造了以大量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进行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而城市改革从“利改税”入手作为第一步，恰恰让各部门根据实际所占有的资产收益留利交税，这就静悄悄地使国家资本转化为了部门资本。

堪称无独有偶的是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触及城市工业体制中部门垄断资本的产权问题时，所遇到的麻烦与前苏联、东欧诸国绝无二致**，随着国家资本演化为部门资本，全民所有制演化为单位所有制，国营企业产权的“灰化”程度越来越大，部分城市企业职工早已把“爱厂如家”变成“厂里有啥家有啥”，而各类干部则依托自己控制的部门资本份额来进行“资源置换、权钱交易”，社会性的腐败正在蔓延。而从传统意识形态出发，在经济上采取对国营企业“输血”、“倾斜”的政策，则不仅造成数千亿无效益投资转化为库存占压资金和消费基金的大量增加，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腐败。

2. 前苏联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也充满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是无情的肉体消灭。布哈林在20年代即揭示出原始积累对于后发达国家的必然性。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詹斯基

曾经指出，发达国家与后进国家在原始积累过程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依靠商业资本的市场渐进过程，而后者则是国营企业对农民进行不等价交换的计划过程。尽管布哈林和联共（布）党内一些人反对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农民，但世界上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让自己的人民承受了自我剥夺的历史性痛苦。无独有偶，中国人忽视了布哈林主义，但其积累过程却仍被布哈林不幸而言中。

3. 既然在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或称部门资本以及全民所有制演化为产权关系极度模糊的单位所有制具有苏联、东欧诸国（包括中国城市体制）的本质性弊端，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国家资本社会化”，即通过清晰国营企业产权；还原劳动者付出的剩余价值，据以建立劳动者资产份额，并以此作为劳动者资本再积累基础的经济机制，以此改造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政体，发展由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当然不是私有化，而是真正按马克思原意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的一步。

4. 西方舆论界对东欧国营企业民营化的诸种问题有不少分析，较为表面化的有两种：一是分析企业本身的问题，即认为企业设备陈旧、管理水平和职工素质低下，无法运转；二是市场环境问题，认为不仅政治不稳定，而且缺乏资本市场必备的资产评估。而要等东欧诸国建立起必要的制度环境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他们认为起码还需 30 年。无论是根据西方经济制度提出的私有化方案，还是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得出的分析判断，其针对的仍是苏东诸国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概念，而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这种“完全公有制”现阶段只是名义上的或理念上的；而实际上，无论苏东诸国还是中国，公有制国营企事业单位早已在开放市场、货币交换的同时，静悄悄地转化为了“单位所有制（企业所有制）”。

大多数二战之后形成的东方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工业体系建设的过程上有相似之处。在工业化初期，国家凭借革命战争形成的权威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获取工农业劳动者全部剩余价值，形成国家资本。而对付出剩余价值的“国家主人”——劳动者，则通过平均分配消费品或票证供应支付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此时，**因为体现在最终消费环节上的平均化，使得“国家主人”并不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在这个意义上，全民所有制在原始积累阶段是存在的，也是可以掩盖产权主体不清的问题的。**

但是，一旦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结束，各产业门类之间日趋频繁的交换便产生出日趋明显的不同利益，国家资本的公有制形式和内容即演变为各个国营单位依据事实上占有的不同国家资本份额享有不同资本收益，从而造成社会收益分配差别化的部门资本。**部门资本的受益主体是政府部门自身，而这些部门并不是付出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为了维护其所有权的合法性，部门资本所派生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必然一方面加强政治强权，形成官僚集权政体；另一方面则必然强调“既得利益者所有制”的合理合法，维持僵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如果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认识到：这种资本形式包含的产权关系不仅是最模糊的，而且也是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东方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国营企业长期不景气，财政包袱沉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甚至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这种产权关系为内容的所有制和以这种所有制为名的企业资产，在任何主义、任何制度、任何国家中，尚无成功运转的先例。**

因此，应该从企业产权清晰人手，还原不合理的部门资本所占有的劳动者份额，再建立独立的产权主体，使之进人有制度约束的市场。这样才有可能打破国家（部门）资本的垄断，铲除官僚集权政体的根基。这个过程中，公众中新的利益分配机制产生，人们才会意识到产生于市场交换中的平

等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权利。于是，民主政体和和市场经济便有了社会基础。而这个过程的起码条件是要求有相对稳定而权威的政治控制……。如果像苏东各国那样搞私有化，把已经产权关系不清楚的国营企业统统交给一个新组建的、从未在资本形成过程中起过作用的、依靠一种并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私有化部”来售卖，那当然解决不了苏东诸国的问题。

5. 从国家垄断资本最薄弱的农村入手发育市场，奠定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是中国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实是搞了“国家资本主义”。而中国最近10年的经济发展，则是对国家资本作了一次“社会化”的再分配，各种非官方的独立经济主体在市场条件下的再原始积累。

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之前，中国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所必需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条件：一是通过战争夺得政权的“英雄政府”的有力控制；二是国民动员机制中作用较强的极端化意识形态；三是通过自上而下结构严密的组织体系贯彻“剪刀差”，以垄断性的不等价交换获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这些特征在多数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类似的。**如果不涉及庸俗的意识形态之争，那么东西方之间真正实质性的区别在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方式、方法的不同。

6. 中国50年代初只有5%的工业人口，15%的工业产值，15%的城市人口，人均国民收入仅50美元；没有外部市场，没有外部资金投入，并且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险恶，从朝鲜战争开始，区域战争和边境争端不断。在苏联断绝援助和西方封锁的条件下，实现中国工业化高速积累的制度选择是集权体制下的“自我剥夺”。政府通过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无偿没收和对私营工商业的“赎买”，建立起国营工业的“启动

资本"，然后通过"统购统销"关闭市场，垄断经营，推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使政府在高价销售工业品和低价收购农产品两头获利，再以财政二次分配和计划调拨形式投入国家工业化建设。

而为了保证统购统销的垄断性，扼止亿万自给自足小农的反抗，则必须在农村组建控制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部经济环节的政社合一的准军事组织——人民公社；在城市，则建立以利益分配机制固化其中的科层金字塔式体制结构，向城市劳动者凭证分配低价生活必须品，以保证工业劳力的简单再生产。这样，城乡工农业劳动者全部剩余价值都通过这种体制投人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经过不到 30 年，到 70 年代末，中国已形成了大约二万亿工农业固定资产和房地产。那时，由于公众在不同层次上的最终消费大致平等，因此，只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公有制"是客观存在的。

不过，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感到，以全民或国家为名占有生产资料，剥夺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在最终消费上按级别层次分配这种制度并不合理。尽管毛泽东本人并未说明官僚特权阶层是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者，是国家资本的受益者，但他毕竟提出了"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概念，并利用劳动者因长期被剥夺而久已积蓄的不满，发动了亿万中国人参与的文化大革命。

7. 如果单纯从城市经济看，中国的问题与前苏联、东欧诸国相类似：国营企业效益低下——政府税收困难，财政赤字增加，举借内外债，通货膨胀——政府调控能力下降，社会动乱……；造成此类问题的根源也是类似的，即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完成之后，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专业分工——各个产业门类之间交换频繁必然要求符合价值规律的市场体系取代旧的计划分配体系——市场化的商品交换冲击了旧的集权主义政体。

如果以上描述成立，那么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改

革与发展趋势也就清楚了。尽管1989年的事件使各方面对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失去信心；尽管中国国内决策曾一度企图靠“输血”给国营企业维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但这两方面显然都囿于庸俗的意识形态之争，因而都错了。

正如上文提及，**国家资本的本质属性并非“公有制”**。中国80年代上半期城市经济改革提出“利改税（国营企业的全额上交利润由财政统收统支改为上交税金）”之后，政府各部门分割占有国家资本并享有资本收益的“部门垄断资本”性质即随着部门之间日渐明显的既得利益差别而显露出来。中央政府（国务院）决策也渐渐从“统一号令”转化为“平衡协调”。在宏观价格体系尚未理顺、市场环境尚未形成的经济条件下，占有较大份额国家资本或低价资源的政府部门即可获得较大份额的收益，接着发生的就是“权钱交易”、“官倒”。从根源上说，这些政府部门并未在原始积累阶段付出自己劳动的剩余价值，因而无权分割并垄断性地占有国家资本及其收益。可以认为，国家资本潜移默化为部门垄断资本，这是认识中国城市经济问题的关键。

进一步对归属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国营企业做分析则可以发现，企业产权的实际属性也已从国家所有制演化为“单位所有制”了，即企业负责人与职工利益同构，共同占有企业资产并分享资产收益，但都无人对资产增殖负责。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没有认清上述问题，在未对企业产权做界定之前即推行企业承包，便造成企业负责人与职工共同拼设备以扩大消费份额的短期行为。

既然部门垄断资本和单位所有制是中国乃至前苏联、东欧诸国国营经济的通病，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清晰产权，即通过还原企业资产中劳动者剩余价值形成的积累为“劳动者资本份额”，使之成为劳动者大量投人劳动、进行民间资本再原始积累的基础。这是推行股份制的真正合理内涵。

四、国家资本再分配是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

1. 如前文所述，中国在40年中曾有两次明显的经济危机周期。两次经济危机周期的共同点都在于：导致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内向型积累的惟一来源——国家财政发生严重赤字；而缓解危机的有效政策都是"三自一包"，只不过第二次是"大包干"，即把国家资本的一半作了一次静悄悄的分配。农村人民公社的地产和农业固定资产根据区域血地缘关系所赋予社区成员的天然权利大多分配到户，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于是，农村户营经济有了再原始积累的基础，从而不期然地创造了80年代上半期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其理论意义，类似现在*捷克、罗马尼亚的"国家资本社会化"。

其不同点：一是中国农村是国家垄断资本统治最薄弱的领域。农村的国家资本再分配是国家资本垄断经营获取剩余价值的基础——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同时解体，中国从此有了发育独立经济主体和政治主体所必需的市场化前提；二是这种再分配为"民间资本再原始积累"奠定了产权关系基本清楚的基础。劳动替代资本，即个体经济或户营经济不计报酬地大量劳动投入，创造出成倍于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民间资本再积累率。

2. 于是，中国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中有了新的变化：集中的部门垄断经营的城市资本与分散的民间市场化的农村资本相对立；与之相关联的则是城市政治和农村政治因为利益结构不同和权力指向不同而对立。这两种对立是中国得以在苏联东欧巨变之中幸免并仍可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

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从事商品生产并演变为纳税人阶

---

* 所谓现在，是指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情况。作者在本书收入的文章"东欧原国营企业'民营化'的产权问题"一文中有详细描述。

层，除交纳农业类税赋外，还向地方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交纳以提留、统筹为名的“行政税”，以农业主产品合同定购为名的“经济税”。因此，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日渐现代化。农村社区自治组织通过普选实现直接民主；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建立经济契约关系，变行政控制为管理服务。而在城市，除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者之外，市民仍为非纳税人，并且是享受全面消费补贴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城市政府对于市民仍通过既得利益分配机制来保持集权政体的行政控制关系。

3.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说到底是允许农民对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巨额资产的一半，即人民公社的地产和农业固定资产，由农民自发地按照平等原则，作了一次静悄悄的革命——权力财产的再分配。它意味着农户经济在形成之初即有机会获取最起码的“启动资本”，可以在户规模内优化要素配置。**农户家庭和具有家族（家庭）结构特征的农村社区组织在经济上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区域资源配置功能；二是收入、福利的整合功能。在农村组织创新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这两者都是无成本或低成本的。**因此，效益最优，收益和剩余绝对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改革的特殊贡献。“大包干”之后，村、户之间形成两极化的产权构造，利益关系基本清楚。其后的发展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农户经济的发展实质是一次非官方民间资本的再原始积累，表现为农户家庭成员不计成本的活劳动替代物化劳动资本投入后所创造的高积累；农村户营经济的剩余必然转化为货币，并且其投向在剪刀差作用下可以产生超额利润的非农产业。然后是城乡壁垒条件下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4. 与第一次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浪潮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它随着农村中工业对于规模经济的追求和市场条件下不同产业之间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乡镇企业团地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得到同步发展。

此时，农村中以国家资本再分配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及其相伴生的大规模市场交换，必然对另一半国家资本，即城市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和政府房地产形成压力，迫使城市国有资产进行社会化再分配，以此为城市非官方民间资本再原始积累奠定基础，形成本世纪末市场趋向的第三次工业化浪潮[*]。

5. 城市国有资产民营化已经普遍，国家资本社会化再分配也已经有很多经验可循。从改革试验区的操作经验来看，界定企业产权，划分劳动者资本份额是第一步前提，正如股份只是企业资产的一种形式一样，劳动者资本份额也可以表现为股份。可参照的模型和公式如下：

$$模型：\sum_{i=1}^{n} = (C - I - GF)/En$$

公式：

$$LC = [(C - I - GF)/En \times AW - H] \times P$$

LC＝劳动者资本份额（Labor's Capital）。

C＝企业账面资产（Captial）。

I＝银行借贷投资（Investment from Bank loan）。

F＝政府财政优惠（Goverment Financial ）。

En＝企业职工总数（Employee Number）。

AW＝企业年平均利润率与个别职工劳动工龄构成的系数（Coeffeciancy of Average Interest by Different Working Ages）。

H＝企业付给个别职工的福利或住房（Social Welfare or Worker's House Distributed by Enterprice）。

P＝职务权重（Wighting of Position）。

---

* 本文公开发表之时的1993年，中国确实发生了第三次工业化浪潮，民间资本也确实有大的发展。但是并没有出现"社会化分配"。作者显然低估了部门垄断资本捍卫权益和左右决策的能力。

6. 即使参照上述公式划分了股份，也只是一种表面化的“骗局”，因为迫使劳动者资本份额成为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大幅度促进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以高积累率加快经济发展才是第二步要实现的目标。其中的原则是：不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再积累的人，其份额和股份永不兑现。可参考的做法如下：

第一，由政府财政、税务、工商管理、劳动人事和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门合组一个权威性办公室，为国家资本再分配确定劳动者资本份额做登记。

第二，在原企业中工作的职工可依据经过登记的劳动者资本份额作股，并享受股息红利。被原企业解聘或自愿辞职的职工，可凭份额申领私营、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上述联合办公室通过减免税的办法逐年冲抵该职工份额，同时将冲抵数转账，使之成为政府股份；政府可通过股票市场出售收回的股票。

第三，被解聘职工若被其他企业重新雇用，其在原单位资本份额即从账面转入新单位。此时，政府可通过逐年增加原单位税费同时减免新单位税费的办法来转移此类职工的资本份额。

以上公式和操作步骤尚待更多的实证检验。

7.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城市国营经济“负效益”十分严重，国营企业亏损面从 30%扩大为 60%；国家财政补贴占全部财政开支三分之一；企业新增债务和新增库存占压资金加上历年财政赤字形成的超发货币量，几乎等价于国营工业账面固定资产……这种险恶的经济局面比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时状况更为严重，但中国仍能不垮，全在于占人口 80%以上的农村商品生产者所提供的农副产品商品量占市场份额的绝对供给量；全在于被隔绝于城市体制之外的农村有一个发展了十几年的市场化的民间资本再积累，它创造出了数以万亿元人民币计的新财富增量。中国城乡关系

好比“四抬大轿”，四个农人抬一个城人，四平八稳。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在于农村生产力解放；中国的政治稳定在于农村自治社会与基层政权的新型政治关系。

民间资本原始积累与政府行为

——温州调查的理论推断*

以产权关系清晰和市场初步发育为主要特征的温州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最好试验场。但必须申明的是，由于目前统计系统基本上服务于传统社会经济体制，不可能提供以私营经济为主要成分的非国营企业的数据，所以，本文并未掌握足够的数据依据，用以支持所述论点。因而这里只能算作是“理论推断”。

一、民间资本的原始积累

温州国营工业资本在改革前30年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并未获得长足进展。由于地处海防前线，从20世纪50年代起，台湾海峡的紧张对峙使得温州这个前线地区不可能获得较大份额的工业投资。而且，温州地区资源严重短缺，除个别矿产外，缺乏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不通铁路，空运、公路距经济发达的杭嘉湖平原有数百公里之遥。农村耕地资源奇缺，人均不足半亩地。惟一可资利用的只有人力。也许

---

* 本文是作者1988年秋季在农村试验区工作时进行的温州调查，发表于《经济学周报》1989年1月29日第7版。当时温州的私营个体经济正好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在国家意识形态制约下，温州大多数作坊式的小企业基本上从自我剥夺起步，其经济发展过程非常清晰地表现出“资本来到世上”的特征。

正因为国家资本在温州过于薄弱，才给民间资本发育留下了生存空间。

目前温州非国营经济的支柱产业，如从产值上亿元的塑料编织到低压电器、钮扣、再生晴纶等，均从废旧材料加工开始。最初的发展，除了靠低成本的物化劳动投入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本。这也是温州非国营经济主要是家庭作坊式工场形式的内在原因。原有大量滞留在人均不足半亩耕地上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者其边际收益近于零。在改革中获得身份自由之后，这些人力资本一旦进入加工工业，其收益的增长率几乎是无法计量的。

当然，在初始资本启动之后，雇工经营必然产生。这首先是规模效益的要求，其本身只应受技术和市场的限制，而不是受政治限制。**尽管雇工经营是对他人劳动所创造剩余价值的占有，但这种占有的基础是更为残酷的自我剥夺。**

温州非国营经济是以完全市场化为条件的。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从事原材料生产、加工及运销服务等行业的经营者都能获得大体均等的收益。平均利润率的作用使资本得以在流通、生产、金融各方面自然转移，为资源优化配置、利益整合提供必备条件，并直接导致了两种现象的产生：其一是社区利益整合之下的社会中间等级或称中产阶级应运而生；其二是小城镇的空前发展。也恰恰是以此为基础，以小政府大经济为特征的温州乡镇政府产生了。

二、社区利益整合

在温州民间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廉价人力资本造成超额利润，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由此引起贫富差距扩大。但这种现象是短期的，很快即被社区利益整合的作用所调节。**与平均利润率在市场条件下对收益所做的调节相区别的是：社区利益整合的方式是非货币形态的。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

文化在商品经济发育过程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例证。我们在温州随机访问调查了一批干部群众，并走访了他们的家庭。由于无法对存款、股票、债券及其他收入做调查，又由于目前尚无准确反映收支变动的统计资料，因此，这种纯粹随机访问所得到的印象尚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所以，这里提供的仍只是一种推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核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收入和开支的经济活动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在我们的随机访谈中，70%左右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党政工作人员，都能得到社区内血缘亲属各种形式的经济帮助。有的是免费住房（温州市住宅70%是私房）；有的是获得高档消费品，如冰箱、彩电；还有的家庭成员在民营企业中参股，或者是做高收入的经理人员。据反映，仅极少数纯外地干部由于在本地没有亲缘关系，不能参与社区利益整合，处于生活拮据状态。

温州人认为，在当地650万人口中，万元户起码有200万户。社区利益整合使得享受中等以上生活水平的社会中间等级阶层得以产生。这是温州社会基本稳定的基础力量。温州市政府曾作出决定，允许干部停薪留职承包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并且保留他们的一切福利待遇，甚至不耽误提级，但至今响应者寥寥。温州大街小巷到处有高薪聘请专业人员的广告，离退休人员80%以上重新就业。这些反映出机会的均等及在其基础上社会收益均等的可能性。

三、城镇化与资本集聚

由于缺乏统计资料，特别是缺乏不同层次的民间资本经营行为调查。因此，我们只能从温州近年来小城镇由26个迅速发展到100多个对民间资本的迅速集中作间接推断。

温州市近年发展起来的城镇中，投资约80%以上来自民

间，**并且鲜见反抗如此巨额摊派的告状、抗议。**所有城镇投资动辄数以亿计，大量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如三通一平、教育、卫生等。实施这种投资的多数是已成为产销基地和商品集散地的乡、镇、村级“准政府”。**温州新兴城镇的地方政府多数维持 20 人左右的编制，很少搞楼堂馆所、添置轿车等。**城镇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只对域内各类企业进行统计和财务监督，这部分管理费用从企业收取。也就是说，进入域内的企业越多，效益越好，城镇政府从管理中所获取的利益越大。这就是温州小城镇政府通过优化投资环境吸引企业的直接利益动因。**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初始资本全靠自我集聚，与原有社会经济体制并无财产关系。因此，只要在城镇获得的规模效益大于原来在农村的分散效益，资本就自然会向城镇集聚。**

城市体制改革的滞后，特别是牵涉旧的利益分配关系的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滞后，使得政府对于迅速发展的民营企业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增量难以进行调节。所以，具有独立色彩的乡镇“准政府”原有的整合能力便被放大。因其所具有的优势主要是位居商品集散地的“地利”，于是，以出卖地皮筹集建设的资金，随三通一平的程度按级差地租比例形式调节集资额度等的“非税”形式的收入调节机制自然产生。在温州新兴的 100 多个城镇上有一个共同而有意思的现象：国营工商企业寥若晨星。这起码可说明一个道理：这里没有政府与国营企业间那种“父爱主义”的关系。

四、危机之下的民间资本

任何危机局面中的政府对策都是受制于利益结构冲突的产物；**而在危机局面之中首当其冲的是民间资本，因为在政府中并无与它们利益攸关的权力部门，它们在利益结构矛盾中也尚未形成社会集团。**

1988年浙江全省现金投放30多个亿，其中70%在温州，而温州投放的现金有80%流向外地，这叫“替外投放”。因此，民营企业最怕控制现金，因为只有钱是它地位、信誉和利益份额的惟一凭证。

但是直接现金结算毕竟掩盖着市场发育初期契约关系和商业信誉低下等问题。当危机降临，现金突然严控，必然会造成双重后果：一面助长了金融投机如高利贷等活动的加剧；另一面则迫使挣扎图存的民办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展票据业务，促进契约关系。

温州民间资本在危机开始之后迅速产生调适反应，部分企业开始尝试以商业票据交换替代远程现金结算，私人金融业则试图发行个人转账支票和信用卡。而这一切初露端倪的自我调适，当然是在大量企业停工歇业，甚至倒闭等血淋淋的事实出现后发生的。

西部开发与中国发展战略的两个思路*

近来**有些关于西部开发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观点：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放。尽管这种讨论意见到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司空见惯的报刊炒作阶段，也许并无碍大局，但我们仍然有必要提醒各地和各界，不要让这种观点影响到“十五规划”的制定和西部开发项目的实际执行。因为，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放。

之所以如此说，是考虑到这个提法关系重大：**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一直有两种思路：到底是依靠外需为主，还是通过努力扩大内需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从近20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看，尤其从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后的5年来看，进出口对经济增长速度当然有明显的拉动或抑制作用。1994～1995年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曾经超过40%。从2000年上半年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再次提高到超过45%。这几乎比美国高1倍。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大陆国家，尽管不能自诩地大物博，但大国的优势本来就在于内需市场，而且长期走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

---

* 这是为中宏网上“关于西部开发的讨论”所写的评论，收入本书时作了简单修改。原文发表于中宏网“专题集粹”专栏。

** 指2000年上半年。

*** 也称“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近20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快速提高，从1978年的9.8%提高到1999年的36.4%，其中1994年在外汇并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作用下曾一度高达40.6%。

从长期看，中国必须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目标，下大力气扩大内需。而西部开发的提出，显然是为了改变最近五年过于依赖外需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制约的，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企业开拓内需市场的发展战略**。

因此我才认为，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放。

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江泽民总书记是在1999年6月西北5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他认为，我国西部开发将成为21世纪国家经济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并且明确指出，西部开发对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是重大历史机遇，因为这将**给国有企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其本意是明确的：西部开发是政府行为**，如果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带动西部开发，所形成的市场空间将主要对应解决国内民族制造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问题，解决国有企业的脱困、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其次，中国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于对中国人征收的税费。**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意味着要把全国老百姓的钱拿来投资，既让中国人扩大就业，为人民谋取利益，又为国家创造财富。当然不是给外商牟利，给外国人扩大就业**。

更何况西部开发中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当部分还是政府举债，是今天的人花子孙的钱。把这种资金用于对外采购是不合适的行为。

再次，西部开发如果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那么，国内基建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以及工程项目的施工能力，比国外并没有明显差距。**实行“国家投资，国内采购”的政策，既有利于促进国内就业，劳动力有收入又会产生“乘数效应”**，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改变市场疲软、内需不足的矛盾。

这三个方面的道理实在是非常浅显的，关键看影响各级政府、所属部门及其领导人的利益取向。

中国的西南开发与南下战略

——中国大西南与湄公河走廊的“亚区域”综合开发

“澜沧江社会经济变迁”课题组（1993）

作者说明：

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走出去的时候了。如果“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如果我们得以在接受“全球化”不可逆这个趋势的时候不是简单地跟从，而是树立中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全球意识”，就能够在发展战略上形成新的思路和概念。

当西部开发终于成为被广泛关注的国家战略的时候，人们多数是把西部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对此，我提出的异议是：**中国西部开发应该把西北与西南相区别，西北应该与中亚石油经济区域开发共同协调整合；西南则应该与中南亚和南亚经济开发相结合。**

大西南在经济地理条件上看，其开发战略本来就应该与中南亚和南亚的资源整合经济开发相协调。**中国西南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和劳动力都严重过剩，国家应该以出口信贷相配合，主动提出建设大西南与南下中南亚和南亚通道问题，提出开辟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出海口的任务；进一步启动“亚非大陆桥”建设，以此重新协调全球化趋势下的“南南合作”。**

这种亚区域发展机会的重大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把中国西南从“梯度理论”和“西部开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有鉴于此，我重新整理了1993年与澳大利亚合作承担福特基金会课题时提交的一份报告。当年的课题名称是“澜沧江流域社会经济变迁”，与这个报告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因此上送后并没有反馈，客观上也不应该要求一般微观领域的研究机构对这样关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亚区域”发展问题有反应。现在重新发表，只是提出思路，希望引起讨论。

摘要：

1.“金三角”，这个惯常刺激起人们对亚热带雨林、黑社会贩毒、国民党残军等一系列小说情节和电影画面印象的特殊地理词汇，如今在中国西南边疆大面积对外开放和印支半岛的一片和平绿色中，已经被中、老、泰、缅四国的官民等改称为代表经济协作、共同发展的“金四角”。昔日金三角已经变成了旅游区。当外国游客怀着探秘寻幽的好奇，千里迢迢进入泰缅边境的深山中，他们除了偶而能听到已经“归化”为泰国公民的前“国军”遗老遗少讲述如何在半个世纪前被毛先生“赶”出来的故事而外，实在无法产生那种预期的神秘，只得怅然而去。不过，穿梭于金四角的学者、商人、政客们却来不及发思古之幽情，形势变化之快确已令人产生不同程度的紧迫感。

2. 近一时期来，国际社会日益关注“澜沧江—湄公河走廊”、“中老缅泰金四角亚区域经济开发”等中南亚热点问题；而且其敏感程度正随着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的投资开发热度升高而日甚一日。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政治、军事上逐步退出对印支地区的介入后，曾经对中南亚进行殖民控制或侵略战争的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势力正在卷土而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和台湾、新加坡、南韩等亚洲新秀也纷纷介入，连越南、泰国这类欠发达国家也在为争霸“亚区域”舵主地位而明争暗斗……面对这种紧迫局面，我国本可以以中老泰缅“金四角”开发为跳板，以合作开发的经

济手段打通“丝绸南路”的海上通道，但当前却由于体制上的问题且退且守。

3. 中国西南“三江春水向南流”：怒江—萨尔温江流经中、缅，注入印度洋；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中、老、缅、泰、柬、越，注入南海；元江—红河流经中、越，注入北部湾。中国阶梯形地理走向中，惟独横断山脉在青藏高原剧烈隆起的边缘切割云贵高原，形成这三条弥足珍贵的南向国际水道，为中国西南地区开通出比“向东发展”缩短 3 000～5 000 公里运程的“丝绸南路”奠定了基础，也给大西南开发提出了重新计算对外开放的市场半径的新问题。

4. 中国“八七攻坚计划”要在 20 世纪基本脱贫的 8 000 万贫困人口中，有 60%即大约 5 000 万分布在大西南的云、贵、川三省。中国西部地区由于在经济地理环境上劣于东部而长期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90 年代以来，随着越、柬等印支半岛国家战乱的逐渐平息，国际社会正日益把有经验的发展眼光投向这里；中国南疆与湄公河走廊诸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一块“和平红利”生长区；这个地区的“亚区域开发”已经提上日程。

5. 可考虑的方案如下：

一是把新增用于贫困地区的贷款切割出一块，定向用于“南下开发计划”，同时吸引世行、亚行投资的配套资金，以此组织大西南过剩的工业劳力，结合承包湄公河走廊的水电、航运、交通工程统一输出；进一步开凿从澜沧江—湄公河连通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的“中南半岛运河”，建立中国南下印度洋的出海口，借以发育湄公河沿岸 6 国和南亚各国的经济协作关系……。

二是重新启动二次大战时期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修建工程，进一步提出中印缅铁路计划和“亚非大陆桥”计划，以大规模基础建设拉动的工业需求，连接中国南部以“粤港”

为中心的经济高增长区、西南以“成渝”为中心的重工业区、南亚人口稠密的低层次消费品市场区和中东北非产油国的高层次消费品市场区，**推动“泛亚”经济协作开发**。

6. 问题主要在于中央一级的宏观协调。

一、澜沧江—湄公河走廊开发的有关背景

1.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自然、社会、经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其开发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流域国或地区之间在利益获取、投资分摊和环境灾害治理等诸多方面目标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过去，由于越、柬的战乱，老、缅的经济落后，以及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湄公河开发所吸引的国际资源大多集中投在泰国，使其成为主要获利者，并且长期以来，泰国实际控制着湄公河临时委员会。**中国近年来对国际社会宣称，要把澜沧江作为重点开发区，并拟在澜沧江上兴建多个梯级水电工程，直修到澜沧江水流出中国的界碑为止，这已经引起了沿湄各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显然，在上下游各流域国之间最能引起争端的可能还是水资源的分配和上游水电、工矿开发对下游的环境影响问题。

2. 考虑到我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已完全改变了过去30年来对东南亚地区的传统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这一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一块“和平红利”生长区；因此，如何通过国家统一参与协调开发“湄公河走廊”，为中国南下战略重新打通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出海口迈出第一步，则显然成为本报告的意义之所在。

3. 湄公河为世界第十二大河，印支半岛上的第一大河，素有“东方多瑙河”之称，战略位置重要。自然资源和市场潜力巨大，沿岸各国经济在历史上长期具有极好的互补性。**澜沧江—湄公河综合开发与整个大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应**

作为一个“亚区域开发”问题予以系统考虑。

二、中国西南与中南亚开展经济合作的机会

1. 进入90年代，东南亚地区已全部实现对外开放，各国都制定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拥有商品交换能力大于2 020亿美元的东南亚市场（其中仅下湄公河流域5个成员国当前商品的吐纳能力就超过300亿美元），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南下战略”第一战役的目标区。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建交、与印尼复交后，已和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柬埔寨问题的基本解决；中越关系也正在恢复正常。此外，长期困扰泰、缅的国内左派武装游击割据已经平定。湄公河沿岸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经济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增长机会。

2. 由于中国的政局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加之云南省已通过澜－湄河道载货试航至万象，影响深远，在湄公河走廊各国中正在兴起“中国热”。海湾战争后，美、俄及西欧国家放松了在该地区的参与。云南省与越、老、缅的边贸近几年一直兴旺发达，湄河秘书处和泰国也很希望我方参与下湄公河的开发，想借助于我方雄厚的设备、技术、劳动和资金实力，促使一些大型工程早日上马。

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是我国介入的极好机会，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南下战略”和西南地区的开发战略的需要出发，把参与湄公河流域的国际合作开发作为我国在柬埔寨问题解决后，继续发展和同泰、越、老、柬、缅等5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重要纽带，并以此作为建立东南亚经济圈的基础。

三、亚区域开发的战略设想

1. 我国与东南亚地区许多大江大河与山脉同源，有着地理上的亲缘关系。“东南亚陆桥”实际上是泛指南亚和西南地

区的自然通道，最早以始于公元122年以前的“西南丝绸之路”为代表。西南地区的边贸物资若经澜沧江出口东南亚，比经华南转运要缩短运程3 000多公里；改经“滇缅公路（昆明至仰光）”出口中东或欧洲，运程要缩短约5 000公里。

这种亚区域发展机会的重大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把中国西南从“梯度理论”和“西部开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2. 目前的设想是：初期以澜沧江水电资源、国际航运和边界地区贸易的开发带动西南各省丰富的矿产和生物资源的开发，促进边疆民族经济的振兴和外向型发展；中期以云南与东南亚的边贸和友好交往为基础，以重庆、四川、贵州和西藏为依托，通过向华南电网送电和进一步向东南亚国家送电，获取参与湄公河走廊开发的资金，组织我国西南过剩的劳力和工业生产能力承包开发工程。随着成昆线电气化、南昆线、内昆线与广大线的兴建，将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建设耦合起来。

3. 进一步的设想是：开凿中南亚“三江”连通运河，以此种经济开发合作为契机，在缅甸或南亚国家为我国建立印度洋出海口（例如中资开发区）；在泰、柬建立南太平洋出海口和对东盟各国的经济桥头堡，逐步与东南亚、中南亚和南亚建立起经济上互相依存、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新的经济发展区域。

4. 同时，应该**将国内西部开发资金切块用于国际贷款配套，通过开发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改建扩建昆洛公路和滇缅公路，重新启动二次大战时期著名的连接南亚的“史迪威公路”修建工程，将我国西南部重点开发带与南亚人口稠密的低档次消费品需求旺盛的市场经济圈建设相联系**，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南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5. 长期的开发战略是恢复滇越铁路，重建早已勘测定线并仍保存部分路基的滇缅铁路等几条出口通道，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提出中印缅铁路计划和"亚非大陆桥"计划，**以大规模基础建设拉动对西南重工业的需求，彻底改善中国工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市场条件**，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既连接中国南部以"粤港"为中心的经济高增长区，又连接西南以"成渝"为中心的重工业区，把南亚人口稠密的低层次消费品市场和中东北非产油国的高层次消费品市场作为制造业产品输出地，推动"泛亚"经济协作开发。

四、中国的问题在哪里

显然，打通湄公河走廊，介入"金四角"开发，对中国有再清楚不过的长期战略利益，它还能够在短期内缓解国内工业企业需求不足的困难。但近几年中国人却显得踟蹰不前。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西南一向习惯于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计算市场半径。并且已经形成了资源流向的利益关系和相应的建设项目，且背后又有已成定论的"梯度理论（即东、中、西部经济发达程度梯次递降）"的内在制约以及在这种内在制约之下的计划投向作用。

2. 西南两次国防工业建设投资形成的重工业结构的生产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以来，越来越没有市场机会了，已经表现为严重过剩；民品开发所带来的体制变化，可能没完全达到预期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重工业结构的竞争力。应该注意到，**相对这部分重工业的政策安排，在强调技术性的结构调整的思路之下，显得缺乏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战略预期**。

3. 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是与不发达地区的关系，在财政分级承包制度推行后矛盾重重，导致中央的有关部门为了部门利益假借中央名义占有地方资源开发收益。地方在没有资源开发权和资金短缺的困境中，一方面在争取外资上缺乏统

一协调；另一方面在地方有权的有限资源开发上自行其是，例如现在提出的澜沧江水电梯级开发战略。

4. 尽管我国有官方的计划和发展研究机构，但除了个别领导人外，中国没有战略家，没有建立战略部门，也没有预见性的发展战略研究。**对已经出现的国内资本过剩和必然相应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的内在要求，几乎完全没有政策储备。**

有鉴于此，我国应从国家宏观决策层次出发，结合“八七攻坚计划”（按照现在的提法应该改为“西部开发”或者“十五计划”）及相应资金投向，通过“借外打内”、“反弹琵琶”，以向南开发湄公河走廊的水电资源、组织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为契机，协调西南三省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不发达地区的过剩劳动力，合力打入东南亚和南亚市场。

这实质上是要求改变传统的扶贫战略和资金分散投入的办法，在全国进入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照现在的提法应该改为“顺应全球化趋势”），重新计算大西南面向东南亚的“亚区域”市场半径，并结合“湄公河走廊”有利的发展前景，对我国在流域综合开发中的作用和利益进行战略性研究，为今后进行多目标国际协调提供依据。

国际问题

新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

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粗放型增长的趋势性问题

巴尔干三篇

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总体性危机与中国改革

东欧原国营企业民营化的产权问题

WTO原则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新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

引言：中国其实只是“中”国

1. 问题的提出：关于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

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中国经济较快增长是最近 20 年的事，而且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大规模引进外资。其成绩宏大已经是国内外公认的，毋庸赘述。但竖看 **50 年，我们这种农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后发国家追随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前后搞了三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哪次都有成绩也有代价。**

中国是“中”国。近代自清末人口超过 4 亿以来，既定的资源禀赋已经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本来就对制度安排是一种硬约束，使**中国客观上既走不了苏联也走不了西方模式的工业化道路**，无论硬一点的照搬，或者软一点的跟随，尽管

* 说明：本文是应本“三联书店”编辑许医农老师之命，于 2000 年 6 至 7 月为《99 独白》后两卷而作，成文后仅发表于内部刊物和中宏网的“中宏特稿”专栏。

会有成绩，也必然会造成损失。关键是我们自己怎样认识成绩和代价，也就是怎样从发展的角度估计“收益和成本”。

以往的文献大量表述了成绩或者“收益”，而本文则试图做一点点代价分析，并且试图以此说明，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到基本国情矛盾对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对照搬制度的约束，**我们可能已经完全没有再照搬下去的条件**，可能“不得不”摸索着走自己的路，现在应该是全面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候了。

2. 要深化改革和稳定发展，就必须重新强调解放思想

人们有高度共识的是：2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群众自发（至少起初是自发的）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后来，经济理论界对这种“大问题”的讨论，除了邓小平南巡讲话期间约略有所涉及之外，在一个时期以来以高速经济增长为衡量成败主要标准的舆论之中，似乎再没有人提起过。而到世纪之交，尤其是近年来经济出现一系列增长的代价问题，增长停滞又造成“改革”难以推进之后，尽管理论界有层次感的部分人仍然不为所动，但大多数人终于又是自发地要反思、要讨论了*。

有鉴于此，**近年来出现的讨论、分歧和初露端倪的分化，才确实是21世纪初中国理论界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如果能够推动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将对我国21世纪的发展方向和相应的结构调整有重大作用。

---

* 这样说并非批评理论界。我过去长期埋头农村基层的社会改良试验，一向只“埋头拉车”，不介入两个极端倾向的理论讨论。直到近两年因故不能再去搞试验区调研了，才在参与世纪之交的一些讨论中认识到农村“草根”社会的变化本来就是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符合规律的现象。于是才试着把多年来积累的感性经验提出来讨论，并始从“三农问题”的研究出发，思考与对农民和农村有制约作用的“大问题”，在思考中逐渐尝试着把近代史上的大事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影响与当前的问题结合起来分析，也因此有机会浮上来“抬头看路”。所以，本文试图提出的只是一个从“草根”角度讨论发展问题的思路，其局限性是必然的。

要重新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必须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必须重新强调解放思想。这几乎成了改革与否的“试金石”。很多地方和部门近来的情况表明，**那些口头讲改革，实际上维护既得利益甚至往相反的方向拉的人肯定不会动员人们解放思想**。尤其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政策趋势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浮出水面，却由于“体制改革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反而显得比较复杂，客观上难以深入讨论。因此，本文只能在发展理论上做一点澄清。

一、20世纪50年代对苏开放的成绩与问题

1. 新中国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是50年代对苏联开放

1950年夏季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此后则周边战争不断。在地缘政治关系根本改变的国际环境压力下，**新中国客观上失去了在苏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谋取战略平衡的历史机会，放弃了既定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改变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于战争期间的1950～1952年开始大规模引进苏联的主要服务于国防的能源、动力、机械等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惊险跨越，并且**在典型的“复制翻版”国家工业化及其相应的管理体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必然形成高度集权、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

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具体体现。我们**过去的理论误区不大，但却关键，它在于：把苏联在苏联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斯大林主义发展模式固化为“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形态。**

2. 重新认识当年国际经济格局的本质

我一直认为（这个认识并不新），美国和苏联都在“二次大战”中得到了维持甚至加快传统结构制造业发展的历史机会，也由此导致这些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失去调整机会，而这正是老式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战争调节生产过剩矛盾的必然结果。

然而战后，**这种被战争需求刺激拉动的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必须找到出路**，在这种不可逆的经济规律制约下，两个大的资本帝国主义集团必然利用战后完成的势力划分，分别控制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对外援助生产设备抵顶投资，既转嫁、缓解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奠定了结构调整升级的财政基础；又客观上推动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独立的大批发展中国家“复制翻版”其传统结构的工业化进程。

显然，**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两个大的资本帝国主义集团主导的传统制造业扩散的工业化进程，一向被人们公认是社会进步**。接着，就是众说纷纭的“后发优势”、“转轨经济”、“全球化”等等。相应地，也就有绿色主义、可持续理论以及后现代批判等等。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追求工业化的形式和过程相比，**正是因为中国能够由“民族独立战争”打出来的强势政府主导，因此才能够以民族独立必须的军事化为目标，完成经济增长要求的社会整合过程，并且得以克服任何反对，全部占有“资源资本化”进程中生成的财产和收益**，并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完成跨越工业化门槛所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尽管这绝不意味着“潜在的”代价小。

3. 基本国情矛盾所派生的基本体制矛盾

直接的最大社会代价，就是造成“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

第一次国家工业化面临的前提性制约是：政府为了工业

化，必须也只能从农业中提取剩余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然而，**在土改以后平均占用土地资源的小农经济条件下，高度分散的农户以及平均剩余太少的农村，不可能适应这种突变式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交易成本随之抬高。**

于是，国家在农村推进公社化*，建立了历史上最完整的、能够下伸到传统村社并且控制农户的集权体制，随之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城乡二元体制矛盾使得国家即使高度工业化，也无法带动农村的城市化。

因为，苏联和西方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是大批的农业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形成大都市，甚至造成劳动力短缺。而在东方国家中，只有早期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日本和纳入美国战略投资范围的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符合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规律，**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几乎都出现"拉美化"问题**。而中国这样的战后才启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上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这种重工业内在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形成了对立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

五十年过去，新世纪开始，"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制约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

4. "全盘苏化"与中苏关系恶化

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方面不能再次被外部势力从政治上、军事上控制，必须保持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在第一次脱离本土的、完全现代化的朝鲜战争的教训下**，为了维持历经三

---

* 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论述，请参阅拙作《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年 5 月第 1 版）。书中第三部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土改以后国家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的交易成本提高的问题。

** 以传统结构的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化战争给国家领导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不仅毛泽东号召"大炼钢铁"，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都没有忘记"现代化战争打的是钢铁战争，我们要是能有 1 亿吨钢，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代政府、打了一百多年、死了几千万人才初步得到的民族独立，并且也在军队这个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连续两次全面“换装”的紧迫需求下，主动要求和全面接受了苏联援助的大工业产品和二手设备。

当时，我们**只有完全依靠苏联提供的图纸、技术标准和管理方式，才能节省启动成本，降低中国进入工业化的门槛**。与此同时，也必须由苏联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对我们的“进城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干部”实行“手把手，传帮带”。于是，**就在这样完全复制翻版的国家工业经济基础上，也必然复制翻版了苏联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

这就是50年代的“全盘苏化”。我认为，没有这种“全盘苏化”，就没有中国的初步“国家工业化”。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中国开始“一五计划”、启动工业化的时候，苏联已经进行“六五计划”了，双方的差距是分别处在前后工业化的两个历史阶段上**。

苏联在完成国家工业化、形成大生产之后，产业门类齐全和专业分工必然要求大规模交换，因此，也必然全面调整在国家资本积累阶段发挥重大作用的斯大林主义政策，这是苏共二十大的经济背景。而那时正是中国刚刚开始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尤其是中国“一五计划”形成了大工业的初步生产能力、正在追求资本增密和技术升级的时候，必然进一步加强集权体制，不可能随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调整自己刚刚照搬来的斯大林主义政策。

于是，发生中苏两党大论战，两国关系随之迅速恶化（其中当然也有人为的因素）。

5. 自力更生与经济危机

苏联停止后续投资和技术援助，使得中国完全照搬的国家工业化几乎立即受挫，不得不强调自力更生，“愤”发图强。其中就有如“愤”发地搞核武器、石油基地和大型水利

工程的伟大成绩。

历史上如秦、隋两朝，在烽火连天的同时大兴土木，导致了国库空虚，民不聊生。20世纪的经验同样证明：在任何小农经济条件下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几乎都必然发生经济危机。这也是“铁的规律”。

50年代末期的**政府财政确实没有后续投资能力，重偏斜的城市工业自身既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通过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完成起码的经济流程**。这种客观事实表现为1959～1961年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就业矛盾，又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就有第一次两千万城里人上山下乡的运动。然后，随农民“出工不出力”这种悲剧式反抗而来的是，以“三自一包”为名的经济体制调整，以及“七千人大会”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些，可以被认为是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搞“复制翻版”式的工业化的代价。

二、第二次“洋跃进”：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

1. 引进欧、美、日石油化工和轻纺设备，调整重偏斜的工业结构

虽然中国5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初步形成了军事需求导向的国家工业化。然而，这种对夕阳产业“复制翻版”的重偏斜的工业，既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完成经济过程，也不可能像苏联和西方那样通过战后资本输出调节经济结构。因此，**尽管中国整个60年代都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时还经历着痛苦的经济政治调整（各种运动），其间在1967～1969年发动了第二次涉及约三千万城里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仍然只是治标，国家工业“重结构”问题的制约不可能根本解**

决。

当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中苏发生边界军事冲突*，再次根本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之后，毛泽东终于得以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矛盾，于1972年向西方打开国门，中国在作出调整周边关系的政治让步的条件下，有了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改变经济结构的条件。当时**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开始了对重偏斜的工业结构的大调整，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人们感同身受的是：这种大规模引进使中国农业于1972～1974年化肥产量翻番而产量增加，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有了"的确良"和洗衣粉，然后就是电视、洗衣机和冰箱这新"三大件"的问世。

70年代的这第二次对外开放，与50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再有当年苏联专家"手把手，传帮带"，从而节省了技术和管理成本。这一次，中国人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后来被称为"第三产业"）费外，还得转变过去照搬苏联的管理体制（乃至整个制度体系），才能适应现在照搬进来的西方生产线。

其实，这种制度改变，仍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表现。

2. 财政危机的再次发生和经济形势恶化

由于主要**依靠引进项目和昂贵的服务调整工业结构，中国几乎马上就出现了与"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才800亿左右，导致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再次严重不足。随之，**1974年不得不再次动员城市过剩的劳动力**

---

* 19世纪末期沙皇俄国与清朝政府在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政治冲突，及其所形成的俄国"独占利益"，就曾经引起过英美势力的干预，清朝政府也曾经作出过以英美势力制衡俄国的外交努力。

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这就是向农村转嫁危机的“第二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接着，据说是华国峰同志在1976～1977年间领导了更大规模的引进外资，那时提出的“上它一百多个大项目”，“上它几十个大庆”，后来被人们批判为“洋跃进”。

那次继续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结果是，造成1978～1979年在财政收入才不过千亿左右的条件下，连续出现每年180～200亿的高额财政赤字，迫使国家在1979年第一次“超发”了400亿元货币。这又使得城市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

3. 危机压力下的“改革”

在这种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之下，中国从1980年开始不得不在城市实行“关、停、并、转”，大批职工下岗。而在没有了毛泽东这个绝对权威的条件下，不仅不可能再通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向农村转嫁城市的就业压力，而且还得落实政策允许知识青年回城。**当时大约四千万青年待业，是造成社会性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接着就是针对性的两次“严打”运动**。同时，中央政府在1982年终于同意在全国推行以农村大包干为代表的体制改革。

尽管**80年代末期以来的经济危机成因与过去有本质上的区别，但50年代末期以来处理危机的做法及其作用，几乎演变成为了习惯性的应对程序：人们在1989年和1997年感到“关、停、并、转”又被重复使用**之后，仍然以造成大规模社会性犯罪为直接后果，当然也逻辑性地导致“严打”运动和政治趋紧。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代价。

可以说，**中国50年来都是先开放，后改革。改革是开放**

---

* 不仅整个80年代步履维艰的改革几乎都被通货膨胀的阴影覆盖着，而且这个“问题”还常常被政治化处理。

派生的，其内容方面的不同一般取决于政府向哪里开放。

惟独“农村改革”不同：无论1950年土改、1960年“三自一包”、1982年“大包干”，还是1998年的“落实30年延包”，都类似于历史上以“均田免赋”为主要内容的让步政策。然后是小农经济和村社传统的恢复……

由于**这种向传统复归的“改革”与国家对外开放和复制翻版工业化导致的制度变迁不可能吻合**，才使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更有历史意义上的对立性；才使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都承认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接着，如果在20世纪，人们会说“农民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而到了21世纪，由于**农村劳动人口超过5亿，而农业只需要1亿多人口**，其他“相对过剩”劳动力正在“沧海横流”，人们也就应该把这话改为“农民的问题是就业的问题”。

三、第三次：最近20年的对外开放，及其必然导致师法西方的体制改革

最近20年开放带动的改革成绩斐然，但实质上仍然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复制翻版”，只不过从师法苏俄改为师法欧美。

因此，学界才继续着毛泽东提出的“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规律现象：50年代照搬苏俄者，党内专家也；异议者，“右派”也。90年代照搬欧美者，学术带头人也；异议者，“左派”也。在两个极端上跳舞的不良倾向，似乎永远是主流。难怪那些已经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家看不起我们的学者。在政治家眼里，无论当年的党内专家，还是当前的学术带头人，虽然唇枪舌剑水火不相容，但其实都还停留在“邯郸学步”阶段。

1. “奇迹”背后的三个不同

1978年以后的20年城市经济发展被世界称为“奇迹”，虽然基本上是依靠引进外资复制翻版工业化，但与前两次有所不同：

其一，工业化的国民经济基础。由于已经有了前30年中央政府集中全国资源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已经初步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特征，有了进入市场开展交换的基础条件。

其二，利益主体形成。由于国家在80年代初经济危机之下实行了“拨改贷”的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利改税”和“分级承包”的财政体制改革，**国家资本逐渐分化为部门资本，国有经济内部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中央地方分权化的趋势**。

其三，启动了经济货币化。1978年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与全国约10 000亿的工农业总产值相比，社会存款才221亿。在国家实行“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完全承担扩大再生产投资职能并因此造成长期赤字的压力下，银行系统才对国营企业贷款，其规模到1978年也不过1 000多亿，而到20年后的1998年，GDP约10 000亿，广义货币却增长到近120 000亿。前者的增长是算术级数的，后者则是几何级数的。

经济货币化是资源资本化的外在形式，也是最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中最为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方面，**中央政府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货币化和资源资本化，以此通过发行货币来直接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另外又通过通货膨胀稀释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向社会转嫁亏损**，最终形成1998年M2与GDP高达135%的比例（美国为67%）。

另一方面，则出现各地竞相追逐外资以促进地方资源开发的高速增长，导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1995年就超过

45%，**外资成为中国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增加的重要来源**，并且，政策上很多地方也不得不在外需拉动增长的压力下不断让步。

与此同时，有些地方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恶化，不仅对本地区造成了不可持续发展的后果，而且还试图向其他不发达地区转嫁。

2. 金融资本垄断形成，并且异化于产业资本

如果说80年代城市改革的负面作用是造成了“资本异化于劳动”，那么，90年代则出现“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取消黄金本位的货币发行的基础只能是政治强权。并且，货币不断超发必然导致金融资本的权力垄断。还由于M2高比例于GDP，金融资本不可能“分享社会平均利润”，于是，**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金融资本必然“异化”于产业资本**，追逐自己独立于实物经济之外的超额垄断利益。

其后果是：90年代初期金融资本追逐“证券、期货、房地产”这三大投机领域的超额利润，然后从全社会的信用膨胀演变为信用危机：一方面生产领域投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资本过剩，资本市场过度投机，出现了经济的初步泡沫化现象。

这也是社会收益分配向垄断部门倾斜、造成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的主要解释之一。

四、结　语

中国50年中三次大规模引进外资，复制翻版工业化进程，第一次的最大收益仍然是摆脱了百年“挨打”的地位，在冷战和核讹诈时代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基本完整。因此，可以认为，**50年代建立的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服务于国防的“公共品”，本质上不能用是否适应市场经济来**

衡量其成败。其本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也是主要承担国家财政和政策贷款投资的战略性大型经济开发项目，例如西部开发等。

同时也应该了解，我国三次对外开放接受的仍然是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两大资本帝国主义集团不断淘汰的传统制造业的落后结构。这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情况雷同。对此，我曾经在国内外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各种讨论中提出过。我一直就认为，90 年代**所谓“亚洲金融危机”，其实是东亚国家和地区追随、复制西方传统经济结构问题的外在表现**。

尽管我从来没想过要作出经济预测，但确实在 1994 年就比较全面地提出过对金融危机的预警。该年 11 月《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了 9 月间我和一位美国学者的对话录，题目就叫做“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文章发表以后，听到负面反映比较多。但时隔不到三年，果然就发生了从东亚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危机发生以后，有关方面又过于重视技术层次的问题，或纯粹金融业务上的分析，于是我又在 1998 年写文章，认为这次危机发生根本不是金融风险防范的问题，实质是东亚国家复制翻版传统结构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一方面，不利的是中国工业化开始得早，资源环境破坏得严重，50 年来人口还增加了 1.5 倍，因此，照搬式的制度改变面临的资源约束更严峻；另一方面，**纯粹从经济竞争角度看，劳动力长期绝对过剩可以被认为是有利的条件**：既可以保证传统产业使用活劳动的最低成本，又没有工人运动。因此，东部落后产业仍然可以利用中西部贫困地区流动打工者的无限供给而长期存活。**这也是人们认为中国可以在世界经济分工的格局演变中成为最终产品制造大国的主要条件**。

倘若这已经被认为是必然趋势，那么相关产生的问题仍然是社会成本抬高和资源环境破坏的问题。例如，**导致的主**

要制度现象是缺乏社会公正；主要经济问题则是“不可持续发展问题”。

最近关于中国加入 WTO 的讨论中，很多人寄希望于引进外资来促进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这在现象上类似于“第二次开放改革”，亦即与 70 年代末期中央政府引进外资调整工业结构的情况雷同。那次的代价上文已经作了讨论，可以作为对当前形势分析的依据。

如果我们愿意以这 50 年的经济发展为线索看下去，今后符合规律的趋势可谓“大隧之内，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其一，资本相对过剩条件下的对外输出，与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结合；其二，以权力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内外融合。不过，如果真按照这种趋势发展，就需要有比国内农村更为广大的承受代价的载体。

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粗放型增长的趋势性问题*

题记：

在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已经波及欧美的压力下，人们对 1999 年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议论颇多。在世界银行和欧盟都降低了对 1999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值的影响下，部分经济学家在我国最近的讨论中，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持五五开或四六开判断。就连过去一向主张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人，至少也在近几年国际金融资本直接引发的金融风波中得到警醒，开始讨论全球性危机何时爆发，以及是否怎样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影响。

本文认为，尽管那些金融资本集团明白，它们正在朝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单行道上疾驶，**但没有任何垄断资本、特别是最腐败的金融垄断资本，足以明智到愿意主动改变自身与生俱来的追逐超额利润的本质特征。**因此，在世界经济

---

* 本文写于 1998 年 11 月，原来是当年 9 月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讲座内容，听我讲座的人中间有一位老同志对这个内容感兴趣，当时就要求我整理这篇讲稿，但讲稿整理成文之后他斟酌再三，终于还是没有发表。我当然理解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谨慎。此次收入本书，把与其他文章类似的段落论述略作删节，可以算是首发。

本文实际上是对国际金融资本危机提出预警，尽管 1999～2000 年美国经济表现出高增长、高就业和低通胀的特征，并且因此被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认定为是一种打破了传统经济理论的“新经济”。但是接着在 2000 年 4 月发生的“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以及连带影响美国股市下跌所引起的讨论，还是没有脱离本文所指出的问题范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关于如何实现“软着陆”的说法，其实也等于承认了美国金融泡沫必然崩溃的观点。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国家计委王健在中国经济信息网上公布的文章，并引述了其中部分数据。

危机面前，中国的决策导向如果失误，就有可能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我们也有可能像其他东亚国家那样，由于实物经济的成长确实产生了可供攫取的利润增量，从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在资本过剩压力下转嫁危机的对象。这也是本文对所谓东亚金融危机动因的解释。

中国已经有47年的高增长，改革前27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最近20年则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权让利的条件下追求地方工业化的积累阶段。由于二者**都属于大量占用、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因此，按照一般工业化的制度经验来讲，中国在初步完成原始积累形成的高增长之后，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的压力下，转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才能存活的国际大资本的制约。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可是，人们在享受高增长带来的现代化消费的时候，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了。**

本文作者在能够查阅到的有限资料中看到，早在1979年就曾经有中国学者撰文指出，传统体制存在“结构性经济危机”，所以中国必须改革。1988年在我公开发表的“危机论”中也曾经探讨中国经济危机周期性波动的规律。进入90年代以后，我把对经济周期的分析写入了“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一文，一度引起了比较广泛的讨论。后来在东亚危机爆发引起世界金融动荡之前的1996年，我发表了与美国学者的对话，分析“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更何况国外讨论金融资本膨胀与泡沫经济崩溃相关性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然而，尽管近年来暴露出的问题，大部分确实被这些国内外的讨论言中，但今天的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回避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反而更愿意只把问题分析到技术层次上，

或者以“纯粹做学问”来为思想遮羞。有鉴于“今天的你我，总是重复昨天的故事”，本文作者才入乡随俗，老调重弹。希望那些“环顾左右而言他”的人不介意我把话说透。

一、战后美元资本的垄断地位变化，必然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

1. 美元的垄断地位与追逐泡沫经济的本质特征

美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绝对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首领，各国以美元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导致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 GDP 增长需求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这就客观上造成了本来并不产生利润的金融资本脱离实物经济，不断在投机资本压力下推出新的衍生交易品种，追逐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其实，这不过是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的正常表现。

2. 战后经济发展与美元相对过剩

然而，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依赖美国的设备输出和美元投资，不得不听任美元资本攫取超额利润。但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全面增长之后就不再满足于美元独霸天下。于是有“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汇率谈判，乃至欧洲从追求统一市场到追求统一货币。其间，美元在国际货币总量中的份额逐渐降低到 3/5。有鉴于此，**过剩的美元资本更是只能通过不断发展衍生交易品来保证其对超额利润的渴求。**

进入到 90 年代以来，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 60%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数百倍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美元绝对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比较保守的看法，也认为其币值高约 70%。在资本过剩的压力下，

金融危机的发生长期以来就此起彼伏，没有停止过。进一步说，在1999年欧元启动并在今后逐渐成为与美元抗衡的资本力量的过程中，过剩美元的贬值和连带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条件正在日益成熟。

然而，金融危机绝对不会使其始作俑者——金融资本集团从此改弦更张。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必然在泡沫经济幻灭时加强对其他国家所谓"一体化"的控制，企图为过剩美元提供从其他国家实物经济中吸食利润的条件。其中，IMF和世界银行对东亚国家提供援助时明火执仗地干预内政，应该够有典型性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重新认识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以发展实物经济为主的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会受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严峻挑战。

我们这样分析，是因为1998年西方7国针对已经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作出的对策调整，不过是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技术层次的"加强监督管理"，学问老道的理论家们提出的看法也不过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老一套。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集团对自身本质问题有能力作深刻反思，也没有给人们展示任何可以使人对其心存幻想的举措。

3. 东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

分析这次东亚经济危机的源头，本文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我们认为，东亚发生的是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始作俑者仍然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因为正是美国在战后的日本翻版了美国的制度、又在日本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到对美国出口长期顺差的80年代通过"时代广场协议"，迫使日本调整汇率。但其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元币值上升，提高了日本转移传统制造业于东亚和在欧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能力。尽管日本这些对欧美的投资大部分失败，但其对东亚的产业

转移却得益于东亚各国本身按照西方制度经验追求的工业化，因而大获成功。

一方面，东亚按照日本“雁阵式”战略，以各国对欧美的出口配额为条件，发展成了日本产品的复制出口基地，这就是所谓“东亚奇迹”；而另一方面，**日本则在大量移出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必然导致货币资本过剩于实物经济，其追逐投机利润的本质特征也使日本生成了亚洲最大的泡沫经济。**这的确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事实。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让金融资本针对自身弊病作出实质性调整是不可能的。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

有人说，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因此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延续20年了。于是人们在最近的讨论中常常担忧：中国经济是否会像其他东亚国家那样，只维持20年左右高增长，就纷纷在经济危机中进人衰退期。我觉得，这种比较的前提似乎并不成立，其实，如果以我们这种约10%的年均增长速度作为标准，那么，中国从1952年“一五计划”起，就已经高速增长48个年头了。实际上，48年的高增长也并非“奇迹”，因为中国大多数年份是在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在原始积累阶段，多数国家都是表现为经济高增长。只是改革前，我国是中央政府进行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而改革后，则主要是地方政府进行的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

1. 两个增长阶段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经济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性过程。在改革前27年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控制的国有大工业体系。**企业的层次级别不同，占有资本及其收益的数量和质量就会有明显差别，由此又产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

条块之间在财产占有及其收益分配上复杂的利益关系。可以认为，在改革前由市及市以上政府及其各部门占有全部资源和城市工业资本的格局，一方面较大地限制了县及县以下（包括大批国营工业“空白县”）地方政府占有资产和收益分配的欲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广大农民大面积的贫困。

80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本来是要解决中央财政的“统收统支”与地方政府追求发展之间的矛盾。当时形成了从中央到乡镇各级财政“收支包干、增收分成”的财政体制，一定意义上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作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较为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然而，财政分级承包制的实行，更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下，按照中央政府进行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追求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欲望。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有其自身的财产和收益，并且有扩张这种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历史现象。

然而，农村改革和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已经部分地破除了过去中央政府借以提取原始积累的垄断流通、金融和科层组织的体制，各级地方政府客观上已不可能像改革前中央政府那样，直接占有全国的工农业剩余来形成自己的资本积累。其可能做到的，只是占有地方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追求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启动资本”。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各级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县级企业普遍亏损。据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1994年的调查，全国1 000家上缴利税最高的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也已达88.6%，比同期国营企业还要高。在这种局面之下，地方财政亏损面扩大，尤其是落后地区地方财政赤字严重，致使地方政府工业化发展目标更是难以实现。

通过占用新的资源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尽快完成地方政

府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中央、地方完成财政分权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各地方政府在继续粗放型增长方面的重要行为特征。1992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开发区热”，即昭示了地方政府通过农村土地向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原始积累的实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80年代中期完成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得到了工业化发展的自主权，但失去了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前借以获取原始积累的集中垄断的计划体制。90年代的“开发区热”和“以地生财”，都反映了地方政府占有地方资源并将转化的资本增殖收益作为原始积累的行为特征。

2. 粗放型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必然增加

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无论是哪一级政府追求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我国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依靠大量资源投入来支持粗放型经济发展的老路子。

8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重申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两个转变，但事实上没有做到。不仅如此，在地方工业化阶段，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效率近20年来也呈拉大的趋势。如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之间；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才占32%，“七五”期间还下降到24%，“八五”、“九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只处在中等水平。这些情况都说明，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型特征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制度现象，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工业化阶段，始终没有改变，尤其是80年代末期以来，甚至有加重的趋势。

随着9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的增加，中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化工和机电工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将明显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必然不断上升。但是，重工业、化工和机电工业都是以能源和矿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业，一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会拉动重工业发展，这种经济增长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必然急剧增加。国家计委王健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按1975年日本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能源和钢铁的人均占有水平计算，到2010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时，14亿人口就需要消耗50亿吨煤，其中包括29亿吨原油；需要消耗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还应该看到，日本是世界上经济效率最高的国家，资源使用的集约程度远远超过欧美各国，即使如此，1955～1975年，钢铁消耗仍增长了9倍以上，能源消耗增长了6倍以上，其中石油消费增长了21倍以上，都大大高于CNP同期5.4倍的增长幅度。

近年来，我国的决策是以财政和信贷方式增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我国的“重型”增长方式可能会重新出现。如果过去的经验仍然有效，那么我国主要工业原料的消耗速度也会有加快趋势。以石油为例，在80年代的“轻型”增长方式下，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2.4%，而1991～1993年，则猛升到10%；经济增长与钢消耗的弹性系数也发生了变化，80年代为1∶0.67，1991～1993年，则上升到1∶0.9。

我们不得不承认，90年代的中国经济实际上仍然是按照传统道路追求工业的高增长，工业对资源的消耗严重浪费。例如，日本生产每单位GNP所消耗的能源只是我国的1/11。而我国经济增长不仅粗放型特征极为明显，而且由于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以及内部化金融的政府垄断带动第三产业的能力有限造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因此，只能依靠传统工业发展惯性维持增长，资源消耗必然增加。如果用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资源产品消耗的增长速度外推到

2010 年，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需要消耗 10 亿吨原油和 3.5 亿吨粗钢。这必然要增加进口。

3. 中国资源稀缺只能进口，对国际市场影响必然增加

改革前的 27 年，我们也是高增长、低通胀，这与近 20 年没有明显差别。如果要对现在的增长与过去作比较，那么最大之不同在于国际化程度。因为这 20 年正是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寻找投资机会，以及日本在亚洲推行产业转移战略的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的 1980 年，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 1%，到"八五"期末，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超过 3%，经济的外向度已经超过 40%。到"九五"期末，中国年进出口总值约 4 000 亿美元（考虑走私因素），年均增长率超过 GDP 增长 8 个百分点，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排名已经进入前 10 名。

我国是人均资源稀缺国家，下个世纪更是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缺口。我国国土面积虽占到世界的 7%，可是除了煤以外，铁、铝、铜、锌等矿产资源储量比重都低于国土面积比重，石油储量比重甚至还不到国土面积比重的 40%。如果按人均水平计算，更是排到世界第 80 位以后。据预测，到 2010 年，我国石油产量可能会维持在 1.5 亿吨，至少需要进口 2～4 亿吨原油。要生产 3.5 亿吨钢，则至少需要 7 亿吨铁矿石，而届时我国铁矿石产量顶多达到 4 亿吨，需要进口 3 亿吨铁矿石。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膳食结构的改变，到下世纪初，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需要达到 450 公斤，总量将达到 6 300 亿公斤。而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按照 90 年代中期城市化加速阶段曾经发生过的情况看，平均每年耕地面积大约减少2 000万亩，到 2010 年将减少 2 亿亩，耕地面积仅余 17 亿亩。那时粮食总产量即使超过 5 500 亿公斤，每年也需要有

数千万吨的粮食进口。此外，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宣布禁止森林采伐，如果能够实行，木材进口也将从现在每年约3 000万立方米的水平上提高至少1倍。

三、中国对国际市场金融资本的需求

1. 经济增长中的进出口惯性及其影响

中国在70年代末期初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之后，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要求加强社会化交换。**这使中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我们才有20年市场趋向的改革和出口外向型经济的大发展，甚至因此形成了经济增长对外向型经济依赖、促使进出口必须不断增加的“惯性”。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到2010年，人口会增加到13～14亿，而到2030年，则会增加到16～18亿。那么，**一旦中国的生存和经济发展依赖世界市场，其影响绝非以往能比**。更何况中国经济能否通过国际贸易保证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据国内学者研究，如果中国石油进口达到4亿吨，就要买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30%。如果中国粮食进口5 000万吨，也要占目前世界贸易量2亿吨的1/4。目前世界每年的铁矿石出口量只有2亿吨，中国的需求量甚至超过了世界的全部出口量。这种需求如果真的发生，将会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的局面。

目前中国出口额只占世界的3%，如果未来世界贸易增长率为5%，而中国为12%，那么，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会上升到18%，这将会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因此，在下个世纪，如果我国继续大力发展出口外向型经济，那不仅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也必然极大地影响国际市场。

1998年初，我国已经对国际社会宣布，到本世纪末，全

社会需要增加约 10 000 亿美元的投资。此外，中国到 2010 年仅为支付 4 亿吨石油进口，就需要 1 500 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加上各种矿产和农产品等其他进口，外汇需求将达到 6 000 亿美元。即使我们能够像最近 10 年不断维持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也要求在未来 15 年内，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 12% 左右。从 1998 年的形势看，实现这个年平均增长率困难较大。

并且，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认为，包括中国东南沿海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在内的东亚经济已经发生危机，这实际上属于传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危机。事实上，不仅 1998 年中国的出口已经明显下降，而且整个东亚的出口外向型经济也没有起色。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如果世界范围的市场疲软不可能短期缓解，那么，也就不能寄希望于继续保持过去的出口增长率。

2. “双顺差”的变化趋势

资本过剩必然“溢出”以逐利。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在过剩造成的危机压力下获利机会减少，就更需要增加在中国的投资，而我国在 20 年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的利率又长期居高不下，投资回报率奇高，因此，资本项目过去会保持顺差。同期的人民币汇率在这 20 年中的大多数年份又是不断贬值的，也就必然刺激出口，形成经常项目长期顺差。其中，1994 年的外汇改革一步到位，本币一次性贬值 50% 以上，刺激出口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强烈，因此有出口大幅度增加和连续顺差的局面。

但是，如果上述预测的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在未来成为真实情况，而且人民币汇率客观上又有升值压力，将使我国有可能在下个世纪初出现经常项目逆差，从 1994 年汇率大幅度调整以后的“双顺差”演变到“资本项目顺差”与“经常项目逆差”同期出现。这显然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全面危机之

前的情况相似。

进一步看，中国从1995年出现M2大于GDP的情况，近年来在“资本过剩”越来越明显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又连续调整国内利率，这种货币政策的目的是刺激投资增加；但另一方面的客观作用是迫使那些进入中国追求高回报率的资本“出逃”。这个情况美国曾经发生过。80年代里根政府采取高利率政策，国际投机资金大量流入，资本市场活跃，但实物经济在资金成本增加的压力下纷纷向外转移。到90年代，布什政府又大幅度降低利率，国际资金纷纷流出美国，于是布什政府得到了“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的评价。虽然中国可能得益于资本市场不完全开放的策略，然而资金这个最逐利的要素仍然受回报率影响而流动。例如，1998年我国尽管出口仍然有所增加，但外汇回笼情况很差：其中有假出口，真套汇；也有些企业资本流出，或者把出口货款尽量留在国外以获得高于国内的银行利息。这样会加剧可能出现的“逆差”。

四、简单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如果继续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近20年的“跟进式发展”经验，在世界经济危机之中将没有选择余地。**

由于体制和制度原因，以及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我国基本上没有条件像发达国家那样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即使放开资本市场，鼓励资本输出，也会受资本规模小和国际政治经济既定格局的限制。更何况我们在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进入被西方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放弃了对周边传统市场的控制。

可行的取向目前看有两个：

一方面，明确强调**调整发展战略，追求可持续发展**。利

用近20年形成的越来越大的区域差别，以及中央政府仍然对国内部门垄断的大资本有控制权力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引导过剩的国家金融资本与过剩的民间劳动力投向中西部，**以国家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西线“南水北调”工程）带动就业人口向西部流动，启动中西部的资源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化**。当然，这种利用大国优势的内部调整，需要参考“罗斯福新政”的并不仅仅是经验。

另一方面，可以结合解决香港已经形成惯性的资本经济导致的结构调整困难，建立人民币与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通过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逐步实行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都以港币结算，外汇储备也逐步以港币为主，这样就能够把过去主要依托香港经济的港币，转变为既能够依托整个大陆实物经济又完全可兑换的“华币”**。进一步要求台湾从中华民族振兴的全局出发，通过加入“港币（华币）同盟”，与大陆实现包括货币流通在内的“四通”。这样，就能够全面提升港币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并且在国际金融资本即将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中，打入代表华人利益的中国金融资本的楔子。

这两个方面相结合，有可能使21世纪的中国不再担当被人剥夺的“二等公民”角色，让华人经济圈的发展改变被西方主导了600年的历史，让这个世界多少“公平”起来。

巴尔干三篇

（一）美国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的“巴尔干牌”*

美国从其本土派战机轰炸我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警醒了中国人民。我们不认为是误炸，也不认为美国的调查和解释有实际意义，甚至不认为对这个事件细节的讨论有意义。因为，真正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美国轰炸使馆背后所隐含的“一石三鸟”的战略目的：遏制欧盟；削弱俄罗斯；逼中国加入军备竞赛。

一、美国战略目标主要是遏制欧洲崛起和迫使欧元贬值

本文认为，美国积极介入巴尔干冲突的战略目标，既不是为了改变欧洲地缘政治格局而帮助科索沃独立，也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对立要消灭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其主要目标是首先削弱欧盟，是遏制欧洲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和发行欧元崛起，形成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力量。

因为：

其一，日本在 1985 年“时代广场协议”被迫提高日元币

---

* 本文是在中国大使馆被炸之后，于 1999 年 5 月发表在中经网“50 人论坛”上的文章。当时与我观点相似，认为巴尔干战争的目标是打压欧元的学者，还有国家计委经济所的王健研究员。

值后，10 多年来已经在加速资本输出、实物经济下降的同时，使国内经济的泡沫化程度超过 200%，属于接近于崩溃的垂死经济，客观上已经不再有条件与美国竞争。

其二，**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这是美国从来不择手段和不遗余力所必须维持的。美元总量 230 000 亿，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 60%和各国外汇储备总值的 70%；欧洲货币总量虽然有 270 000 亿，但欧盟成员国除了英、德、法三国外，多数国家货币在国际金融资本的基本结构中并无地位。而欧元发行后币值高于美元约 10%。如果不出现大幅度贬值，则有望成为最强势的货币。欧洲各国货币只要满足欧元要求的财政支持条件，当然顺理成章地要搭便车。

可见，欧元的发行才是对美元的最大威胁，欧盟的经济政治一体化才是对美国核心政策的最大冲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盟国家新生代领袖人借华约解体之机，吞噬前苏联的制度遗产，改变地缘政治结构，及其凭借资本实力占有东欧资源等一系列战略上的成功，都有利于促进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有利于巩固新生欧元的上升趋势。再加上欧盟经济的证券化程度只有约 30%，远比已经高达 160%的美国和高达 200%的日本经济健康得多。欧元顺利渡过准备期之后，将使区内贸易量大幅度增加，从而更加成为吸纳包括美元在内的国际过剩资本的中心。而如果欧元币值坚挺，且进而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和外汇储备币种，则必然使外强中干的过剩美元资本币值下降。到那时，依靠资本收益和以所谓服务业为主的美国经济将由于资本大量流出而萎缩和衰落。

因此，欧盟的经济政治一体化，不仅是对美国下世纪称霸全球的最大威胁，而且将是最有条件捅破美国病入膏肓的泡沫经济的力量。

二、欧盟新生代政治领袖认识的转变

在这次的巴尔干战争中，我们还应该看到，欧盟新生代政治领袖的确不够成熟老练，而且略嫌短视。他们先是在改变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北约东扩”中咄咄逼人，冒逼俄罗斯拼命的风险进攻南斯拉夫，给美国人创造了显示军事实力、加强其对欧洲政治军事领导地位的空前机会。后来，尽管逐渐意识到被美国人玩了，可作为始作俑者又找不到台阶，无法体面地脱身。总算俄罗斯出面形成八国方案，却又让美国人对中国大使馆的轰炸给破坏了。

我们看到，美国介入并且不择手段地延续这场战争，能够在两个方而对美国经济有利：

其一，可以在巴尔干战争中出售库存军火，实战检验高科技武器，以此拉动美国军事工业以及依附其上的高科技产业。据报道，美国在空袭开始后的20多天里已经卖出了24亿美元的军火，其中有大量的过期库存。这就难怪连轰炸我国使馆的5枚导弹都有2枚是打不响的。

其二，战争和难民造成的巨大开支只能由北约各国分担，而且必然转化为欧盟各国的财政赤字。由于各国减少赤字是欧元币值稳定的前提，因此巴尔干战争必然会拉欧元的后腿。果然，空袭开始，欧元就下降6个百分点；八国外长和平方案出台才使欧元有所回升。

可见，如果从战略层次分析，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最大得利者是美国的大金融垄断资本和军火工业巨头；最大的输家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又不得不继续打下去的欧盟和俄罗斯。

三、中国处理这次事件的利弊

中国20多位外交人员和记者的牺牲负伤，突然给中国领导人手里送来了与美国、俄国和欧盟打巴尔干“牌”的条件。从我国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看，第三代领导人确有大国政治

领袖的“老道”之处。

中国不仅没有被这个意外事件搞乱，反而以此为契机教育了民众，初步检验了第三代领导人的国民动员能力（军事动员能力已经在去年的水灾中得到检验）。尤其可贵的是，没有因此改变既定的发展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方针。这就使美国逼中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战略目标落空了。

但是，我们在人家已经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情况下，毕竟不能再坚持“只说不做”的守拙原则。当然，我们进一步的策略如果得体，则可以借力打力，还美国“一石三鸟”：促进美国与欧盟的对立竞争；削弱宿敌俄罗斯；引战争祸水西移，再争取10年的和平发展环境。

中国在自己的大使馆被轰炸后打出的牌是要求北约首先停止轰炸，且任何方案必须由南斯拉夫认可。俄罗斯和欧盟本来希望中国同意八国方案，或以投“弃权”票为最低限度，而中国这样做等于否决了八国方案。这张牌打得有理、有力、有利，实际上使中国成了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四方牌局中的赢家。一方面，美国人得以继续主导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并且不得不更加重视中国的作用；另一方面，欧盟自己酿造的苦酒不得不自己干杯，也认识了中国的作用忽视不得。

但是这个牌还没打完。

首先，中国应该在继续呼吁和平的同时，向欧洲（不包括英国）的新生代领袖解释美国遏制欧盟的战略意图，加强与欧盟的各方面既有的关系，鼓励在民间交流中扬欧抑美。最极端的结果是，促使欧盟主要国家反战意识上升，明确反对地面作战，甚至退出空袭，则北约将由于根本分歧而出现裂痕。欧盟与美国的矛盾越尖锐，越公开化，越有利于打破美国的一元化，促进中国希望的多极化。退而求其次，如果巴尔干战争继续，欧盟和俄国被削弱，中国也会由于战争祸水西移而得以延续自己渴求的和平发展环境。

其次，中国可以适当地以自己过剩的粮食和库存积压的

一般日用品援助南斯拉夫。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在战后，我们得以用曾经实际援助过巴尔干为有利条件争取市场，以过剩的建材和建筑能力投入南斯拉夫的战后重建。

中国在使馆被炸事件后，中止与美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这个安排也恰如其分。但我们确实没有条件与美国公开对抗，而且又明明知道美国人的调查和解释肯定不能符合我们现在的提法。于是就会有一个两难局面：主观上不能接受美国人的结论；客观上不接受却没有更加严厉、有效的措施。显然，中止与美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也许是预见到了这个局面，中国的所谓“老朋友”基辛格博士在美国发表谈话认为美国的“道歉”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向中国作出任何让步。许多美国人士则更直接地提出，不能因此在WTO谈判美国已经获得的利益上后退，不向中国做实质性让步。相对而言，本来应该把这两个事件结合在一起分析的中国人，却几乎没有声音，表现得底气不足。

进一步看，这个事件所代表的对中国主权的挑战刚刚开始。我们如果在主权问题上真的不能退让，就应该对中美两国在WTO谈判中的条款认真评估审议，不能完全排除我们以美国退出中国市场为底牌的可能，尽管这个底牌打出去的后果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二）"从纸到纸"的循环：重新认识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

一、什么是真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干预南斯拉夫科索沃省的民族自治问题，我国的强烈反应隐含着对下一个实验场的不详预感，即在政治战略上我们已经认识到，美国以军事霸权推行所谓"人权大于主权"的国际政治关系新准则，则必将在我国不能退让的主权问题上提出挑战。

在中美 WTO 谈判中，美国对自己长期巨额逆差的一般商品贸易虽然也予以关注，但由于它实物经济不占主导地位，**不择手段所要坚持的核心经济政策是保证美元的强势地位，**因此，美国特别强调中国正在发育的资本市场开放，尤其强迫性地要求在金融、电信、粮食等既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又确实存在严重问题的战略产业上"市场准人"。

尽管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已经作出了重大让步，在电信、金融上也准备让步，但美国却不但没有在中国加人 WTO 的双边协议上正式签字，反而"现在坚持这样的要求：**即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也应该让美国有权对中国实行单方面贸易制裁**"。（《参考消息》，1999 年 4 月 13 日）不仅如此，"克林顿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在这个贸易组织中的成员资格不是关系到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一体化问题。它将使中国进入一个法律框架，**迫使它根据西方式的贸易法律行事**。它将使市场极大地开放，从而及早地使得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到外国思想的影响"。（《纽约时报》，1999 年 10 月 4

* 这是 1999 年 6 月写的第二篇关于应对巴尔干危机的文章，原文最初发表在中经网"50 人论坛"上，后经修改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

日）

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歧视和经济压迫，才使中国人在经济战略上逐渐认识到 WTO 谈判是美国以资本霸权对中国推行“全球一体化”的西方自由贸易法则的一次实验。

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事件本质上高度相关。因为，**无论军事的还是资本的霸权，背后所体现的都不过是西方几千年奉行的一元论哲学。**

1. 冷战之后美国人的历史机会

现实地看，美国在“两极世界”解体之后，确实得到了让全世界服从自己“国家利益”的历史机会。**美国统治集团如果坐失良机，听任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多极化”的竞争中强大到对自己形成威胁，那就无异于对美利坚民族犯罪。**

出于这个潜在于美国人内心深处的动因，无论国会表决还是盖洛普民意测验，美国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支持对南斯拉夫动武的。这在本质上与当年的纳粹德国大多数人拥护战争没有区别，只是借口和形式表现不同而已。

在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上，美国在咬定“失误”的同时，尤其强调不能放弃 WTO 谈判中已经获得的利益；在口头道歉的同时，把中国的群众示威描述成对美国的侮辱和对西方的威胁。同时，美国舆论界几乎一面倒地接受“考克斯报告”猜测、推断的结论，大量报道各种对中国的批评意见，客观上已经把中国树立为继前苏联之后的第二个主要敌人。

诚然，**美国人在冷战之后实际上已经没有对手了，也明白知道中国人根本不是对手，**因此才不必再掩饰自己充满霸气的全球战略。而我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战略驱使下，客观上也已经走到了不得不作出选择的岔路口。

2. 中美关系上的两个“不可能”

在考虑中国在世纪之交对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时，**我们确实存在两个“不可能”的前提性悖论：美国不可能不与**

中国为敌，否则就难以建立国民动员机制；而中国必须韬光养晦，因为她根本“不可能”与美国为敌，不仅国内矛盾过于沉重，而且国际上没有任何哪怕是潜在的同盟者。

美国认为对其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域冲突的热点地区；有组织的犯罪；毒品走私。由于我们有核武器，国内有台湾、西藏、新疆、南沙等热点地区，再加上周围有北朝鲜、南亚等基本上也符合美国提出的所谓威胁因素的国家，因此，**美国不可能不把中国作为战略上的敌对力量**。

尽管中国政府在大使馆被炸事件的实际处理上仍然十分慎重，社会公众和舆论也只是作出相对比较强烈的反应，但美国还是受不了，指责中国政府操纵学生和群众反美。**政界和舆论界的主流已经认为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失败**。中国虽然重要，但不可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不能让中国坐大。**中美政治关系越来越暴露出本质上的对立**，走下坡路已经是不可挽回的趋势。最近一个阶段美国爆炒政治“捐款”案，以及“考克斯报告”，认定中国 20 年来大量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3 000 多家中国在美公司多有嫌疑，这都不过是这种趋势的必然反映。

显然，一方面，中国即使有“韬光养晦”的动机，但除了让步之外，客观上没有修复中美关系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在中美关系恶化已属必然趋势的压力下，我们却基本**没有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既不具备核武器的“二次打击”能力，也没有以常规武器控制周边热点地区局势的能力。

如果按照国内“鹰派”的批评意见，改变过去 20 年追求“和平与发展”的路线和已经初步完成的经济体制转轨，即使现在马上着手重整军备，恢复集权，也至少需要 20 年。而美国却可以在我们开始转变战略之初，就直接在台湾、西藏、新疆、南沙这四个我国拥有主权因此根本不能退让、但确实在战略态势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方向上策动敌对势力动武，逼

使我们被动应战，最终我们难免像现在南斯拉夫这样蒙受屈辱，并且有可能随之连带发生国内政治变故，甚至重演本世纪初叶那种有强烈外部背景的分裂政治格局。

二、如何分析美国经济

形成中国对美关系一向是“重中之重”的主要依据是，对美国具有世界经济绝对领导地位的重视。但上述分析提出“两个不可能”的前提如果成立，我们也应该重新从实质上认识美国经济，重新考虑我国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如何应对。

我们在 1997 年以来的讨论中已经越来越明白：这次东亚发生的金融危机是现象，实际上几乎是亚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发生在欧美 1929～1933 年的大危机的一次复制。二者的**本质特征相类似，都是传统制造产业的结构性过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认识：

1. 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了美元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欧美 1929～1933 年结构性危机：

一是战争爆发和战后重建刺激了工业需求，当时旧有的工业在未改变传统结构的情况下，确实有了重新增长的机会。

二是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世界输出军火和战后对世界援助重建物资的同时，美元自然变成世界通用的贸易结算货币，并在战后达到了占国际货币总量约 3/4 的统治地位。

由此，不仅美国的大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可以得到最廉价的资金去进行资本输出，而且背靠金融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也可以进行几乎是惟我独尊的国际竞争。因为，**只有美国可以凭借政府印刷出来的绿色纸片，与世界任何国家交换资源、产品，甚至政权。**

诚然，**具备如此特殊条件的美国，如果政府及其附属的理论界不去促进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推行“国际经济一体化”**

和"国际经济大循环"，迫使或者诱使他们"自由"地与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进行既不可能平等、也不可能赢的竞争，那就是放弃历史机遇，对不起美利坚民族。假如我们也有这种机遇，尽可以冲上国际舞台去唱这种大戏，否则就是对不起咱们自己。可惜，实际上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当然就是不能亦步亦趋，而是只好"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2. 美元的垄断地位与"从纸到纸"的循环

美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绝对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首领，各国以美元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导致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 GDP 增长需求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这就客观上造成了本来并不产生利润的金融资本脱离实物经济，不断在投机资本压力下推出新的衍生交易品种，追逐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其实，这不过是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的正常表现。

于是，以金融资本主导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从纸到纸"的循环**：美联储发行纸币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各顺差国再以得到的美元购买美国发行的其他类型的纸：政府债券或公司股票——美元回流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这种**"从纸到纸"的循环**支撑了美国的资本经济（现在的电子货币和计算机进行的无纸化交易使得循环依旧，只是更节约印刷成本了）持续繁荣。人们看到，**美国对 1998 年高达 2 500 亿的逆差和 20 000 亿的债务似乎并不真正担心**，反而准备迎接 1999 年的 3 000 亿逆差，因为贸易逆差和资本市场相得益彰。事实上逆差越大，资本市场收益越高*。

进入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 1/3 的家庭入市炒股，

---

* 1999 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超过 3 600 亿，2000 年进一步超过 4 800 亿；而资本市场却长期走高（直到 4 月纳斯达克指数下跌），基本上验证了我一年前的预见。

各种基金乃至于地方政府财政都参与金融投机，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数百倍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

3. 战后经济发展与美元相对过剩

然而，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依赖美国的设备输出和美元投资，不得不听任美元资本攫取超额利润。但在20世纪60～70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全面增长之后就不再满足于美元独霸天下。于是有“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汇率谈判，乃至欧洲从追求统一市场到追求统一货币。其间，美元在国际货币总量中的份额逐渐从3/4降低到3/5。有鉴于此，**过剩的美元资本更是只能通过不断发展衍生交易品来保证其对超额利润的渴求。**

美元绝对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比较保守的看法也认为其币值高估约70%。在资本过剩的压力下，金融危机的发生长期以来就此起彼伏，没有停止过。在1999年欧元启动并在今后逐渐成为与美元抗衡的资本力量的过程中，过剩美元的贬值和连带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条件正在日益成熟。但金融危机绝对不会使其始作俑者——金融资本集团从此改弦更张。不仅美国必须刻意维护美元的统治地位，国际大金融资本集团也都因为与美国泡沫化的资本市场利益攸关而不得不维护美元。

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才必然要加强对其他国家所谓“一体化”的控制，企图为过剩美元提供从其他国家实物经济中吸食利润的条件。其中，IMF对东亚国家提供援助时明火执仗地干预内政，应该够有典型性了。以发展实物经济为主的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中后，会受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严峻挑战。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重新认识以过剩美元为主的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

三、走出美元的阴影

1. “华币”和华人经济圈

由于中国经济的证券化程度只有约30%，仍然是目前世界上相对比较健康的经济。今后如果能够顺利启动西部经济和调整城乡关系，伴随以国有资产的社会化改革（参见下篇“因应巴尔干战争和中美WTO谈判的挑战，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就能够进一步有效地增加实物经济总量，为增加货币发行、推进健康的“货币体制”奠定基础。

以此为条件，中国经济可以走出受制于美元为主的国际金融资本控制的怪圈。**具体做法是：**

中央政府结合解决香港已经形成惯性的资本经济导致的结构调整困难，建立人民币与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通过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逐步实行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都以港币结算为主，外汇储备也逐步以港币为主。**这样，既能够在香港建立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防火墙”，又能够依托大陆经济增长来增加港币发行量；把过去主要依托香港经济的港币，转变为既能够依托整个大陆实物经济又完全可兑换的“华币”。

进一步要求台湾从中华民族振兴的全局出发，通过加入“港币”与大陆实现包括货币流通在内的“四通”。如果新加坡加入，则华人货币同盟基本完成。这样就能够全面提升港币（华币）同盟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并且在国际金融资本即将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中，打入代表华人利益的中国金融资本的楔子。

这时，我们才真正地站起来了。

（三）因应巴尔干战争和中美WTO谈判的挑战，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

继上篇**“美国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的巴尔干牌”**，中篇**“从纸到纸的循环：重新认识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之后，我们提出本文作为下篇。拟就中国在重大挑战面前应该考虑的战略调整提出意见。

本文形成时，巴尔干冲突正在收场，大国交易的条件是：以保障美、欧战略目标为主，兼顾俄国利益，压南斯拉夫作出重大让步。**这种以弱国主权为妥协条件的结局及其可能引发的进一步后果，也许更能够促使我们深刻反思，进而考虑**因应对策。

概观当前人们的议论，似乎趋向两极：要么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大资本集团；要么与美国对抗。**我们难道真的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本文认为，中国不能走两个极端，必须找到“其他选择”：

在认清美国的战略意图的同时，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和平与发展”的路线不动摇；另一方面，也应该及时对过去的发展战略作出评估反思：21世纪的中国**应该放弃追求数量的粗放增长；以调整东西差距和城乡差别、全面启动西部开发为手段，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既是我国在挑战面前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在压力下警醒自己的不幸之中的大幸。

---

* 这是1999年6月因应巴尔干危机的第三篇文章。

一、追求增长的传统战略如果延续下去，就必然加入“一体化”，并受制于国际资本

1. 中国粗放型经济的高增长

中国事实上已经有了47年以西方工业化为榜样的增长。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也都表现出经济高增长。我国**属于大量占用、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的压力下转向世界产品、原料和资本市场，当然就不得不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才能存活的国际大垄断资本集团的制约。

这显然是单纯追求发展的战略本身造成的结果，不是主观上是否愿意投向国际资本集团的问题，当然也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问题，更谈不上“卖国求荣”。

2. “资本过剩”与资本“出逃”

进一步看，中国从1995年出现M2大于GDP，近年来在“资本过剩”越来越明显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又连续调低国内利率，这种货币政策的目的是刺激投资增加；但另一方面的客观作用则是**迫使那些进入中国追求高回报率的热钱即短期资本“出逃”**。这在1998年以来发生在南方的金融案件中已经有所表现。

这个情况美国也曾经发生过。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采取高利率政策，国际投机资金大量流入，资本市场活跃但实物经济在资金成本增加的压力下纷纷向外转移。到90年代布什政府又大幅度降低利率，国际资金纷纷流出美国，于是布什政府得到了“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的评价。虽然中国可能得益于资本市场不完全开放，然而资金这个最逐利的要素仍然受回报率影响而流动。例如，1998年我国尽管出口仍然

有所增加，但外汇回笼情况很差：其中有假出口，真套汇；也有些企业资本流出，或者把出口货款尽量留在国外以获得高于国内的银行利息。这样会加剧可能出现的“逆差”。

鉴于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存在上述趋势性问题，**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除了让步和加入，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完成过渡期之前，是否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及时调整经济和体制结构，则必须讨论清楚。

二、因应挑战，追求“可持续发展”

1.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体制和制度原因，以及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我们基本上没有条件像发达国家那样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即使放开资本市场，鼓励资本输出，也受资本规模小和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下政治经济格局既定的限制。何况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进入被西方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放弃了对周边传统市场的控制。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把邓小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理论”与我国“人口与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结合起来讨论，实事求是地**转向我国已经向世界承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如果既不打算受制于人，又不可能与人对抗；如果真的不做两个极端的战略选择，那么就只能另辟蹊径。失去中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最后选择机会，我们将无以立足。

可行的取向目前看有两个：一是调整区域差别，改变爱辉—腾冲线两侧明显的资源—人口的不平衡；二是调整城乡差别，逐渐把自给自足的9亿农村人口的一半改变为市场消费人口，以此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2. 结构调整

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调整中，我们可以修改1985年以来在“梯度发展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资源—资本、资源—人口的不平衡：爱辉—腾冲线以西拥有我国资源的70%～80%，人口仅占20%～30%；以东则只有20%～30%的资源，人口和资本却占70%～80%。

这个区域不平衡如果不改变，我国东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必然依赖海外市场和国际资本，也就必然使中国受制于人。而如果能够大规模启动西部资源开发，就既可以**缩短对新疆和西藏的战略补给线，改变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又体现反贫困的人道主义精神，符合改善人权状况的要求。更何况这完全属于国内调整，不至于引起国际争议。

从近年来我国决策的影响因素看，实施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大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在东部的短期利益可能受损、反对意见增加的压力下，能否坚持符合国家总体利益的经济政策。

具体调整中，我们可以利用中央政府仍然对国内部门垄断的大资本有控制权力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引导过剩的国家金融资本与过剩的民间劳动力投向中西部，在国家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西线“南水北调”工程）中，实行“以工代赈、以工换地”的政策，带动河北、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省份人口多、资源少的地区的农村过剩人口向西部流动，启动西部资源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化。

至于城乡关系调整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近年来议论多多，此处不赘述。

3. 体制调整

为了实现这种利用大国优势的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同时推进体制改革。

由于我国农村约值80 000亿元的原来以公有制为名的耕

地，事实上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末两次以家庭承包为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了，因此，**农民不会因为没有参与对城市公有制资产的再分配而不满。这是我国今后调整城市存量资产时只需要考虑3亿市民而不必对9亿农民分配的特别有利的制度前提。**

我国国有企业资产和房地产按重置价计算，应该有大约150 000亿元。平均每个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可以占有约10万元股权形式的财产权益；国家只要保有其中1/3，即足以建立有财产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如果**体现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者的工龄和贡献对国有资产实行社会化分配股权**，并且随之开放二级市场交易，国家还可以对应发行至少100 000亿元货币，客观上产生平和的通货膨胀效应。从而，一方面既可以彻底改善企业债务和银行资产质量，又能够使我国的经济总量提升3倍，国家竞争力明显上升；另一方面能够**给国人以国民待遇**，减少公众不满，提高社会舆论监督，有效地反对垄断，防止腐败，**实现最低成本的长治久安**。

并且，由于社会化分配股权后，国有企业资产的上亿股东高度分散，职工持股会谈判地位上升，外资收购、控股国有企业的交易费用必然奇高，**客观上有利于我国政府加入WTO之后仍能够对与国民经济关系重大的产业实行调控。**

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总体性危机与中国改革*

温铁军与林顿·拉鲁什对话录**

[**原编者按（节选）**] 今年（1996年）9月温铁军访美期间，拜访了林顿·拉鲁什，作了长达6小时的谈话。回国后，温铁军将此次谈话整理成对话文体，寄给本刊。本刊现将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拉＝林顿·拉鲁什

温＝温铁军

---

* 这是我以对话录的方式写的文章，刊登于《战略与管理》杂志1996年11月。当时亚洲金融危机还没有发生；人们对"四小龙"和"四小虎"的经验仍在津津乐道。此文一出，曾经让人难免嗔怪。后来东亚金融危机真的发生了，人们也一夜之间便都转变了。但这时的分析大多数属于微观研究，集中在东亚国家金融体系本身的技术性问题上。这个倾向至今亦然。

** 《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此文时的编者按：林顿·拉鲁什（Lydon LaRouche，又译林顿·拉罗却尔）为美国席勒学会负责人，美国"实物经济学（Physical Economics）"创立者。曾在本刊1994年第1期发表《中国的复兴》一文，在国内政界、学界产生巨大反响。

现年72岁的林顿·拉鲁什二战期间在中印缅战区服过役，战后曾是社会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有感于西方社会的贩毒、性混乱等腐败现象，开始参与马丁·路德·金倡导的民权运动，并逐步形成不同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后又据此组建了席勒学会。为了划清与政府的界限，该会至今不接受任何有大财团背景的基金会资助，只向社会公众募捐。1987年，拉鲁什及其主要助手曾被政府以经济上的某种罪名逮捕，席勒学会随之被联邦调查局查封。拉鲁什认为这纯属政治迫害。在美国的主要刊物和出版界，迄今都排斥席勒学会及拉鲁什的学术研究成果。

拉鲁什主张复兴工业文明和欧洲经典文化传统，将基础建设与高科技发展相结合，他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以哈佛—牛津为代表的学术思想实在大谬不然，西方经济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局面，希望中国不要听信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神话。

一、国际金融资本危机

拉：数不清的西方政客和学者对苏联帝国的崩溃弹冠相庆，喋喋不休地阐述各种各样的以休克疗法、私有化计划等等为名的拯救方案。孰不知，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本身，意味着以盎格鲁·撒克逊金融寡头为核心的世界金融资本体系总崩溃即将到来，也许明天，也许明年，总之是一种近在眼前的全球化、历史性变化。

温：我们确已注意到世界货币体系的两极之中的一极，即卢布体系的瓦解以及连带发生的信用崩溃；但对另一极，西方货币体系的危机将导致全球化金融资本总崩溃，还缺乏足够认识。

拉：我并不是说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抗中的一极垮掉了，另一极也将不再有意义了，那是抽象的政治哲学解释。我要说的是，650 年来欧洲主导的西方文明的垄断地位将随着既支撑它、又在它内部泛滥成灾的金融资本危机的全面发生而逐渐衰落。这是人类历史上这一次 650 年周期的结束和下一个新的历史周期的开端。

很多善良的人们也许意识不到这种历史周期终结所伴随的全球性金融资本危机的到来，这并不足怪。而那些当权者们或者出于愚蠢的短识，或者出于与金融资本利润蝇蝇苟苟的关系而对此漠视，甚至乐得火中取栗，才是值得人类警醒的。

温：对于长期以美元—英镑体系为主要结汇货币并且正在积极与西方的浮动汇率制度接轨的中国而言，您的判断和预见当然会引起各种不同动机的人们的高度重视。现在很难区别市场取向的改革者和火中取栗的投机者，因为“再跨出一步就是深渊”。不过，为了帮助本性善良之辈跨出那多余的一步，我们需要有说服力的例证。

拉：众所周知，世界金融市场正在新的一轮动荡之中，在1993年底和1994年第一季度投机性的二级市场遭受巨额亏损之后，债券市场出现全球性的抛售。这一抛售使银团持有者的债券堆积如山而无人问津，从而导致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的剧烈波动。比如，6月20日，各欧洲股票市场的股票大幅度下跌，美元对日元和德国的马克的比价也持续滑落。证券投机市场的波动正在加剧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最明显的例子是最近德国巴尔萨母（Balsam）公司破产。这家公司曾经以几亿美元在二级市场赌博中倒腾出几十亿美元最后又输光。但这仅仅是一系列数百万至数十亿美元的二级市场亏损中的最近一个例子。除此之外，还有意大利费尔鲁兹（Ferruzzi）公司估计达二百亿美元的亏损，德国梅托吉塞尔沙夫特（Metallgesell schaft）公司二十亿至六十亿美元的亏损，以及像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迈克·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和戴维·阿斯肯斯（David Askins）这类证券经营公司数百万美元的亏损。

许多亏损的公司得到华尔街金融中心的支持，而这些华尔银行又是投机市场上最大的赌徒。像花旗银行和信托银行这类机构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则是因为得到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支持。然而就连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被迫承认这一体系的危险。在国会听证会上他表示，之所以提高利率是因为他对金融动荡的担心。对此，欧洲更显得忧心忡忡。法国总理巴拉迪尔（Eduard Balladur）对《观点》（Le Point）周刊说，他担心“每日交易量犹如脱缰之马无法控制，有可能引起国际金融大规模危机”。

温：西方主要外汇、证券市场的波动，已经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从日常看得见的报道上看，他们虽然试图进行干预，但动作不大而且效果并不显著。

拉：那是表面现象。过去六个月中，包括国际清算银行

在内的一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带来了危险。尽管它们也曾经在是否需要金融界本身或政府加强调控问题上争来争去，最终还是决定不作实质性干预。显然，它们不打算从根本上放弃造成大规模投机的浮动汇率制这个原则。而这一原则本来源于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信条。

我注意到六月初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国际金融会议上，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Eddie George）公开表示他本人对二级市场并不担心，他担心的是回到以前的固定汇率制上。他还说，有关二级市场的担忧被过分夸大了。惊呼“狼来了”几乎一年之后，国际清算银行也偃旗息鼓了。这一明显与英格兰银行相呼应的转变，发生在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兰姆法鲁西（Lamfalussy）被英格兰银行前高级官员安德鲁·克罗克特（Andrew Crockett）替换之后。

美国政府也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参众两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唐·里格尔（Don Riegle）和亨利·冈萨雷斯（Henry Conzalez）曾经表示，担心联邦储备委员会以牺牲多数美国人的未来利益为代价，挽救投机分子。会计总署今年春天的报告也强调指出，若不对金融市场上的赌博进行控制，有可能对整个美国经济体系带来威胁。

西方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家既不打算对他们策划的东方私有化浪潮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负责，也不打算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劣根性。

但是迄今为止，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和委员约翰·拉威尔（John Leware）还坚持说政府决不能对市场进行控制，即便是金融机构进行的调控也应受到严格限制。

难道说这些金融资本的卫士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吗？当然不是。他们宁愿听任牟取投机暴利的少数人在金融帝国的空中楼阁倒塌之际捞上最后一笔，然后让货币体系崩溃的恶果转嫁给社会公众。尤其是依靠西方主要货币进行贸易的发展中国家更会损失惨重。他们试图维护的只是给金融资本带

来丰厚利润的原则，幻想通过银行业之间不能公开的金融交易来使西方货币体系苟延残喘。并且我清楚地看到，以伦敦——纽约为轴心的金融帝国，正在极力把刚刚解体的苏联东欧诸国和正在发展的中国纳入病入膏肓的西方货币体系，吞噬这些国家的血来使西方垂死的金融资本回光返照。

温：问题在于已经解体的苏联东欧国家和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到底有多少血可供西方资本吞噬？即使有又能支持多久？在匈牙利和波兰，据我所看到的资料，外国投资利润的净流出已经大于投资的进入；在中国的深圳，有人测算出外资利润流出的比例约占利润总额的74%。

用中国出版的报刊上公布的数据作分析，近10年的本币贬值与外债增长的比例，在函数曲线上的陡降和陡升恰恰像令人震惊的“血盆大口”。1993年以前的10年间，人民币与美元比值平均每年下降27%，1994年一年贬值50%以上；1993年的外债总额约800亿美元，1994年上半年猛增至1 200亿美元，又是一个近50%，现在中国平均每人背负着2 000多美元的内外债，对于占80%的农村人口来说，这相当于他们三年的人均收入。

1992年初，我自费到东欧考察，那时在俄国，卢布与美元大约80∶1。两年之后，已经是3 000甚至4 000卢布才能换1美元。同样的货币体系坍塌的画面在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在所谓西方化的改革中最早跨出去的南斯拉夫都已屡次出现。

从最近哈佛著名教授在中国举办讲座的言论看，西方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们似乎既不打算对他们鼓吹、策划的东方私有化风潮中社会公众的巨大损失负责，也不打算重新认识这种源于“自由贸易信条”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到今天的劣根性。不论是曾经风行的货币学派还是供给学派的教授们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弟子们，都在对始于欧美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提出的治标之策上饮鸩止渴。也许是出于“中国式的谦虚”，我们很少对西方的经济问题评头品足。既

然现在论及“国际金融危机”，我想以近些年几次来美国的直接感受谈点看法。

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为了刺激美国经济采取高利率政策，使得海外资本大量涌入美国，造成短暂的虚假繁荣，接着却是企业不堪高利率重负，工业资本出逃，就业水平下降，外国商品包括中国货在80年代中后期迅速地高比例占领美国市场，最终导致美国经济“空心化”。布什政府上台之后不得不大幅度降低利率，又使得金融资本出逃，连带造成不动产业危机。共和党两任总统在利率上的跳跃式调整给美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不得不让位于民主党。克林顿新的利率政策似乎比两位前任稳健得多：利率水平介乎于里根和布什之间。——可以认为，这是美国经济表现出一些缓慢复苏迹象的内在原因。

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系列受西方控制的机构，都在试图左右俄国和东欧人民的命运。

拉：中国人能够看清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市场经济理论的弊病，是十分值得庆幸的。因为我知道哈佛的所谓教授在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作为。不仅是他们，还有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系列受西方控制的机构，都在试图左右俄国和东欧人民的命运。但愿中国能够摆脱控制。为此，我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内在结构，否则就不能对全球性的问题作出总体判断。

温：中国以部门垄断资本为本质的政府经济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局面之中并不那么超脱。无独有偶，几乎就在里根——布什——克林顿“利率翻腾转体360度”这种表演的同一时期，中国80年代下半期以来也表现出似乎雷同的“经济调节”过程。

1988～1994年，正是中国第三个经济周期。其间，政府第一次运用了利率、税率及汇率等经济调节的主要手段，其作用过程相当复杂。

以1988年夏季全国范围的抢购和挤兑为表象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社会政治动荡相继发生，如果可以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来分析政府政策，则可以看到：从1986～1988年，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强行压减投资、消费双膨胀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政府开始连续大幅度调高利率，以此吸纳社会即期货币，减轻通胀压力，存款利率一度跳跃式地升高约70%。而同时贷款利率又在行政性强制下不得提高，于是造成银行当年出现400多亿元的政策性亏损，冲入财政变成赤字。高额赤字压迫政府改变决策，相应调高贷款利率，风险又恶性循环转嫁给企业，即银行高利率造成企业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动资金贷款最多的商业企业被迫减少资金占用，改购进为代销，向生产企业转嫁成本负担——生产企业如法炮制，缓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业转嫁产品成本占压资金负担；于是连锁负债迅速波及全社会。

对1988年通货膨胀缺乏经验和规律的认识，在经济调节和行政控制上反应过度，是第三次经济周期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观原因。不仅利率政策过度调整是连锁负债的内在原因，而且市场政策的过度调整也是当时"市场疲软"的内在原因。

中国在进入90年代之前既无资本、技术、劳务、物资等要素市场，也无住房、保险、医疗、旅游、教育等社会消费市场。10亿民众可以进入的只是一个"两极化的市场"：一极高档大件消费品市场；另一极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这是一个"翘翘板"型的"两极"消费品市场。为了抑制通胀发生时本属短暂的对高档商品的抢购，政府在大幅度调整存款利率的同时还大幅度调高以彩电为代表的大件消费品价格，另加高档消费税，使等量货币的市场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几乎一瞬间就人为地关闭了两极市场中的一极。翘翘板一头空了，而另一头，据测算，早在1986年大多数农业主要产品即已受到"市场需求制约"了。于是，1989年初城市消费品市场开始呈现疲软之态。

1990～1991年，经济处于低谷阶段。据报刊统计，政府采取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政策，投入1 500亿元贷款，但此时的连锁负债已达2 000亿元之巨，同期国营企业库存产品占压资金也已超过1 000亿元。另据报刊统计，国营企业亏损面已超过70%，遂不得不将“全面倾斜”改为“点贷解扣”。

国营企业连年亏损，政府财政连年赤字。先是1989年秋冬之交试图财政、外贸收权不果；接着以财政解困为目标、“甩包袱”式的改革政策便相继出台。其效果之一是，萧条阶段财政取消农产品购销补贴后的农村市场也走向全面疲软：因为以往国营流通部门凭借财政补贴，垄断性地占有农业主产品商品量的一半以上，当1990年取消收购和销售补贴之后，流通部门的直接反应是大幅度减少购进和库存，挪用银行专项资金用于高利润经营。这一行为的直接作用是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不再有“蓄水池调节”作用，从而导致各种欺行霸市和价格波动无序化，并且随时诱发社会动荡，经济矛盾日益社会化，“菜篮子”等等与是否稳定相关的问题渐渐成为各级政府分外重视的主要矛盾。其间接作用，一是两亿多小农户无法适应原有的国营流通部门收购份额迅速下降的新局面，“农产品卖难”再次普遍发生，农民收入随之连续三年下降，占有全国消费品市场60%以上的消费额并且一向稳定的农村，随之出现全面市场疲软。二是农业比较收益过低的老问题在农产品“卖难”和农民收入连年下降的作用下陡然突出起来，迫使数千万农民外出谋求生路，“民工潮”大范围涌流。

拉：西方很多人称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为“奇迹”，我所能见到的数据也显示中国最近两年的高增长率。尽管我认为在全球性金融资本崩溃危机之中谁也不能幸免于难，中国并不例外，但还是希望你能对这个所谓“奇迹”予以解释。

温：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的确渐渐复苏，并随即转入高涨。但实际上刺激经济复苏的兴奋剂有两支：

一是1988～1989年的高利率政策失效之后，政府又把利率连续调低到甚至低于原来的水平，高利率时期大量吸收的存款必然流出，因此社会上的资金环境暂时相对宽松。同时资本市场初步开放，低利率政策又使货币持有者转向风险大但收益率高的股票、证券市场和其他投资市场。

二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半数以上县级财政长期亏损，政府利益在财政分配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仍然每年以集团消费递增约30%的速度迅速膨胀。在第三个经济周期已经吃空了以行政占有的流量资本的形势逼迫下，政府及所属部分的利益之手开始伸向能够即占即盈的房地产领域。全国性的开发区圈地热和房地产、股票、期货三大投资一齐上的存量资本瓜分浪潮，忽然间似狂飙拔地而起，的确在暴富了一批投机于权钱交易的食利者的同时，在病态的经济背后又猛击一掌。

1992年以后是经济高涨期。据报刊统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992年的7 600亿元跃增至1993年的13 000亿元，1994年又在上年增长70%的高比例上再增40%。任何对存量资本的重新分配都会促进经济成长。尽管90年代初以圈地运动和泡沫经济为表象的中国经济发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其实质不过是周期规律作用和对国家资本的又一次再分配。

之所以说是"又一次再分配"，是因为80年代初那次改革之中，农民曾对人民公社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作过一次再分配，并迅即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不同的是，那次分配是农民凭借社区成员的天赋权利和农业文明的均平传统所作的社会化占有；而这次分配是食利者凭借政府权力或以"寻租行为"对赎买到的法权关系所作的特权占有。

无论如何，相隔10年的两次国家资本再分配尽管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相左，因而不尽如人意，但却都形成了经济发展最起码的基础——利益目标明确、活跃的经济主体——因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可以从历史角度肯定其

进步意义。

政府控制国有信用体系本身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应是有利的条件，问题在于导向。

1994～1995年是第四个经济周期的发生期。与前三次滞胀周期不同的是，这是一次类似于苏东国家货币体系坍塌之前普遍发生过的信用过度膨胀导致的通胀型周期。现象过程如下：上次滞胀型周期过程中，财政甩包袱只部分减少了亏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消费膨胀和其税收主源——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的问题。据报刊统计，企业亏损面一直在50%以下徘徊。到1992年，自然赤字额已高达近500亿元，1993年不计入债务的亏空又进一步上升至800亿元左右。此时，连续8年的财政向银行透支，已吃掉了国有银行全部自有资本金，使金融系统100%负债。尽管1993年末政府宣布不再向银行透支，发行1 200亿国债抵补财政亏损，但银行部门仍不得不掏口袋购买其总额的70%。对银行而言，这意味着挖东墙补西墙；而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用公众存款充填政府消费，显然是信用问题。

拉：在基础建设、资源开发和物质生产等部门贷款形成债务并不可怕，因为这种生产过程会创造综合收益，并且可以通过其他信用方式和结算方式转化、消化债务。所以，政府控制国有信用体系本身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应是有利的条件，问题在于导向。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国家信用体系绝对不可以投入证券市场去赚取投机利润，而是必须用于支撑依托科技进步和资源开发的物质产品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点，既是美国早期的立国之本，也是21世纪30年代初从大萧条中拯救欧美经济的“罗斯福新政”之本。在我创立的“实物经济学”中对此有全面阐述，国家信用体系及其使用方向应有效地提高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温：见诸文字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当然力图使信用导向

于基础设施建设。但是，金融部门作为利益主体，其获利动机与政府目标相悖。这是国家资本潜移默化为部门垄断所必然产生的矛盾。

又由于上次周期中失败的利率政策使企业连锁债务一直未能根本解决。向国营企业倾斜和“花钱买大好形势”、“贷款发工资”等保稳定的政治任务又进一步迫使银行贷出资金的40%逾期难以回收，实际上即是用60%的可贷出资金产生的利润来支付100%的存款利息。银行资深研究人员指出，如果不是以国家为名，银行早该破产了。

金融部门在如此困境之中既然不能破产，其解困行为只有两条路：一是投入高利润来抵补亏损；二是转向国际资本市场吸收其过剩、低息资金来缓解中长期投资需求压力，防止进一步亏损。

尽管国家现行政策限制使之无法未能公开走第一条路，但暗中拆借或利用自办公司参与金融投机仍屡禁不止，使得国内资金市场利率一直在月息2分左右。高利贷由此横行全国；而第二条路——大规模举借外债（对外扩张信用），则显然正在发生作用。据报刊统计，1994年上半年中国外债总额从上年800多亿元激增近半，达到1 200亿，即是明显例证，同时，由于40%的逾期贷款包袱越背越重，银行也不得不眼光向内，扩张信用。

一般而言，信用膨胀就像吹气球一样，胀到临界点，必然发生信用崩溃。上一轮“三角债”的恶梦淫威犹在，新一轮连锁负债重又发生，即是信用崩溃临界点的表现之一。

二、关于市场经济及“自由贸易信条”

拉：中国近期经济危机的性状特征对于她所追求的市场经济而言并不鲜见。自从1971年尼克松颁布政令，采取“浮动汇率”的货币金融政策以后，欧美国家在布鲁塞尔货币会

议上通过了以提高净资本流动率来维持其实际消费的办法，结果，欧美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因为追逐利润的货币资本必然加速从发展中国家流出。这就是西方诱迫或甚至是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的以金融资本榨取利润、高度剥削为实质的“自由市场经济”。

正如我刚才说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源于“自由贸易信条”。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完全是不道德的。我认为正在改革的中国人至少应理解，这种极不道德的自由经济会摧毁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和民族文化。不过，几乎所有处于改革运动中的新一代领导人都会说：“如果我们不宣称市场经济，不接受自由贸易，英美势力就不再支持我们，保守分子将很快恢复旧体制”。

18世纪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就是反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而在同一历史时期，法国却被自由贸易政策搞垮。

对于这种非常现实的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历史教训：18世纪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就是反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而在同一历史时期，法国却被自由贸易政策搞垮，路易十六人头落地。大英帝国1776年炮制出自由贸易原则，自己并不施行，而是强加给那些它想要搞垮的国家。1783年，当时英国首相威廉·菲茨莫里期·皮特（谢尔本）曾以此作为缔结秘密和平条约的条件来胁迫美国和法国，美国不仅拒绝了，而且在1787～1789年的联邦宪法草案第一款和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关于信贷、银行的政策中，都体现了反自由贸易的政策。

温：200年前作为刚从英国脱胎而生的美国，以反自由贸易政策在与原宗主国的不平等交换中有效地保护了本国的利益和主张，一跃而成为强国之首；而本为英国宿敌的法国，却在随后发生的1793年大革命中陷入长期的混乱，这确是有教益的历史对比。

拉：更有历史意义的例子发生在现在的俄国。那里已经

出现了明显的发生进一步戏剧性变化的问题。如果叶利钦继续向西方靠拢，俄国已经发生的政治危机将恶化，那些坚持传统的人们将会要求军队帮助，这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人们已经习惯了旧体制的既得利益，实际上是“惟物是图”。因为在俄国，传统计划分配体制意味着政府要把肉和面包放在俄国人民的桌子上。

这种政治危机的基础并不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制度之中，而是更为久远。

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缅甸的明岩（Myingyan）曾驻有两个中国国民党的陆军师。有些中国士兵告诉我如何动员民众加入军队，“想吃白饭的跟我们来吧！”对于穷人，吃白米饭的眼前利益掩盖了送命的永久损失。

在亚洲其他国家和今天的俄国，当吃饭都是问题的时候，解决生存危机似乎是足以动员民众的惟一正确的计划，而这种计划甚或仅仅是口号，就可能使保守力量再次主宰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并非危言耸听，请看一下最近 20 年亚、非、南美国家的政治变迁吧，教训足够了。

温：与俄国的计划分配体制的根本差别在于：中国只对其人口的 20%，即城市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和政府公职人员实行财政补贴和计划分配；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非国营人口”则不仅不享受这种不平等的“计划”，反而要为被补贴拖累的财政提交税费。不过，也许正因为“八亿人给两亿人搞饭吃”，如比“四抬大轿”，中国才得以在东欧和前苏联阵营解体之时仍可维持政治稳定。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一旦以“均田免赋”为国策，总会稳定几十年、上百年，小农经济不仅是中国人“吃饭”的基础，也使它无法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因而不得不另辟蹊径。有鉴于此，我一直主张第三条道路。而某些知识分子不谙历史和国情的西化倾向，很可能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稳步发展、渐进改革的基因，甚至酿成祸端。

拉：假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俄国和东欧国家这些已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国家，能够用我的眼睛来洞察"自由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演变过程，就会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开它。

你们很少有人知道"威尼斯阴谋"（Venece Game）的故事。13世纪初，威尼斯商人曾用他们的诡计，把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目标从对占领耶路撒冷的异教徒的征讨，转变为对同属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的内战和抢掠，因为该城不仅与威尼期同样经商致富，而且是具有竞争力的对手。威尼斯阴谋的成功，不仅加深了东西欧基督徒之间的仇恨，而且使十字军东征的"圣战"堕落成为某些商人为了暴富而策动军队进行卑劣抢劫的烧杀。

16世纪英王亨利以离婚再娶遭到罗马教庭反对为由开始建立以国王为主教的新教，这就给那些已经足以使金钱成为货币资本，但却在罗马教义制约之下不能大肆放高利贷的威尼斯商人一个前往英国的历史机会，带去了他们的金融资本及其"威尼斯阴谋"。这使英国成为最早的金融帝国和政客阴谋之源的杂交基因。英国人首创的自由贸易的信条也是产生于金融资本和反基督教道德的那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强调自我发展而否认人类平等，把一些民族当作奴隶，把自己当作主人。既然如此，遑论其他派生的经济学派了。现实的问题在于，派生于反对人类平等、进步的道德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说，不仅已经把西方经济发展过程拖入殖民主义的泥沼，而且正在影响整个阵营解体之后的前苏联、东欧这类宣称要进入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人们显然已经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和殖民帝国主义的罪恶，现有同样的故事正在东欧、前苏联和中国重演。

温：中国曾经长期排斥市场经济，而现在是否认同市场经济似乎成为了划分改革与保守的政治界限。这使得学术界很难有讨论的余地。

拉：我认为中国有三种主要倾向：其一是企图恢复传统体制，人们称之为反对改革的倾向；其二似乎有改革的倾向，但这些人有某些特殊利益，而且同英美势力合作牟利；其三是另外一些真心希望改革的人士，由于缺乏西方历史知识，也把自由市场经济当作济世救民的灵药。后两种本来具有质的差别的人，当前却都认同着一种似是而非的政策— “中国的问题就是人口太多，我们要把 XX 变成香港，利用中国大量过剩的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进人市场，通过英美的朋友远销到世界各地赚取外汇”。然而这的确并非新的发展政策。有些幼稚的人甚至更糟糕，竟然认为假如英美势力在半个世纪前没有退出中国，或者说中国早半个世纪成为西方殖民地，那可能比现在的经济水平好得多。这种梦想历史倒退的思潮，就像出卖你们的人民为奴隶的思潮一般无二，正是民族道德和文化衰败的表现。

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采取类似于大英帝国自由贸易原则的对外经济政策倾向，至少会招致两种令人堪忧的后果：其一是执行这种政策本身意味着传统社会经济模式的失败。于是会引起以过去为荣的人更坚持不改革，而他们对改革错误的批评中，有些凑巧是对的，这就在思想界引起混乱；其二是后两种反对旧体制的改革者对这场改革缺乏正确的经济理论指导。这些改革者中甚至有英美势力的代理人。改革中不断出现经济问题引起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冲突是十分严重的。于是，这后两种改革者为此感到无助，他们担心美国人不帮他们，有些人由此不断地取悦、甚至惟恐无法取悦于英美势力。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特色，而是当代世界上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共同的危险趋势。引导当前这种危险趋势的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思想。此外，还要有一种不同于上述三种倾向的力量和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坚持传统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提出了正确的发展方针，而改革者却一再出现决策失

误，那将会产生戏剧性的历史变化。

温：在市场经济终于作为一种体制在中国被确认下来之后，那些一向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们甚至还来不及感受最初的欣慰，就和社会公众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资产的瓜分狂潮忽然莫名其妙地堂而皇之起来；尽管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感到“资本主义的丑恶”，然而又大都无可奈何地把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被视为非法的政治权力控股和垄断剥夺当成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同胞兄弟。如果不是近几年来对东西方 16 个国家的研究考察，我也不会得出如下看法：前苏联、东欧诸国的解体只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对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代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无论是官僚垄断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财团控制的市场资本主义，都是有悖于人类良知和社会公理的。所以，在传统的国家垄断资本统治下饱尝困苦的东方各国，确实不能迫及待地扑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

两种资本主义都源于西方，10 亿中国人中绝大多数对此语焉不详。看来问题在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至今影响着人们，仍时常左右人们判断事物的价值观。

东欧原国营企业“民营化”的产权问题[*]

提要：

1. 东欧诸国提出所谓“私有化”概念，针对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中的“公有制”概念，**长期受意识形态之争困扰的研究人员还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都已经在完成国家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发生本质变化，从“全民所有制”逐步演变为“单位所有制”。**国家资本早已被政府各部门和大公司垄断分割为“部门资本”。而东欧政局的突变，恰恰扯掉了所有“国营企业”、“公有制”一类美丽而又痛苦的斯大林主义经济学概念编织的外衣，露出赤裸裸的单位职工实际占有企业资产权益的产权实质。显然，私有化从一开始提出来就受制于传统意识形态，不可能解决东欧的实际问题。

2. 东欧诸国社会经济问题已构成恶性循环怪圈，即国营经济严重不景气——政府税收困难，财政拮据——举借外债，通货膨胀——民怨沸腾，社会动乱——政府调控能力下降

---

[*] 本文是作者1991年12月至1992年1月自费赴苏联东欧7个转轨国家考察的报告。先在内部刊物登载，后发表于《中华工商时报》1992年9月30日第5版。

本文背后的故事起因于1989年苏联的8·19事件。当时我正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与那里的人进行交流时常常被质询：什么时候中国会像苏联这样？为了搞清楚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便只身前往苏联东欧7个转轨国家做了40天调查。由于没有按时回国，又“擅自改变出国地点”，回来后几乎受处分。我的自我辩护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学者，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种如此重大历史事变发生时，自费前往考察研究，何错之有？好在领导通情达理，让我写出考察报告代替检讨。于是便有了本文。

——全面危机，军事管制……其起始点是人所共知的国营企业效益低下，但症结却是那种厂长与工人利益同构，一致追求内部消费和福利最大化而无人对资产增殖负责的“单位所有制”。

3. **东欧诸国的“私有制”差异极大**，甚至有本质差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做法在理论上有国家资本社会化的合乎逻辑的成分；前东德的私有化代价将被德意志在欧洲崛起的巨大成功所冲销；而波兰的“私有化法”尽管有保护工人权益的合理性，却缺乏可操作性。至于俄罗斯，由于前苏联国家垄断资本的经济体制与官僚等级制的政治体制并未随着共产党的解体而发生实质性变化，所以其盲目照搬西方模式的私有化方案必引发社会动乱。

4. 中国与前苏联、东欧诸国在国家经济体制上有许多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十年改革的成功之所在，即是从国家垄断资本控制最薄弱的环节农村入手，对国家以人民公社名义所拥有的土地资本再分配为以农户承包为形式的小额劳动者资本，创造了以大量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进行再积累的基础。堪称独到之处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下半期，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触及城市工业体制垄断资本的产权问题时，所遇到的麻烦与现在的苏东诸国绝无二致。随着国家资本演化为部门资本，全民所有制演化为单位所有制，国营企业产权的“灰化”程度越来越大。现在城市企业职工把“爱厂如家”变成“厂里有啥家有啥”，而各类干部则依托自己控制的部门资本份额来进行“资源置换，权钱交易”，社会性的腐败正在蔓延；而从传统的意识形态出发，在经济上采取对国营企业“输血”、“倾斜”的政策，则不仅造成数千亿元的无效益投资转化为库存占压资金和大量消费基金，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腐败。

5. 既然在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资本的部门垄断或称部门资本，以及全民所有制演化为

产权关系极度模糊的单位所有制是苏东诸国（包括中国城市体制）的本质性弊端，那么，解决的办法是“国家资本社会化”，即通过清晰国营企业产权，建立劳动者份额，并以此作为劳动者资本再积累基础的经济机制，以此改造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政体，发展由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一、国家资本社会化的不同探索——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所谓“私有化”带有明显的社会公平特征

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在前社会主义各国激进的“私有化”浪潮中，虽然先后颁布了推行私有化的法规，但其内容从现阶段看，却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如果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本质特征即是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那么，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事实上都在程度不同地实践着这种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这两个国家都试图把不同份额的国营企业资产平均分给全国18岁以上的公民。

较有独到之处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仅有160万人口的高度工业化国家，早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即开始工业建设，二战前曾在工业产值排名上位居世界第七位。由于早期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二战前就已完成，事实上无法计量劳动者在某个具体企业中所应占有的资本份额及收益份额；而且又有国营企业职工装备系数大的优势，所以1990年10月提出“私有化”时，其设计构思实质上是将产权关系模糊的“单位所有制”改为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实现国家资本的社会化，即年满18岁的公民只需象征性地付约40美元，便可通过登记取得一份价值约400美元的国家资产优惠凭证。用这种方法改造全部国营大中型企业的80%，政府只控制5%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其他15%属资不抵债，作

破产处理。

此前，政府已经通过拍卖向公众售出了900家小企业中的80%，由于拍卖中竞标踊跃，所获资金竟然高于这些企业资产原值。

1990年4月开始的价格改革也很成功。政府在开放物价的同时，根据原来计划价格与市价之间平均27%的价差比例，给居民每月约合6美元的价格补贴（人均工资的5%）。由于价格改革与小企业拍卖同步，大量社会资金充入资本市场，避免了格价革改通常带来的大幅度通货膨胀。据测算，通货膨胀率1991年为55%，1992年将下降为15%。

捷克斯洛伐克国营企业民营化的制度环境比较稳定，一是农村早在80年代初即开始改革，通过实现真正的企业化原则，把拥有80%的耕地资源的“集体农庄”改造成为类似中国农村基层的“农工商公司”性质的兼业经营实体。农村改革的结果不仅仅使捷克农产品自给率达到120%，而且使政府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下降了40%（从350亿克朗下降为190亿克朗）。当1990年宣布“私有化”时，集体农庄作为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仍是农村经济的主要成分，几乎没有人愿意分地退出，成为私营小农场主，更何况那意味着失去从集体农庄分享加工工业和商业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的权利。这与中国大城市郊区那些副业发达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类似。二是在转变国营企业所有制之前，已通过价格、税收、汇率等一系列调整优化了市场。例如在价格放开的同时把进口消费品税率从5%提至25%；汇率自由浮动，允许居民小额兑换外币（三年内每人可兑换300美元）。但所有注册的外贸进出口企业只能通过银行转账结汇，按公布的当日外币汇率托收承付，从而减少了黑市外汇投机交易。在所有东欧各国中，捷克物价水平最低，社会秩序最好。

以所获资料作对比，罗马尼亚在处理国营企业资产的产权问题上与捷克主要有两点不同：其一，捷克是象征性地低

价转让了80%国营企业的资产券；罗马尼亚是干脆将30%国营企业的资产赠送给18岁以上的公民，其余70%出售。倘若本单位职工愿意，可以低价再购买10%的企业资产，这样就有40%或更多份额的国家资本可以实现社会化；其二，捷克国营企业资产只处理给本国公民，而罗马尼亚则允许外国人购买本国企业股份，同时，对那些购买本单位股份的职工，则给予10%的优惠并提供贷款，还允许分期付款。由于罗马尼亚的私有化设计晚于其他东欧国家，可以吸取他国的经验教训，因此，这一特点的可操作性较强。

二、私有化作为一种制度选择所应付的代价——前东德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在所有东欧各国中是惟一名副其实的

德国的私有化是名副其实的，伴随着日尔曼人特有的精明与冷酷。表面上看，其制度变迁费用最低，但间接损失无法计量。

两德统一于西德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前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所有制本质比任何其他东欧国家都更直接，也更突然地被剥去了公有制外壳。**国家机器“消亡”了；国营企业所归属的政府各主管部门解散了；“人民群众通过国家来间接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所依存的上层建筑崩溃了；所谓的国营企业一下子暴露出赤裸裸的“单位所有制”性质的产权内涵。**虽然所有前东德的国营企业名义上已经属“东德事物托管局”管，但无论是托管局还是托管局所代表的任何人，都不曾在这些前东德企业资产的原始积累和后期的增殖中付出过任何劳动或其他形式的代价，从理论上或道义上讲，都无权成为这笔巨额资产的所有者。因此，**尽管在资产评估精确、法律制度健全的市场上出售，照样卖不动。**前东德工业产值曾位居世界前十名，企业装备

技术水平在东欧诸国中首屈一指，卖不动的原因何在？就是“单位所有制”，即企业职工实际占有本单位资产。假如任何企业主从“托管局”买下前东德企业并且经营管理，这就意味着改变原企业职工分享资本收益为新企业主独占资本收益，因而必然会遇到职工保护原有“单位所有制”的自发反抗。随之而来的是“东仔、西仔”矛盾：西德人指责东德职工素质低，劳动纪律差，难于使企业按现代化方式运转；而东德人则指责西德人贪婪掠夺，为富不仁。

据托管局官员介绍，1991 年前东德有破产企业 600 家，1992 年上半年计划再破产 2 000 家。同时托管局成立专门公司，经手大量破产企业的设备拍卖业务，以此来加快前东德企业所有制的转化。由于企业破产后职工被迫离厂转向社会救济部门，他们只能领取原工资的 45%作为生活救济，等于托管局只付原企业活劳动成本的 45%，即打破了“单位所有制”，抵偿占有原企业全部资产，客观上剥夺了原企业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剩余价值形成的资产的权益。显然，这样做有利于德国现政府。前东欧诸社会主义工业国中，也只是德国有这种条件，凭借统一之后前东德上层建筑的坍塌，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的政治优势，以低费用完成制度变迁，改造经济基础。不过，企业破产，设备拍卖，不仅损失了系统效益与规模效益，而且无异于强制企业资产大幅度贬值。此外，前东德青年纷纷离家西去谋生，德国东部迅速老龄化，社会衰败，“东仔、西仔”差距因之更大，这反过来迫使政府增加用于东部的财政开支，这类间接成本是无人算得清的。

不过，设身处地站在德国政治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新加入联邦的东部各州”，只要不致影响德意志抓住当前的战略机会去做历史性的跳跃，那么其问题仅仅是盘中的一颗小菜。仅在最近一两年的短时间内，德国即已在老“奥匈帝国”和轴心国的势力范围内，在第三帝国半个世纪前曾控制过的“火药桶巴尔干”，甚至在“大斯拉夫”体系的西太平洋出海

口不断拓展。在苏东诸国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中，德国的影响正在静悄悄地扩大。在东欧政局变化最大的 1990～1991 年，德国对东欧的出口增长了 58%，进口增长了 65%。尽管这种变化是德国 1991 财政年度赤字达 210 亿美元的因素之一，可与之相比较的是，美国同期对东欧的出口下降了 21.7%，进口下降了 10.5%；而在此前的 1987～1990 年则正相反：德国对东欧的出口仅增长 13.5%，进口增长 15.8%，而美国对东欧的出口增长 25.1%，进口增长 6%（据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92 年 1 月 15 日）。

在捷克斯洛伐克引进的 10 亿美元外国投资中，70%为德国资本。波兰、匈牙利引进外资的主要成分也来自德国。在新独立的克罗地亚，人们公认的主要政治支持者和军火供应商还是德国。如果不是德国迫不及待地对克罗地亚率先给予外交承认，其他欧共体国家是不会怀着一种几乎是被裹挟的情绪结束观望的。

当日本援助俄国以归还千岛群岛为条件，美国人则只愿意提供农业贷款用于购买美国小麦时，德国人却向前苏联和整个东欧伸出“援助”之手，使丧失了原“经互会”内部贸易额的东欧各国饥不择食地涌向德国。当然，也同时向这个“最慷慨”的投资者敞开了本国市场大门。

人们毫不怀疑本世纪末德国将会在欧洲中部崛起，成为欧洲集团的领袖。因为它伸出左手便可以获得东欧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伸出右手，则是西欧的高技术和资金。更何况还有另一个不可比的优势，正如东德事物托管局一位年轻官员所说：“东德人也是日尔曼人，虽然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了半个世纪，谁都知道，日尔曼人的素质是世界第一流的”。

三、在恶性循环的怪圈中挣扎——波兰人已经对资本主义失去耐心

私有化作为一种制度选择，所针对的是国营企业的效益低下问题。在波兰，这种制度选择的主观性与制度变迁的客观性显得十分矛盾，并且已经堕入恶性循环：国营企业效益低下——国家财政拮据，外债增加——通货膨胀加剧，公众不满——社会动乱，国家失控——军事管制，恢复秩序——结束军管，通货膨胀……。若不解决国营企业产权问题，则只能沿着此种恶性循环走下去。现在，社会公众在新的通货膨胀恶梦中，似乎怀念起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铁腕。据波兰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民意测验显示，1988 年结束军管前只有 46%的人愿意"把国家交给更强有力的人"来管理；而三年之后，这个比率已上升为 64%。今年预计失业人数将由 210 万上升为 350 万，达到 20%，通货膨胀率仍将超过 15%。据 1991 年底的民意测验显示，面对急转直下的经济局势，94%的人认为经济前景不妙。

雅鲁泽尔斯基军事管制对解决 20 世纪 80 年代初高达 400%的通货膨胀危机的确有效，但军管集权体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营经济因产权不清而导致的长期低效益问题。因此，一方面是波兰国营企业严重不景气，政府税收困难，财政拮据，债台高筑；另一方面是职工普遍从事不纳税的第二职业，民间"灰色经济"从摊贩如林的原始市场中崛起。当军政府终于还权于民、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时，维持社会安定和公众基本生活水平的竟然是这种"灰色经济"，此外，还得归功于波兰传统的小农经济。因为占总产值 50%的是农业产值，而其中 90%又是小农提供的，所以波兰人好歹有吃的。

波兰政府 1989 年开始搞私有化，原计划三年内完成，但至今原 8 500 家国营企业无人问津。马佐雅维斯基执政时规定合资企业三年内免税，在 1990 年 10 月以前引入 6.7 亿美元外

资，兴办了2 800家合资企业，但平均外商投资规模过小，效益不显著。于是，瓦文萨政府规定只对投资额2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免税，此后则少有外资进入。瓦文萨政府靠工运起家，其《私有化法》中便有这样两样条体现工人利益的规定：一是企业若售出，必须为本企业工人保留20%的股权；二是企业易主后，两年内不得解雇工人。这就是说，任何人若购买波兰企业，必须面对两个谈判对手：政府和工会。这不仅意味着交易成本成倍增加，而且还只能收购原资产的80%，更何况不解雇工人就不可能改善管理和提高生产率。然而，这种从政治出发的法令，虽然给私有化带来了困难，但却恰恰在经济上粗疏地、部分地还原了国家资本在积累过程中占有的劳动者剩余价值，因而不自觉地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性。

当波兰人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时大胆开放货币市场，允许外币自由兑换时，创造了外资进入波兰的奇迹。可惜大多涌入的是金融投机，满街都是外币兑换所。为了使本国货币不垮，政府又把波兰"兹罗提"的存款利率提升至50%。其结果是企业资金成本中贷款利率陡增，产品成本上涨，不仅失去进入西欧市场的能力，而且这种饮鸩止渴式的货币政策也不可能持久，因为它将摧毁该国货币体系本身。

南斯拉夫、匈牙利与波兰有许多相似之处，官方经济与灰色经济此消彼长，国穷民富。

四、国家垄断资本与官僚政体的"利益同构"——俄罗斯并未因为宣布私有化和民主化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俄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并未从产权清晰入手，使企业从原垄断性的国家资本经营体制中解脱出来，成为适应市场的经济主体。垄断体制本来是为推行原始

积累所必需的价格剪刀差而建立的（无论这种剪刀差是明还是暗），并在长期计划调拨物资和经互会易货贸易体系中享受惯了固化于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无论是开放市场，还是开放党禁，没有必要的独立产权主体存在，就没有市场和民主的基础。

事实上，前苏联的官僚体制并未随着苏共解体而崩溃。特权阶层随着各独立国家政府机构的增加而有所扩大。依托国家垄断资本体制的政客和技术贵族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者和现政府的当权者。人们对前苏共的领导人和现当权的政客们的反感并无差别，一概称为黑帮。

前苏联50%的产品通过经互会内部计划分配。现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计划分配的流通体制坍塌，致使企业开工率下降到不足20%。此刻，企业占有国家资本的特征暴露出来。为了维持职工生活，各企业把本单位占有的原材料和制成品进行内部交换或销往国外。政府各部门和新官僚则直接侵吞国库黄金。“官倒”、黑社会狼狈为奸……在这种无序的经济环境下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起码的制度约束条件，而且会导致企业资产急速贬值。俄国人过去可以凭借人均资源占有率最高和经互会内部易货贸易额最大来维持国内公众分配到较高份额的消费品，因此，社会公众也享有原体制的既得利益。市场取向的改革在普遍化的既得利益惰性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此外，一旦这种对巨额国家资本实行集权垄断，并对资本进行计划分配的统一国家解体，国家资本和国有资源再分配问题便陡然突出，对黑海舰队这种军事资产和国外资产的权益争端即是一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民族矛盾，其背后的经济动因也在于此。也许那些曾参与过改革政策制定的研究人员更清楚局势的严峻程度。他们表示，除非俄罗斯采取非常措施在六个月内恢复经济秩序，否则，只有全国动乱。

五、“私有化”并非东方后发达国家的出路

西方舆论界对东欧国营企业民营化的诸种问题有不少分析，较为表面化的有两种：一种是分析企业本身的问题，认为企业设备陈旧，管理水平和职工素质低下，无法运转；第二种是分析市场环境问题，即认为东欧诸国不仅政治不稳定，而且还缺乏资本市场必备的资产评估。而要等东欧诸国建立起必要的制度环境和完善的资本市场，起码还需30年。无论是根据西方经济制度提出的私有化方案，还是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得出的分析判断，其针对的仍是苏东诸国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概念。而问题的结症恰恰在于，这种“完全公有制”现阶段只是名义上的或理念上的；而实际上，无论苏东诸国还是中国，公有制国营企事业单位早已在开放市场、货币交换的同时，静悄悄地转化为了“单位所有制（企业所有制）”。大多数二战之后形成的东方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工业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有相似之处。在工业化初期，国家凭借革命战争形成的权威，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获取工农业劳动者全部剩余价值，形成国家资本。而对付出剩余价值的“国家主人”——劳动者，则通过平均分配消费品或票证供应支付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此时，因为体现在最终消费上的平均化，使得“国家主人”并不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所以，全民所有制掩盖了产权主体不清的问题。但是，一旦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结束，各产业门类之间日趋频繁的交换便产生出日趋明显的不同利益，国家资本的公有制形式和内容即演变为各个国营单位依据事实上占有的不同国家资本份额享有不同的资本收益，从而造成社会收益分配差别化的部门资本。部门资本的受益主体是政府部门自身，而这些部门并不是付出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为了维护其所有权的合法性，部门资本所派生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必然一方面加强政治强权，形成官僚集权政体；另一方面则强

调公有制的合理合法性，维持僵化的意识形态。这种资本形式包含的产权关系不仅是最模糊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东方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国营企业长期不景气，财政包袱沉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甚至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这种产权关系为内容的所有制和以这种所有制为名的企业资产，在任何主义、任何制度、任何国家中尚无成功运转的先例。因此，应该从企业产权清晰人手，还原不合理的部门资本所占有的劳动者份额，再建立独立的产权主体，使之进人有制度约束的市场，这样才有可能打破国家（部门）资本的垄断，铲除官僚集权政体的根基。在这个过程中，公众新的利益分配机制产生，人们才会意识到产生于市场交换中的平等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权利。于是，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便有了社会基础。而这个过程要求相对稳定而有权威的政治控制……。如果把产权关系不清楚的国营企业统统交给一个新组建的、从未在资本形成过程中起过作用的、依靠一种并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私有化部”来售卖，那当然解决不了苏东诸国的问题。

WTO原则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一、WTO谈判的背景——农产品国际贸易与中国粮食问题

1. 高价农业必然要求贸易保护

欧美发达国家都曾经在20世纪中叶先后通过提高国内价格的政策刺激农业生产，形成了“高价农业”；接着就是为了维持既有的价格惯性而不得已实行农产品“贸易保护”。因此，过去的GATT谈判都长期把农产品作为例外。近年来，**尽管农产品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不到10%，但在农产品贸易上的争端却日趋复杂**，因此才通过乌拉圭回合把农产品谈判纳入GATT和后来的WTO总框架予以解决。发达国家这个自食其果的过程，本来就有很多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也是在乌拉圭回合的环境下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是里根政府积极倡导于1986年在乌拉圭开始的谈判，原定1990年结束。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见分歧过大，谈判经常陷入僵局。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和欧共体在减少对农产品补贴方面有分歧。发达国家只对10%农业人口进行补贴，就已经产生“高价农业——贸易保护——贸易争端”的连带影响。显然，中国要靠价格来补贴70%的农业人口，不仅是个国内是否补得起的问题，也是个是否会形成高价农业——引发贸易争端的问题。

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国部门分割体制下的粮食生产、流

---

* 本文原载于《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

通政策，就不难发现我们自己已经给自己造成了被动。在国际农产品贸易格局中，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原来属于农业保护程度很低的发展中国家。但1994～1996年接连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推动国内粮价的过快上涨，已经使我国在农业人口仍然高达70%的条件下，提前形成“高价农业”及其相关的贸易保护；这个问题显然会比农业人口低于10%的一般发达国家严重得多。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以提高价格来刺激生产，而且还意味着以价格上涨来补贴农业生产者收入。于是，**只要价格下降，农民必然随之不满，产量必然随之下跌；迫使政府只有维持“价格惯性”，使粮价不断上涨，才能保证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并且换取农民的政治支持。**

与中国农民人口众多的情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上大多开出较高条件。如小麦进口，印度的关税出价超出关税价格98%，巴基斯坦为171%。又如粗粮进口，孟加拉为200%，巴基斯坦为150%～200%。而中国由于缺乏综合部门统一协调，一方面在恢复WTO谈判和乌拉圭回合上，对农产品贸易和关税过分让步；另一方面又公开宣传政府增加对农业的直接投入和以财政支持的米袋子“首长负责制”。这几乎无异于授人以柄，对小农从事的农业在国际大农竞争压力下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无法估计。1997年发生的某大国指责我国以行政手段限制其粮食进口，而我国却无以应对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虽然我们本来可以用该国事实上已经对我国构成的粮食倾销予以反诘。

2. 国内外粮食价格走势比较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国际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在最近18年里基本上是不断下降的。**近期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的主要粮食进口市场——美国和欧盟三年前就已经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谅解备忘录”，承诺削减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美国通过新的《农业法》，规定在7年内逐步削减直至

最终停止农业补贴，该法案已于1996年4月生效；直接的影响是，其粮食产量随补贴减少而增加，国际农产品市场上随美国的供给增加，又压国际粮食价格下滑，并因此进一步拉大与中国国内粮食价格的差距。若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人在“谁来养活中国”背后所隐含的贸易战略，恐怕就不能简单化地从中国粮食生产潜力来顺着人家的话头作反应了。

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下降趋势相反，我国除了1984年、1989年和近两年情况比较特殊之外，近20年来大多数年份粮食价格是上升的；并且1979～1982年和1994～1996年曾经两次行政性大幅度提价。前者可以认为是对计划经济时期长期推行剪刀差、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的临时性补偿；而后者则是在农业比较效益低的情况下，以价格隐含的补贴来稳定农民的粮食生产。

统计资料表明，国内粮食价格自1993年下半年以后长期在“天花板价格”之上运行（其中仅1994年上半年因外汇改革本币贬值而在3～4个月的短期内略低于国际价格），个别时段的个别品种国内价格比美国高约1倍。以玉米为例，1999年3月份国内市场平均价格为1.44元/公斤；而美国芝加哥的期货市场平均价格折合人民币仅0.72元/公斤。即使考虑运费，中美粮食差价仍然悬殊。因此，会造成我国连年丰收后已经涨库的粮食如果不补贴就难以出口，如果放开市场就更没有销路。

3. 我国粮食进出口对国内农业生产的“反作用”

粮食进出口本应起到调节国内粮食供需和平抑价格的作用。但从**1984～1992年的统计数据分析看，进出口客观上加剧了国内供需的矛盾和价格波动。**

1984年是中国农村改革之后第一个粮食供给期，产量突破4 000亿公斤，就在国内粮食涨库、农民卖粮难的当年，仍维持粮食净进口688万吨，约占当年粮食商品增加量1 476万

吨的 47%。

1985～1986 年连续两年国内粮食减产，又因为经济过热粮食需求旺盛加剧供给不足；但同期粮食却净出口年均 250 万吨，约占年均粮食商品减少量 585 万吨的 43%。

1989 年年末经济开始萧条，市场全面疲软，出现了第二个粮食供给期，连续三年农民因卖粮难而导致收入下降；而同期粮食净进口年均约 700 万吨，约占年均粮食商品增加量 1 261万吨的 55%。

1992 年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农民工大批进城，粮食需求复旺；同期粮食连续三年净出口年均约 510 万吨……

4. 影响我国粮食进出口的问题分析

分析进出口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不能把总产量作为基数。数据表明，我国粮食总产量中的 70%基本上是小农自给自足的，商品量自 1984 年以来只稳定在占总量的 30%～35%之间，而国家定购的粮食占商品量的 40%～60%左右，亦即仅占生产总量的约 15%。**这反映出一个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差别：在分析进出口时，所对应的基数只是产量的约 30%～35%；而在讨论国家定购价格时，所对应的基数只是产量的约 15%**。因此，如果将以上数据按中国粮食商品率均值做加权处理，进出口对国内市场的副作用可能更为令人不快。

不过，既然讲市场化改革，中国粮食供求的稳定，就不应由进出口经营企业负责任，因为企业当然要以追求利润为第一目标。本文以 90 年代的粮食进出口对国内价格波动的作用为例予以说明：

1994 年 1 月外汇改革，本币进一步贬值约 50%，短期内一度使“天花板（即国际市场价格）”抬高；原来已经高于国际价格的中国粮食因本币贬值，进一步使追求利润的粮食企业有了囤积居奇或出口获利的机会。当时国内市价大米低于

国际价格的38.5%，小麦和玉米分别低于20.4%和14.1%。但是，我国1994年在粮食比上年减产1 138万吨的情况下，反而净出口约200万吨。由于国内供需矛盾突出，紧接着5个月之后国内价格就再度顶破“天花板”，并且开始在“天花板”之上连续暴涨两年。最高为1995年，大米和小麦均高出国际价格的50%；玉米价格甚至高出1倍以上。同期，我国自1995年1月到1996年6月虽然连续进口约3 000万吨粮食，达到历史最高纪录，但据报道，进口粮食的销地价格还略高于国内价格，因此并未能有效地平抑国内市场粮价。其间国际价格随之上涨，逐步接近中国国内价格；而一旦中国停止进口，国际价格随即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国际上对中国粮食问题的讨论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应该结合农产品国际贸易谈判对中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压力下的发展问题认真研讨。

二、WTO与中国的“三农问题”

WTO的原则，第一是消除贸易壁垒，第二是降低关税，第三是市场准入。

按照WTO的一般原则，国际农产品协议大部分在1995～2000年实施。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增加进口市场准入；削减国内生产者支持；减少出口补贴。对于中国农业能否适应WTO原则的讨论，本文认为应该从“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出发，而不仅仅是从农业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1. 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做出的让步

农产品贸易谈判，历来是关贸总协定谈判和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最困难的部分，1999年4月签字的《中美农业合作协议》，是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与美国应该达成的双边协议中的组成部分。美国农业部长格利克曼在协议签字之后称赞这份农产品贸易协议是“**美国农业的一个重要突破**”。因为中国

同意美国西北部7个州的小麦可以直接从西雅图出口，从而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价格竞争优势。过去所谓“有争议的壁垒”，主要是中国为防止这些地区的小麦黑穗病（TCK）传入而禁止直接从西海岸进口。

除此之外，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做出的让步主要体现在中美双边谈判的一揽子协议中。由于国内至今没有正式公布的资料介绍我国在双边谈判中的出价，因此，我们只能将互联网上美国单方面公布的资料作为摘要：

中国同意大幅度增加最低关税限额（TRQ 1%～3%）的农产品进口数量，并且应美国的要求减少国家大贸垄断进口所占的比例。到2006年，大豆从现在的170万吨增加到330万吨，增加幅度为94%，其中私营部门应该达到90%；小麦从200万吨增加到930万吨，为现在的4.65倍，私营部门最初应有10%；玉米配额从450万吨增加到720万吨，如果达到，则为现在进口量25万吨的28.8倍，私营部门应该达到40%；大米配额从260万吨增加到530万吨，如果达到，则为现在25万吨进口量的21.2倍，私营部门应该达到50%。到2004年，棉花要从现在的20万吨增加到89.4万吨，为现在的4.47倍，私营部门应该达到67%……

此外，中国承诺取消出口补贴，特别是取消对美国不利的玉米、棉花和大米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而且到2004年前，中国除了在总体上把农产品关税降低到17%以下，还应进一步对美国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降低14.5%的平均关税。其中，大豆仅3%；肉类和水果10%～12%；乳制品12%～19%；红酒20%。

2. 中国的让步对国内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

本文认为首先应该看到其积极作用：一是在没有其他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和平条件下，增加进口大量占用资源的基本农产品，有利于土地资源短缺的沿海发达地区进行农业结构

调整；二是在加入 WTO 之后有利于国内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增加出口。80 年代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还是以土地资源型的基本农产品为主；90 年代以来则明显改变为以水产品、蔬菜果品和部分畜牧产品为主，并且多数年份尚且能够维持30～40亿美元的小额顺差。因此，从长期看，除了粮食、棉花、油料等基本农产品外，我国的非资源型农产品还是有出口竞争力的。

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其负面影响：

首先，**中美之间的粮食贸易属于典型的不平等竞争**。因为粮食这种资源型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根本上来源于地租。土地面积越大，地租的绝对值就越多。中国农村户均土地面积仅 0.4 公顷的细小规模农业，能够在粮食生产上得到的剩余本来就微乎其微，显然不能与美国平均数百公顷的大规模农场竞争，因为他们的农业剩余在理论上讲可能比我们高数百倍。在国内粮食价格受进口压力下降影响的情况下，中西部传统农区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收入也会受到影响。这是因为农民收入是对农业剩余的分配，农业剩余分配也就是地租分配。大多数传统农区，农民从种植业中得到的收入仍然占60%以上。如果种植业受进口冲击、比较收益进一步下降，农民种地就只能继续亏损。

其次，是不利于国内稳定粮食生产的长期政策。我国粮食与人口的增长高度相关，而且粮食消费的替代弹性低。最近三年的粮食供给过剩是因为在 1994～1996 年连续两次提价幅度达 105%（与 1993 年相比）的政策刺激下，于 1996 年提前实现了 2000 年的产量目标。但人口并没有提前增长上去，若按照年增 1 800 万人的正常情况计算，等于少了 9 000 万人去消费粮食，当然会造成粮食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采取的补救措施是以计划手段稳住产量。如果进口粮食质优价廉而国家又不能通过计划价格或直接对农民的粮食生产予以补贴，则我国的粮食生产就难以稳定。

进一步看，1998年以来我国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确定的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也会受到严重制约。因为其中包括粮食的品种品质调整。为了让农民在优质优价的市场价格约束下改变过去追求低质量、高产量的生产行为，政府于1999年夏收起决定低质粮食退出国家定购。考虑我国加入WTO的让步，传统农区的种植结构调整更加困难。比如东北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区，气候和土壤条件只适合种植春小麦、玉米、大豆。但春小麦面筋度低，玉米含水高，大豆不仅蛋白质低，而且价格也比国际市场还高1倍。无论怎样调整都没有出路。

3. 对农村就业的影响

我国世纪之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低素质人口的过度膨胀和简单劳动力的严重过剩。据美国高盛亚洲研究部最近的模拟测算，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贸易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增加，对我国GDP每年的潜在贡献率为0.5%～0.6%，可以相应地提高就业。我们认为，对此应该实事求是。

国家信息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的就业弹性到“八五”期间仅为0.108，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致只能吸纳60万人就业。胡鞍钢最近的研究指出，“九五”期间就业弹性已经低于0.1，随着城市经济在国际竞争压力下不断追求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下个世纪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会更小。

更为深刻的问题是，**WTO能够促进的就业主要集中在以金融和贸易为主的服务业，对我国本世纪末过剩的2亿多低素质的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显然不可能起拉动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公布的一项调查指出，约70%的农民外出打工是被已经捉襟见肘的农业资源短缺“推”出来的；进城的农民中约有60%表示找不到工作也回不去。如果我国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上按照WTO原则做出的让步加剧了农民入不敷出的矛盾，那么被推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无业可就的问题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而且还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

因此，0.5个百分点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转变增长方式更重要。对于本世纪末剩余劳动力将超过2亿的人口大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转变旧的经济增长方式中不断刺激资本增密的机制，形成促进就业的经济增长新机制，否则既有可能在纳尔逊提出的“增长的陷阱”中无法自拔，也有可能因过分依赖大量贸易拉动经济增长而不得不受制于人。

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WTO

1. WTO原则保护发达国家的资本权利

WTO所体现的基本准则是强调“资本有建立的权力”，也就是强调资本有大于主权的优势地位。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过度膨胀、就业问题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加入以资本大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来保护资本对全世界统治利益的世贸组织；加入之后是利大还是弊大，本来就是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

我们说中国为了加入WTO谈判了十三年，农产品贸易问题还不是主要障碍。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知识产权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上的重大分歧。所谓“与贸易有关”，实即将外国直接投资拉入关贸总协定谈判范围的说辞。发达国家认为有十种投资措施“与贸易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1) 当地成分要求。要求外国投资企业的最终产品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零部件从当地购买或由当地生产；(2) 出口实扩要求。要求外国投资企业必须将其生产的一定比例的产品出口到外国市场。

尽管发达国家（除澳大利亚外）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上一致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当地成分要求和出口实扩要求。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之间却有着“当地成分要求”。更为甚

者，1988年美国贸易法案对1974年贸易法案的第301条进行了修正，使美国不断发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谓的“不正常贸易”调查。关贸总协定顾问Jagdish Bhagwati认为，这是“非关税之法”的行动。

我们不应该忘记近代史上美国农产品依托“美麦贷款”和“美棉贷款”大举进军中国、把我国的小农经济打得一败涂地的教训。有西方学者指出，让中国按照美国的条件加入WTO，好比是让尚未长大的稚童按照美国定下的拳台裁决规则，与美国的泰森一类的拳王较量。考虑到这是以农业让步为交换条件，为了在其他领域得利，在国家财政依存的国有经济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开放上增加谈判地位，那么，我们不妨借用这个比喻再引申一下：即使不是让尚未长大的稚童，而是让中国的武术冠军——国有企业上去打，倘若必须按照美国制定的规则比赛，也难有胜算。

2. 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不是平等的

本文根据近来国内公开的和互联网上发表的资料分析，认为不仅WTO原则之下的农产品贸易对国内的影响应该重视，而且谈判完成以后如何执行WTO原则更值得关注。

因为“克林顿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在这个贸易组织中的成员资格不是关系到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一体化问题。它将使中国进入一个法律框架，迫使它根据西方式的贸易法律行事。它将使市场极大地开放，从而及早地使得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到外国思想的影响”。（《纽约时报》1999年10月4日）1999年4月10日，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已经做出了重大让步，而美国不仅始终没有在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上正式签字，反而更变本加厉地“坚持这样的要求：即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也应该让美国有权对中国实行单方面贸易制裁”。（《参考消息》，1999年4月13日）指望美国按照WTO原则平等地对待中国，可能是中国人不了解

美国的"国情"。

首先，由于美国的法律体系的独特性，即使加入 WTO 后，中国极有可能仍然不能取得盼望已久的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一个极为重视自身主权的国家，其国际条约不自动具有国内法律效用（non self-execution）。1994 年 6 月 14 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WTO 与美国主权"的听证会，请于 1990 年提出建立 WTO 构想的密执根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逊（John H. Jackson）作证。美国国会于同年通过了"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Uruguay Round Agreement Act），该法案第 102 条（section 102）明确规定，当 WTO 协议与美国国内法发生冲突时，"以国内法 4"为准。

按照 WTO 章程，中国加入 WTO 后，美国理应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但这却和美国一项国内法相冲突。该法即是沿用至今的"1974 年贸易法"中的"Jackson-Vanik"修正案（section 402）。根据该修正案，美国总统必须不给予共产党国家（或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除非该共产党国家允许自由移民；或者如果总统认为仍有必要给予该共产党国家最惠国待遇，则必须每年申请国会的特殊批准。这是针对当时苏联限制犹太人移民而制订的，但时过境迁后，竟依然适用，成为一年一度的美国国会审查中国最惠国待遇资格的法律依据。

显然，在"以国内法为准"的美国，中国在加入 WTO 后仍不能获得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除非美国国会修改"1974 年贸易法"中的"Jackson-Vanik"修正案，但这在目前的气氛下是很难做到的。事实上，许多美国法律专家早已预测，一旦中国加入 WTO，美国为了保持"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和"Jackson-Vanik"修正案之间的一致性，不得不援引 WTO 中的"互不适用"条款 5，不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

在朱熔基总理访美期间，美国贸易代表署于 1999 年 4 月 8 日单方面公布的美国"要价"《市场开放和规则承诺》中，

特别强调中国加入 WTO 后，美国仍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就是为继续不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埋下伏笔 。有鉴于此，中方当引以为训，至少要以我国已经做出的让步为谈判条件，在金融、保险等问题产业，以及其他仍然至今维持部门垄断、本来应先向国人开放的领域中尽可能少地让步。否则，即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难以避免被人家“单赢”。

经济周期与形势分析

1. 中国经济略有复苏迹象，启动经济还需深化改革
2. 宏观经济波动之下的改革与发展
3. 1994：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问题分析
4. 建国以来的经济周期及其相关调控政策分析
   ——兼论1995年的经济趋势问题
5. 危机论
   ——结构性危机向周期性波动的转化

中国经济略有复苏迹象，启动经济还需深化改革*

中国经济在 1994～1996 年加大宏观紧缩力度，终于实现了"软着陆"之后，从 1997 年 10 月开始发生物价水平下降，至今已经出现长约两年的"通货紧缩"。

经济理论界早在 1995 年治理整顿正在进行之中即提出关于扩大内需、促进就业的政策建议。后来，政府从 1998 年第一季度也开始重视内需不足的问题，使用了包括连续调低利率的信贷政策和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财政政策；近来又采取八项措施给证券公司增加头寸以刺激股市。通过这种"左右开弓"和给资本市场打强心针的办法，确实一度使中国经济表现出复苏的迹象：1998 年第四季度 GDP 增长率达到 9.1%，1999 年第一季度达到 8.3%。尽管接着在二季度下降到约为 7%，但上半年仍被认为高于 1999 年预计的

* 本文是 1999 年 7 月写的关于 1999 年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文章虽然短，但发表后引起比较广泛的反映，多种经济报刊予以编发。由于意见比较尖锐，文章用笔名"文恬"发表。现在重新整理，可以立此存照，使读者了解当时经济理论界在宏观政策研究上的各种不同意见。好在其中大多数政策建议在 21 世纪初已经逐渐或开始进入决策领域。

7%的增长率，因此经济处于复苏阶段。

面对这种略有复苏但随即又连续下降的局面，京地学界近期多有研讨。大致归纳，意见如下：

一是认为**投资方向有问题**。去年以来的“左右开弓”仍然主要投向国有部门，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长率为负值，要改变“半死不活的有草吃，活蹦乱跳的没草吃”的非理性投资方向，**就要增加民间金融工具，开放区域资本市场**。

二是认为从现象上看，问题是内需不足；但如果从本质上分析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主要矛盾仍然是企业的有效“供给不足”。因此，**应该在加强国有大企业改革的同时，出台搞活有增长潜力的中小企业的政策**。

三是强调打破垄断，指出物价大幅度下降主要发生在一般商品上，这本身就是非垄断产业市场竞争的结果。而在那些垄断产业如教育、医疗、邮电、交通、铁路、航空等部门，物价大多数是上升的，即或有下降，幅度也很小。这些垄断部门“宰你没商量”，所提供的“服务”又是老百姓必须消费的，这就迫使居民增加存款，以应付这些必须开支的高价“服务”。因此，只有加快市场化改革，**尽可能打破部门垄断，居民才能增加一般商品的消费开支**。

四是认为当前社会收入两极分化严重，**8%的人占有65%的金融资产**，而当前刺激消费的政策专对富人提供优惠，无论住房还是汽车贷款，都不能对92%的穷人有好处。因此，**应该强调就业，增加工资，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才能增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五是对农民收入连续两年增长率下降进行分析，指出**占人口70%的农民长期处于半自给自足状态，只有30%的城市人口是完全在市场中进行消费**的，就必然造成“大中国，小市场”。为此，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以优惠政策鼓励农民进入城镇，扩大需求规模。

六是指出中国1985年提出“梯度发展战略”以来，随着

东部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东西差距越来越大。70%的资本集中在东部，而70%的资源集中在西部。因此，**应该通过加快西部开发，调整区域差别来启动国民经济**。

凡此种种，无一不需要深化改革。看来，无论是行政性的追加投资，还是人为的刺激股市，也许可以在短时间内收到增长之效，但却不可能使中国经济有长期而稳定的发展。

有鉴于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任重**而**道远**，改革的攻坚战也刚刚开始，上述六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若有所突破，都会对经济复苏起正面作用。从这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看，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被逼出来的。因此可以认为，近年来越是困难，就越是有进一步改革的可能。

宏观经济波动之下的改革与发展*

一、近年来宏观经济波动和农业问题的关系

1. 相关现象分析

从现象上看，1993～1995 年这三年的情况明显反映出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农业与农村问题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性。

举粮食问题为例，1993 年下半年秋收以后，粮食价格本来应该稳中有降，但是实际上不仅不降，反而一路上升顶破所谓“天花板价格”。这就是说国内粮价高于国际市场粮价。当时有的品种超过了国际市场价格的 20%；后来超过 50%。甚至有个别时间超过国际市场粮价的 70%。一时之间国内的粮食供需突然出现紊乱，表现出需求过度强烈而供给严重不足的典型周期性症状。1995 年中国前所未有的高达 2 000 万吨的粮食进口（净进口约 1 700 万吨），引起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扬；甚至引发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大讨论。从 1993 年年末一直到现在，粮食总是一个被人们不断议论而又似是而非的话题。

现象形态的粮食供需矛盾问题和国民经济宏观部门的政策变化，乃至和宏观经济波动周期都有直接因果关系。应该认识到，它实际上是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过程中的符合规律的现象。

---

* 本文原来是一次对地方试验区干部培训时的讲课稿，回来后根据录音整理时，街道打字社的职工们觉得他们都愿意看，于是便把部分讲稿整理出来形成文字发表在《中国软科学》1996 年第 9 期上。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1）农村外出劳动力增加对粮食需求的影响

一般认为，经济波动是周期性的，并且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经济危机的爆发、萧条、复苏、高涨阶段。从 1992 年下半年起，中国在小平南巡讲话的促进下突然转入经济的高涨期（此前则明显是危机和萧条期）。从经济高涨开始，出现了民工潮涌动。到 1993 年，有关部门统计农村外出劳动力总数在 6 000 万人左右；比较极端的说法是在 8 000 万左右。这至少造成了一个突然增长的市场化的粮食规模需求。因为这 6 000万或8 000万劳动力在农村的时候，是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他们的粮食消费是完全非商品化的。他们一旦流出农村，哪怕只是流出了本村，进了县镇，就变成了完全商品化的粮食消费人口，而且是高消费人口。城市人月平均消费粮食大约 10 公斤左右，而农民特别是进城农民要以吃粮食为主。一个月消费如果是 30 公斤以上，那么一年就是 400 公斤以上；再乘以 8 000 万人，就会造成一年新增商品粮国内消费需求至少在 300 亿公斤到 400 亿公斤以上。

与之相应的是到 1994 年，中央下达的粮食部门合同定购加议购总量，从原来的 500 亿公斤到 600 亿公斤，陡然增加到 900 亿公斤。这至少是造成供需紊乱的一个因素。

（2）汇率变动对粮食需求的影响

第二个因素是国家外贸外汇体制改革中，由于汇率变动幅度较大，对粮食供需平衡造成突然刺激。

1993 年下半年秋收时节，关于 1994 年是改革攻坚年、宏观环境的市场化改革要全面突破已成定局。其中 1994 年 1 月外汇一步并轨，人民币将贬值 50% 以上的消息也早在 1993 年下半年就开始传出来了。

大家知道，本来 1993 年还有相当多的东部地区从国外进口粮食。如果人民币贬值 50%，就意味着吃进口粮就要赔 50%；吃国内的粮就赚 50%。这是一个极大的进出口价格刺激。先得到这个消息并且商品意识较强的南方人，特别是广

东人，突然开始向国内抢购。先是从广东抢购江西、湖南大米开始，一拨一拨往北方抢过来。当时如果能抓到粮源，就意味着1994年外汇一步并轨后的价格稳增50%。再加上中央政府在汇率改革的同时，取消外汇留成比例，所有外汇全部由国家银行收购。那就意味着各省即便是想从外国进口也有困难了。这就造成东部和南部粮商大举进军中西部，甚至造成国内粮食紧张的同时外贸反而在对外出口的局面。

(3) 财政、流通、金融等涉农部门的影响

第二个因素就是财政、流通、金融等涉农部门的政策变化问题。

当1989年和1990年我国经济处于危机低谷时，财政强烈要求甩粮食补贴包袱，客观上促进了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当时计算，国家财政减少补贴这一项就可以节省开支460亿元。对财政来说显然是件好事，但对粮食来说却是件坏事。因为1989年全国粮食在金融部门挂账已经达到几百个亿；财政甩包袱后一度达到约1 200亿。对此财政只承认一半，认为粮食部门把经营亏损打入政策亏损。同期金融部门改革逐步按商业银行运作，对粮食挂账执行加息、停贷政策。

在财政取消对粮食流通部门补贴的同时，粮食各环节亏损加重挂账增加。于是，1990年以后粮食部门在补贴减少的情况下，出现了连续三年的粮食拒收、欠收、压级、压价局面。从过去占有商品粮食总量的60%降至30%以下。粮食的收购量也逐渐下降，一直降到1992～1993年度的500亿公斤左右。

财政、流通、金融等部门之间的扯皮，造成粮食部门一方而拒收、欠收、压价；另一方而粮食库存却大幅度下降。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当时全国粮食库存下降多少。从点上调查的情况看，粮食的亏库率大约是30%左右，腾出库容主要用于储存高值商品，以弥补亏损。

如果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去当粮食企业的负责人。假如

知道中央已经决定外汇一步到位，从过去的双轨制变成单轨制；本币若要贬值50%，谁拿到粮源谁就坐地生财，可得50%的利润，那不抢购就是不正常行为。更何况还亏库30%，城市商品粮的需求又在明显增加。所以我们发现，1993年至1994年粮食市场上兴风作浪的主要是国营机构大户，实际是在屯积居奇。

(4) 粮食生产并没有出问题

由于以上三个因素，尽管1993年是改革开放以来15年历史上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总产达4 600亿公斤，但是丰收之年粮食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失衡，确是农口人士解释不清的非常奇怪的现象。到1994年算账，粮食涨价在整个物价上涨中贡献份额达到64%。有人说是农业生产出问题了。可是1994年粮食生产形势依然很好，总产量仅比上年下降100亿公斤左右；仍然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我们从统计上看，90年代粮食生产总量都大于需求总量。问题显然并不在生产上，而是在供给上。

所以，要认真研究宏观经济波动之下的农业问题。现在假如不谈财政、流通、金融、外贸、外汇、税收、工商等部门行为；假如不谈城乡对立体制下的居于垄断地位的农业投入品的生产和农业产出品的加工，那就农业本身进行讨论是没有出路的，也是谈不清楚的。

2. 从现象形态深入分析本质问题

我国农业所面临的最基本矛盾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基本国情矛盾，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第二个是基本体制的矛盾，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矛盾。

(1) 基本国情矛盾决定的非市场制度选择

资源奇缺，人口过剩，一般说我们是以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着22%的人口。这个基本国情矛盾是只可能缓解而不可能根本解决的。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高度紧张，其实不仅是我国

的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而且几乎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但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农业来说，它尤其尖锐，尤其严重。这个矛盾带来一系列问题：

首先，它决定中国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在大多数传统农区不能按照价值规律来配置；体现不出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最基本的规律。而是要求按照非市场化的公平原则来按人口分配土地。这就是大包干开始时，无论领导愿意不愿意，70%以上的农村都不是按劳动力的能力来配置土地的，而且至今多数地方每次调整土地，还是不得不按人均分配。

这甚至也说明中国为什么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或中兴明君都必须“均田免赋”。而每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都打出“均平”的旗号来动员民众，就是因为随人口不断增长而土地高度稀缺。

因此在农村，土地并非单纯表现为生产资料，不能要求它按价值规律实现优化配置，反而必须按人平分。因为那是农民的命。剥夺了农民土地，等于剥夺了他的生存权利，剥夺了他的福利，剥夺了他的社会保障。

其次，农业难与市场经济对接。据全国 3 万户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中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供给在体制上是错位的。我们有 50% 的农民的土地产出没有商品率；换句话说，有 50%的农民不是为卖而生产，而只是为自己活命而生产。还有 35%的农民，其土地产出的商品率低到仅够维持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也并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维持下一年的生产而把一点余粮拿出去换成货币买回生产资料。这说明 85%的中国小农并非商品农户，亦即小农自给自足，没有扩大再生产能力的历史问题至今并未根本改观。

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供需矛盾是：分散的 2.4 亿个小农户，在为庞大而集中的城市消费市场提供粮食供应。就是说，消费是成规模的，而供给不仅是不规模的，而且还是高度分散化的。供需之间在体制上是根本就不能对接在一起的。

由此导致50年代以来到现在，我国在农业主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需求上，始终没有搞清楚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分散供给和城市大规模需求之间的体制对接。

有鉴于此，分析《陈云文选》中的经济思想很重要。

早在50年代，陈云就讲得很清楚：政府无法面对当时1亿个小农户进行粮食交易，所以要搞“统购统销”。陈云这个解释是很超前、很现代的，因为西方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很晚才在中国被借鉴的。现在政府派到农村基层的干部，被农民说成是“要钱、要粮、要命”，所体现的矛盾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干群之间的矛盾或工作问题，而仍然是第一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之下所产生的体制错位所造成的政府与分散小农之间交易费用过大的本质问题。

（2）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制约了国情矛盾的缓解

第二个矛盾是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体制矛盾。我国城市和农村分别是两个社会，两种体制。城市的高度现代化和农村的落后之间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在政策研究上，如果不讲城乡关系，不讲工农关系，那就绕过了主要矛盾。因为谁都知道，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不推进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中国是进入不了现代化的。

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至今并没有被认真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因此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50年代解放之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5%，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现在工业产值占到80%以上，城市人口仅占26%。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50多个百分点。

正是由于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的体制矛盾制约，使得农业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根本无法解决。农民进不了城，乡镇企业进不了城；搞小城镇建设也仍然解决不了农民进城的问题。土地所承载的农业人口压力过大；农业规模经营也实现不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积累率低和商品率低等一系列的“低”都无法解决，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国情矛盾，

造成了土地无限地按人口的增加再细分，叫做“土地分割日益细碎”。在农村基层土地就得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

进一步分析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还应看到这种体制正在造成农村日益稀缺的要素：土地和资金大量流入城市。例如，1994 年农业银行全系统存款总额 6 000 亿元，农业得到贷款占总额的 6%。也就是说，94%的农村资金流入城市。1994～1995 年中央连续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增加农业投入，其结果到位率几乎为零。1995 年农业银行系统存款总额超过了 10 000 亿元，农业贷款也只不过是 10%。土地要素流出农业更严重，国务院发布《土地法执行条例》以来，全国每年流出农业的土地反而从 200 万亩增加到 300 多万亩。农村不断增长的过剩人口压力都压在了更有限的土地上。

此外，农业投入品和产出品两头垄断也日益强化，因为城市倾向的政策左右了决策。发展经济学早就指出：分散弱小的农村资本必然被集中庞大的城市资本所剥夺。对于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体制来讲，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

二、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周期

1. 理论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讨论

我们过去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也不存在供需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危机周期只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现在人们已经公开讨论经济危机的问题了，但对危机的成因和周期的性状分析仍然有很多不同意见。

理论上开始讲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是在 1979 年。当时有一个“四签名”发表的文章，题目叫做“社会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那是第一篇论述社会主义经济也存在危机的文章。签名者为王岐山、朱家明、黄江南、翁永曦。从那篇文

章后，国内理论界对此逐步开始讨论。90年代后有关经济周期波动或经济波动周期的文章已如汗牛充栋，屡见不鲜了。

所以，谈宏观经济波动本身，至少在理论上已经不是敏感问题，问题在于如何认识我们自己的宏观经济波动过程。

2.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通货膨胀

建国之初，我国是纯粹的农民国家，或叫农业中国。从一开始建国，我国实际上就存在着产生宏观经济波动的基础性因素。因为蒋介石在逃离中国大陆的时候把当时国库的300万两黄金全部卷逃到台湾，成为台湾的货币经济的基础。而大陆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货币发行无基础的经济。

一般货币发行可有两种基础：一是金本位，有多少黄金储备决定发行多少货币。所以，早期1美元要对应一定的黄金储备量；每1英磅也有相应的含金量。老百姓以为金本位制是把钞票里掺进多少金丝，其实就是以多少黄金储备来决定发行多少货币。二是商品本位制，就是以生产多少商品来决定发行多少货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求商品本位的货币发行是：每生产12元商品，发行1元货币，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比例关系。并且认为，假如每生产8元商品，发行1元货币，就有可能出现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假如是4元商品发行1元货币，就意味货币要大幅度贬值。

我国建国之初发行货币的时候，国库黄金被卷到台湾，既无商品本位也无黄金本位，惟有靠国家建立的政治权力。老同志都记得解放之初政府干部是发小米的，因为那时货币毛，只能发实物。

建国之初的工业实际只占整个工农业总产值的5%；工业人口也只占总人口的5%；加上其他市民，城市人口大概占总人口的15%。政权性质叫做“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性质和苏联不一样，因为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政权是工人和士兵夺下来的，建立了在城市武装暴动基

础上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不包括农民。当时维持苏维埃政权的粮食供给靠武装征粮工作队，拿着枪到乡下收缴粮食。后来正是在那样一个政权结构之下对农村中的地主、富农进行肉体消灭，再以高度集体化为基础实现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此剥夺农民，剥夺农村，完成城市的工业积累。

中国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之为"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新中国政权建树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主要是两千万农民抛头颅、洒热血夺取的新中国政权。而且是这个政权承诺了向农民分配土地，才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式整军运动"，最要害的一条就是告诉农民：投奔共产党的军队，家里就给分地；在国民党军队，家里就不分地给他。因此我们把打败800万国民党军队的这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

所以，新中国名义上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但工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严格从经济意义上说，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至50年代初，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思路都一致：中国要走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旧社会垄断资本家、洋奴买办、地主阶级三座大山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之路，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或西方式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之路。中国国旗上围绕共产党的四颗星，不仅有工人阶级一颗星，还有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一颗星；更有农民一颗星。这是形象化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所以才在全国范围内分配土地，所以才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如果按正常的发展途径走下去，中国会逐步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发展"。老一代革命领袖都有足够的智力，他们比我们这一代高明得多，不会随意改变发展方向。

3. 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现在年轻一代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的新一轮世界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造成我国"外部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劣"。

并非解放后才有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问题。早在解放战争进行之中，苏联就提出了与美国划长江而治，控制中国北半部的要求。中国的答复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后，我国不只一次地拒绝了苏联的不合理要求。1949～1950年初，毛主席到苏联去谈判，希望在维护主权的前提下能得到苏联的援助，帮我国建设工业基地。苏联让步的同时就发生了朝鲜战争，中国不得不直接对抗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因为打了这场代理战争，从此不可能再进入西方市场，只能纳入苏联阵营。按照条约，在和平条件下，三年后苏联再撤军。现在去旅顺口参观的人都还能了解到，苏联军队在解放后还长期控制着我国的海军基地，到1956年才撤走。

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市场和资源占有的大格局已经瓜分完了，不管我们主观上愿不愿意伸出手去掠夺，都不会再出现中国历史上那种"万邦来朝"的汉唐盛世；周边的臣服国家一个都没了。客观上我们伸不出手。

中国"一五"时期，苏联投资126个项目，但并不要这些项目建成投产以后生产的产品，而是要以原料和农产品偿还。所以，当时惟一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启动资本，就是这相当于50多亿美元的投资。虽然中国工业化初期表面上还有惟一的一个外来资本，但实际上仍要更多靠从农业和农村提取积累来偿还。

没有外部资源可以拿，国家要进行工业化建设，必须的、惟一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就是眼光向内，自我积累，也就是"自我剥夺"。

现在有些青年很幼稚，说我们当时为什么不跟英、美结盟，跟西方学。因为当时刚建国就面临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随后的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直接对立。更何况50年代

初的朝鲜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抗美援朝，西方则是联合国部队，不仅是美国兵，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 16 国的部队。就像现在西方派兵进入波黑，干涉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冲突一样，是类似的。

新中国刚成立就被迫参与军事对抗西方国家，所以，我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一开始就是险恶的。北方，苏联要求军事控制；东部，朝鲜战争。跟西方世界是对立的，没有任何外部资源可以拿来用于国内资本原始积累。而在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必须防备发生战争，战争要求打钢铁战，打重工业战。可是建国之初按已经定下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短时期没有成规模的钢铁和重工业。所以，我国 50 年代抗美援朝的时候，动员老百姓捐坦克、捐大炮，那时候连小学生都省下早餐来捐炮弹。捐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还得搞重工业。没有外部资源，必然导致国内发展战略转变，进行内向型的国家工业资本的积累。

4. 国家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小农经济的矛盾

任何经济现代化发展类型都无法跨跃原始积累这个阶段。没有工业化启动资本的积累，就没有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起飞。

我们资本原始积累从哪来？既然只能是内向型自我剥夺，那就只好对不起自己，包括对不起农民。

而那时的情况又和我们今天又有某种相似之处。看 50 年代初的统计数字，有一个很相似的现象：开始进行“一五”建设时期，也是农村的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一五”时期涌进城市将近两千万人口。而建国之初给农民分地，造成了一亿多个小农户，小农经济的粮食生产并无问题，但一亿小农的粮食供给是小额的、间断的、高度分散的，与城市大量的、连续的、成规模的需求不能对接。这种体制矛盾至今未能解决，直到现在城市任何规模需求的增长，靠小农经济都不能保证供应。

当时，为了满足国家工业化和城市日益增长的需求，1953年陈云提出要搞统购统销。两个目的：一是要保证城市的规模需求；二是要保证工农两大部类的交换。刚起步的国营工业是弱小的，生产是“少、慢、差、费”，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如果不能统销就没有市场。例如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的履带式拖拉机，是适应苏联机械化大型集体农庄的产品，并不是适合于我国自己小农经济的产品，如果不统销，生产出来就是废铁。所以，工业品生产出来必须统销到农村市场。当然，如果不统购，纺织厂、面粉厂的原料，也不可能一家一户地向一亿个小农户收购。总之，两大部类交换直接受制于城乡两种体制；或者说国家工业化一开始就与小农经济相矛盾。

但是统购统销第一年还可以，接着就出问题了。执行了三年，政府占有粮食市场份额反而下降了80%。为什么？就是因为政府面对一亿个小农户，无法交易，而农户的供给俗话叫“少吃一口多卖一斗”。有钱可赚，有利可图，农民看卖得合适的时候，就少吃一口，一亿个小农户四亿农村人口，每顿饭少吃一口，一年就多卖几百亿公斤粮食。要是觉得不合理，农民就不卖。变成多吃一口就少卖一斗，一年就少卖几百亿公斤，就是这个道理。

此外，由于我们国家的小农经济是“粮猪型经济”，农民少卖的那口可以喂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养猪可以自食，也可以卖肉；只要是小农户分散的不规模养殖、养鸡或其它畜禽，也都是这个粮食间接转化货币的道理。小农经济的兼业化也使农业并不完全商品化，所以与政府需求无法对接。对于统购统销头三年不成功的教训，《陈云文选》有所论述。

5. 农业集体化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作用

由于1953～1955年粮食部门收购量大幅度下降，1955年随即出现合作化高潮。因为不把小农组织起来，政府没法谈

判，交易费用过高。《陈云文选》写道：与其去面对一亿个小农户，不如面对由四百万个村组织成的四百万个合作社。按照现在的理论，政府的交易费用降低了，就因为交易对手从一亿个降低为四百万个。于是，国家就开展合作化运动。

合作化之初的统计数据显示，农业生产无论是产量还是产值，仍然是稳步增长的。因为初级社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的股份合作制一样，是承认农民产权的。土地、大型农具、入社股金可以作股，可以按股分红。初级社时期是按土地分红、按股金分红和按劳动分配这三种结合的财产占有和收益分配制度。在承认农民产权又尽管没有完全兑现的情况下，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还可以维持，还没有受组织形式变化的影响。

同期，工业统计数据反映出扩大再生产投资所代表的工业资本积累率的增长，城乡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所代表的工农业产销率均超过以往最高水平。

6. 高度集体化和第一次经济危机

经济第一次危机周期是 1958～1964 年。开始出问题是 1957～1958 年以后，起因于客观上合作社的经济规模太小，在人地关系紧张的国情矛盾制约下，农民的合乎于经济理性的选择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初级社用不上拖拉机，不足以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于是，只好人为扩大规模，强制推进高度集体化，实行超越传统、打破氏族村社制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对农民以生命鲜血为代价分到手才 7 年的土地权利不承认，取消土地分红；剥夺农民的财产，拉牛入社。开始还说高级社要逐年偿还，后来还不还。紧接着就因小农消极反抗造成了大规模的"三年自然灾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生产力的水平是由生产工具的水平来决定的。而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用生产工具来决定，只能是农民的锄头和镰刀。那么，农业生产

力在这个水平之上实行简单的一锄一镰式的合并，当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实质性改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高级社、人民公社都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是适合生产力的变化而改变的。于是，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反过来又作用于生产力，它影响生产力的作用恰恰是反作用。就是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时候，第一生产力要素就是劳动者。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劳动的投人就决定着这个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于是，当剥夺了农民作为生产者的财产，也就是造成生产者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时候，那么，劳动积极性下降就是必然；这种必然的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就直接意味着生产的产量和品质的下降。对此，我在 1995 年农业部软科学重点课题的报告下卷中，有专门的调查分析。

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从 1958 年开始，农业的产量和产值大幅度下降。我对此曾制过图表分析过，50 年代末的农业产值、社会商品销售额、财政收入等几乎所有的增长曲线都是这样直着下来，跌落到 1952 年的水平。因为当时我国农业产值约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 80%，而其中粮食产值又占整个农业总产值的 70%以上。这就意味着粮食产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 60%左右。假如粮食的大幅度下降，就意味着总产值的大幅度下降，那么，财政收人大幅度下降，也就意味着财政用于积累的投资和新增扩大再生产能力的下降。

实际上，1958 年人民公社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意义上制约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下降。因此才有 60 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近年来有很多文章描述分析过这个过程，其成因也已经是理论界所公认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个教训本身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个验证。

7. 缓解第一次危机的农村政策

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业惟一的投入来源于财政。财政收支1958～1960年连续三年赤字，出现了200亿元的亏空。对应当时财政总额570多个亿而言，200亿元的亏空意味着有30%左右的开支财政无力支付，只能压缩生产性开支。因为在改革之前，财政开支大体上就是三个三分之一：即行政事业性开支、补贴和新增扩大再生产投资各占三分之一。亏了一个三分之一怎么办？补贴压不下；行政事业压不下；只能压扩大再生产。在财政统收统支的体制下，财政收入的下降就意味着投资能力、新增生产力的下降和城市就业的下降；于是就有城市的过剩人口不得不下放到农村；就有60年代知识青年下乡；就有城市两千万人口下乡（几乎退回了"一五"时期的进城人口）。其意义是把过剩消费人口化解在一亿多个农户的汪洋大海之中，变成农村分散的自给自足人口，就不再构成城市的规模需求。

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都有印象，高度集体化对生产力的破坏所带来的恶果是非常鲜明地深刻印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之中。对60年代初国民经济恢复起作用的政策是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小农村社经济恢复的，也就是1960年初提出的"三自一包"，实际上是让小农有一小块维持自己活命的自留地。同时可以在屋前屋后、田边地头开点小荒，基本上让小农饿不着。那也就是马克思讲的必要劳动和相应的必要的那点生产资料政府还给了农民。这个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使饥饿之中的农民焕发出了极大的劳动热情。

后来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访问，经常问这个地方是不是农民还往自留地里上粪，是不是往自留地里投入的积极性最高。农民对自留地里投入积极性高，是因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

而当时政府采取让步政策，是要保证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必须拿到一块，为此，把必要生活资料和保证必要劳动

投入的那块生产资料还给了农民。现在，有的经济学者的理论称之为允许农民对集体有部分的"退出权"。粗算账，农民退出了20%。同时政策还允许农民养鸡、喂兔子、放羊、喂猪，并且放开一部分自由市场、集贸市场，允许农民拿点农业剩余维持生活。这是小农经济的部分恢复。

而村社经济的部分恢复，就是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的贯彻。原来是人民公社一级核算，不承认村社基层的产权。而队为基础则类似初级社，是以原来自然村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部分恢复了小农村社经济。

就是这个"三自一包"政策推行，使得农业经济有所恢复，逐步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于是，经过1960～1961年的萧条和1962～1963年的复苏，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由新的投资推动的高涨阶段。

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人对此也有认识。1995年2月2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农业工作会议的讲话指出，如果农业和农村经济不恢复，农民收入不增加，其他的国民经济部门特别是消费品工业部门就要受到制约性的影响。这个60年代的教训至今仍有意义。毛泽东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果建国之初那次较短的通货膨胀周期性不明显，因而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那么，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周期性宏观经济波动则发生在1958～1964年之间，而原因就在于生产关系调整对农业生产力第一要素的不适当的压抑，从而导致了使国民经济总体受到影响。

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周期理论，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经济刚起步时就有一次明显体现。1988年7月号的《新华文摘》全文刊载了我的一篇《危机论》，就是讲建国以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过程。1993年12月《新华文摘》又有一篇我写的《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进一步对建国以来出现的周期性波动作过比较准确的理论表述。

8. 文化大革命与第二次周期性经济危机

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的运行基本上已经趋于稳步发展。但是，由于在确定“三自一包”和对农业经济恢复的政策中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及其他因素作用，最终演变成为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对经济的特殊作用过于强大，以至于我们不能完全做纯经济分析。但我们至少都看到，农村经济政策中又有一些不适当的“左”的东西，最要害的是“砍资本主义尾巴”和“穷过渡”。就是不承认小农应该得到的维持必要劳动的那一点生产资料，把原来初步恢复的小农村社经济不适当地拔高为大队核算、公社核算；再加上“一平二调”，关闭自由市场。这就重新打破了小农村社传统，取消了农民得到的部分退出权。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又开始下降了，国民经济又得调整；农村问题又开始严重，农产品供需矛盾又开始尖锐；财政赤字又再次连续发生。1974年我国财政赤字突破百亿元大关。

面对这样一个危机局面，毛泽东有个说法，就是把小平同志请回来，说他是经济能人。小平还是“三项指示为纲”整顿经济，影响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然后“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把他打倒了。

这种政治变化解决不了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规律还是要起作用。结果到1978～1979年，财政赤字连续接近二百个亿。而当时财政收支总额才不过一千个亿，这就意味着连续两年有20%的财政是赤字。扩大再生产能力下降，失业问题突出；又不能像毛泽东那样，再动员城里人下乡；城市问题也突出起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改革。

不过，由于政治上的矛盾拖延了经济问题解决的时间，当连续两年财政出现严重赤字的时候，剩下惟一可用的调整手段就是“关、停、并、转”这四个字。压缩基建投资，导

致数以百万计的基本战线的工人停工、待业，城市缺乏新增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四千万城市待业青年无业可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经济犯罪、社会犯罪，就发动“严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和现在严打的情况相类似。社会性犯罪的根源是经济问题，是无业可就。

我们认为，第二次经济危机的起点本来应从1974年算起。但由于政治因素影响，到1978～1979年才显化。然后是1980～1981年的萧条；1982～1983年的复苏；1984～1986的的高涨。

9. 与60年代让步政策相似的农村改革

同样是像在60年代初危机爆发的压力下，再次产生了新的历史性让步政策一样，允许农村率先突破。当时有同志下去调查回来报告说：“假如再这样下去，农民起来打扁担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当时中央负责同志看了报告，认为写得非常深刻。正是因为中央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对这种报忧的报告没有“报忧得忧”，才有后来农村政策的调整。

不过，如果看1978年前后有关会议文件中的政策变化会发现，当时的改革并没有打算从农村开始。当时强调的是加强城市经济，提出的政策是要加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管理；要向管理要效益。到现在有些部门在讲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仍说没有必要动产权，只要加强管理就能出效益。这个政策中央早在1978年就定过，不仅当时不解决问题，现在也难见效。国有企业并不是没有响应，而是如果不以产权清晰为前提，就没法加强管理。

改革之初的1978年前后，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西线无战事”。相反，农村改革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时只是讲要落实党在农村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并没有讲要落实什么政策，而是农民自发地搞农村改革。那个时候的文件是不明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提出要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使到

了 1982 年以后，中央连续发出的四个 1 号文件，也是充满了让步性的语言：允许、允许、又允许；可以、可以、又可以。文件中并没有说要农民怎么样分地。

10. 农村改革的真实制度经验到底是什么？

据当时地方领导干部介绍，连安徽小岗村 28 户农民按手印给队干部签“生死状”的故事都是两个新华社记者编造的；他们的历史功勋在于用这样一个故事打动了当时的决策层。而农村基层的事实往往并没有那么戏剧化，其实就是多数生产队早在 60 年代就已开始推行小段包工，然后发展到推行大包干。大包干在分配上原来是“秋后算账”。例如，社员包了 10 亩地，秋后打 500 公斤粮食。队里据此决定 250 公斤交给国家，100 公斤交给集体，剩下的 150 公斤就是农民自己的。安徽农民开始提出的改革只是要求把“秋后算账”改为“春前算账”，就是春种前定好分成比例，到秋后打下多少不再变。按原定比例“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继承原来“三自一包”的制度经验，再把分配制度改成“春前算账”，农民到秋后就能把粮食从 500 公斤增产为 1 000 公斤。安徽当年的情况是哪里这样做，哪里就大丰收，甚至大灾之年也丰收。

需要强调的，一是农村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它从 60 年代“三自一包”开始，经过多年调整，才最后见效于分配机制的改革。所以，改革出效益的内在原因就在于转换机制。不要以为大轰大嗡是改革，改革的实质在于在内部符合多数人利益的细致的制度安排。

二是其中的道理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情况下，劳动者的积极性就是第一生产力，劳动投人大小就决定生产的好坏和产量的高低。农民积极性是最关键的因素，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农村改革的全部经验用一般政策语言来概括，就叫做如何调动农民积极

性。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如何让农民不计代价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也就是在大部分归自己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

11. 农村改革对缓解危机的作用

当时，党内关于农村改革的斗争非常激烈。《人民日报》发表万里同志的助手吴象的文章“阳关道和独木桥”，就是以当时黑龙江的杨易辰和贵州的池必卿两个省委书记的对话为题材写成的。反映出那时的政策允许“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中央文件也是先允许个别贫困地区实行大包干式的改革，再允许其他地方逐步推行。

然而，尽管理论界、决策界始终没一个彻底、统一的说法，农民却有了彻底、统一的做法，就是一个字：“分”。把农村以土地为主的大部分生产资料以“包”的名义按人平均分了。对此，政策语言非常雄辩。即便从现象上看，农民连生产队上的门窗瓦片都分了，拿回家去了；把拖拉机上的螺丝钉都拆了，本质上那也是集体经济。文件上就叫做“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集体经济”。

不论文字定义是否正确，其结果是连续三年每年 250 多亿公斤粮食的增产量，最后是效益说话。直到 1984 年粮食一下突破 4 000 亿公斤台阶的时候，才暂时没有争论了。从 3 000多亿公斤一下跨到 4 000 多亿公斤台阶，不过三年时间，改革前搞了二十多年也没上这个台阶，所以才承认大包干。

正是因为连续三年粮食产量的增长和农村收入的增长带动了消费增长，因此那时农村的消费额占到了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64%（现在下降到仅占 40%），进而造成了工业的繁荣和就业的增加，随之社会犯罪问题也缓解了。80 年代初，是因为农民袋里的票子多了，城市工业品库存才卖得出去，才使企业开工生产。至少不必再搞“关、停、并、转”；也不必再搞“严打”。

所以说，第二次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了这样一个道理：农业和国民经济宏观波动高度密切相关。

12. 大包干带来的问题

“包产到户”的结果是土地按人均分配。这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当时全国只有千分之四的社队仍然维持着集体经济，大多数社队农业用地按人均分，重新恢复彻底的小农经济。这就使政府重新面临 50 年代的老问题：与 2.4 亿个小农户无法交易；过度分散的小农供给与高度集中的城市规模需求无法对接。更何况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国营工业，如果无力参与国际竞争，就很难维持原来的利润水平。因为没有集体化，统购统销也就没有了必需的组织载体。

农村改革第一步“大包干”，实际就是一次“抓大放小”的改革；而现在城市的国营工业刚刚提出“抓大放小”。农村改革抓大放小是个自然的过程：那些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集体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地方，多数没有分地。因为不好分；同时也由于农村集体经济是社区共有，社区内人际关系的半径小，便于财产监督和收益整合。社队工业经济在工农价格剪刀差的情况下，能够获取超额利润，给农民一块收入补偿。在集体有分配而且分配足够大到影响多数社区成员利益的时候，农民为什么要分呢？所以，当时大约 4 000 个有工业的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社队没有分，而 400 万个社队都基本上都分了。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资产总额据统计约 3 000 亿元，大部分在分包到户时作为制度成本支付掉了。换来的制度收益是大幅度的农业增长；同时缓解了当时处于低谷状态的城市工业经济，刺激了国民经济发展进入高涨期。

三、东方社会非私有化的根源

自从农村改革以来，理论界总是有疑惑：农村分田到户，

是否在搞私有制？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这本来并不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1. 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完全意义的私有制

中国历史上基于五千年的农业文明，土地的所有权概而言之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归“天子”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因此历史上从来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私有制。直到解放前，以“祖宗田”、“族田”为名的村社公（共）有制财产，也占有农村土地的相当比重。

据最近我们做的“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研究”的调查，即使在近代商品经济较早发育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有的村在50年代之初进行土改前，约八成土地属于公田，农民也是分户包租；地租主要用于教育、治安等“公共品”开支。

因此，即使是分田到户，也不意味着私有制。因为农村公有制经济叫“集体所有制经济”，其最初形态又是在以股份制承认农民在土改后获得土地所有权基础上形成的初级社的合作制，所以，集体经济的财产关系构造最初就有“两级产权”：一级是社级，也就是合作社；另一级是农户一级。现在发达地区对传统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化改造后出现的社区股份合作制，同样也是两级产权。中国特色的两级产权不是西方经济学“产权排他性”所能解释的。

2. 两极产权与股份合作

农村集体经济是在集体所处的地域范围内人人都有的经济；无论是自然村一级，行政村一级，还是乡镇一级，这三级的集体经济都是在原来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基础上，经过几十年农民劳动积累过程演化而成的。相对而言，超越这个地域内每个成员都有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叫集体所有制经济了。由于在其地域内部“财产关系半径短”，财产的变化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互相之间可以传播交流，因此，是一

种便于监督、便于实现所有者产权收益的社区成员共有制经济，而非国家管理的“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经济，也非私有制经济。

中国在漫长的农业社区文明中，社区和农户之间自发地合作，并经历史沿革而成的“两级产权”，和西方私有制经济产权关系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也早就看到，即使是西方的私有制经济，当它在向生产的社会化和股份制发展中，也在扬弃着私有制。他说：“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扬弃的”。（《马恩全集》第25卷第498页）此处所说的后者，就是指合作制。他还在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及其一切矛盾”。我国的城市改革，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消极扬弃的”，以为可以通过股份化改造企业产权构成。而农村改革之初的分地和后来“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却在实践着“资产的社会化与生产的社会化相结合”。在这个历史性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之中，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却长青。我们应该注重的是从实践中去发现问题，提炼出一些带有理性的经验，而不是将传统的或西方的理论结论或理论概念，套用到我们现在生动活泼的经济现象上来。农村的分田到户并不意味着私有制的产生，而是集体经济“产权两极构造”的又一种实践形式。

四、90年代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内容

（该部分内容请参见本书《中国改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一文，详见第25～34页）

1994：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问题分析*

摘要：

1994年初春，乍暖还寒。潮涌般的农民工返乡过年和禁放花炮还来不及留下一片清静，不断波动的物价和再度跌破"铁底"的股价即已引起躁动不安。不仅企业界，甚至连地方政府官员都对中央在年初提出的紧缩、强调控制政策感到疑惑不解，因为这种被人们俗称为"收"的凉意惯常会在盛夏才出现。于是人们在问：1994，到底会怎样？

本文根据作者对1993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数据的理解，结合对以往发展过程的经验分析，试图对1994年的经济趋势作出如下判断：

投资难以控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会突破控制目标，在上年基数上增长50%以上；这应是上两年经济"高涨"期的余波，可导而不可堵；否则，将重演四年前的"滞胀"危机，并引发信用崩溃。

物价未必高涨——投资主体社会化将使城乡居民消费基金转化为金融资产，防止物价过度上涨的关键在于，只要资本市场打破垄断，真正放开，就有可能改变现金流向，甚至可能导致一般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疲软；这将会使本该大幅度上扬的物价水平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表现为中度通货膨胀**。

---

* 这是1994年3月为中国科协信息中心《科技与信息》撰写的形势分析。

** 1994年经济继续在高涨期运行并且表现为中度通货膨胀，其中，没有放开对资本市场的垄断控制可能是导致资金分流的原因之一。

分析今年的经济发展问题，应先看年初中央政府所提出的控制目标和表现出的政策趋向：有关领导多次强调，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和物价总水平都不得超过1993年；要在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推进投资、税制、外汇、金融等体制改革，试图以宏观外部环境的改革来推动国营企业走向市场。这一系列近期出台的政策和所强调的改革重点，主要是与政府财政关系密切的经济主管部门和国有企业。当然，赤字财政和开支刚性矛盾制约之下产生的这种政府目标和行为趋向，多少会对今年经济趋势造成一些影响；但从最近六年经济周期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且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似乎尚未被人们准确地把握。

1994年可能出现的投资失控和中度通货膨胀，其原因应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开放和投资主体的社会化程度，而不是控制以及控制本身是否有效。过去说中国经济在“一放就乱，一统就死”之间震荡；而今传统调控手段已经成了昨日黄花，从现象上看，近几年已是“放统皆乱”。倘若允许进行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入分析，则可以看到，中国正处于制度变迁、经济发展的交叉路口上。如果在改革决策上对国家资产的部门垄断一让再让，或在事实上已经出现的社会化再分配过程中不注重还原劳动者已经付出的剩余价值，那就不仅是犹豫失机，而且也许人们将来会说，可能是某些担心迫使决策者继续“花钱买大好形势”的。

我在去年发表的“1993：中国通货膨胀趋势与历史比较分析”那篇拙文中曾经预示，1994年全年投资规模将大幅度突破已经被人判为“过热”的上年7 600亿元水平，总额在10 000～14 000亿元之间；货币发行也将比上年1 200亿的“过量”还超发50%，达到1 800亿元。很遗憾，不幸而言中。当然，也有个别预测出现了不该有的“失误”：例如，认为物价涨幅将达到30%以上；财政（自然）赤字可能突破800亿。尽管这两项预测值大大高于公布的数字，但我仍不得不在关

于1 000亿高息国债发行的消息公布之后，以此作为分析1994年个别问题的依据。

一、投资膨胀与金融资产社会化

1. 无论多么伟大，也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投资、消费双膨胀和基本建设资金怎样转化为消费资金，是个多年来已经讨论清楚了的老问题。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央政府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已降至10%左右，而这10%也在各个部门手里，每个部门都追求自己的垄断利益，难免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突破计划，使控制措施弱化、虚化。

一般而言，项目上马时发生的融资往往只是一个开端，项目实施之中超计划预算一般在40%以上，因此将不断进行融资。尤其1992～1993年中国经济从“复苏”迅速转为“高涨”，其中产业、金融、期货三种投机几乎没来得及分出其阶段性特征，就着实给人留下了“潘多拉盒子”的印象。房地产业异军突起从来就是金融投机之大忌，于是官民等被“套”资金数以千亿计。目前房地产业在建项目对资金的需求刚性逐渐增强，这种刚性需求已使各方出资者的利益连成一体；不仅如此，甚至投资者与借贷者的利益都会连成一体。很可惜，由于被套牢的主要是不对风险负责的官方金融资本，因此，以各种名目的再投人成倍资金来解套是必然！

据国家审计部门对11个省和包括京、津、沪在内的7个市的调查，尽管去年的整顿金融秩序很有成效，但仍有90%银行自办的经济实体尚未脱钩，在被审计的53个分行、581个支行所办的3 318个经济实体中，实际抽回的资金仅为5亿多元，占其注人资金的17.4%。客观上银行自办的实体多为投资公司或经营房地产，只有继续投人，才有可能解套；调查显示，有些银行还在继续向自办公司注人资金。在现行经

济体制下，这种金融资本的部门垄断，是“钓鱼工程”能够屡屡得手的主要原因。而在目前投资体制改革趋向集权的情况下，部门之间的灰色融资和社会上的民间集资也就更加势不可免。

同时应该看到，全部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已超过50%，在去年国民经济的增加额中，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幅度大约是国有经济的8倍，这一块的增长显然并不源于中央计划的投资。尽管年初以来中央严令不再增加新的投资项目，但在头两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中，仍有四分之三以上是新扩建项目，各地新开工项目还在大量增加。

2. “菜篮子”＝“唐僧肉”＝收入饥渴

进入90年代前，中国老百姓只有“两极化的市场”：一极是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另一极是高档大件消费品市场。所以，人们挣钱就是近期简单生活消费，存钱也是为近期中高档生活消费。近几年随着股票、证券、集资、房地产、农村股份合作金融的出现，老百姓在很短的时间里忽然面对更多的投资机会，仿佛一夜之间醒了，产生了强烈的获利冲动；于是，伴随着涨工资永远说不够的“收入饥渴”和总认为自己吃亏的“相对剥夺感”，社会公众收支在目标和行为上都发生了本质变化：挣钱不再仅仅是为了生活消费，部分居民借“菜篮子”呼声向政府施加压力早已不是为了吃菜，而是为了扩大家庭开支中的投资比例，追求远期收益。于是社会收入追求无限，而且已经形成劳动力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压力。

据抽样调查表明，1993年底，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居民家庭平均每户拥有金融资产1.2万元，比1992年初增长了1倍。其中，银行储蓄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的55%，列第一位。购买股票占家庭金融资产的17%；集资占17%；借出款占7%；用于其他投资比例的占4%。调查表明，有15%的家庭去年买了股票。另据报载，1994年通过股票市场集聚的资金总额

将达到或超过 4 500 亿。

金融投资和财产投资已经成为城乡居民新的选择。居民在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提下，对物价上涨的心理承受能力在逐渐增加，同时金融意识也迅速增强，储蓄选择趋于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原来单一的银行储蓄。集资、买股票、债券等金融投资已成为人们新的选择。

越来越多的城市干部职工强烈的工资饥渴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菜篮子，而是为买房、炒股、参与投资活动；大多数的民营经济主体也已经开始了追求资本收益的各种经济活动。不仅如此，农村约有 30% 的农民也已经开始有了增加投入、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可见，企业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投资群体，这就是占总人口 30%的农民和 2 亿城市居民。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已经全民化了，但国家一些部门依然不愿承认民间融资市场，当然也就谈不上去引导、规范，这就是投资失控的本质所在。

从 1994 年的情况看，大约 20 000 亿元的社会资金（包括银行存款）中，至少将有 30%以上可能以各种渠道转化为投资，总量可达 6 000～8 000 亿元。政府越是以计划手段压基建，民间集资越有市场，这一块是控制不住的，此其一；再者，外资也是控制不住的，数百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加上同等程度的配套资金，又是一个 6 000～8 000 亿元；其三，国有企业的低增长只能靠投资来实现，靠投资规模的扩张维持产值的增长，从而维持就业的水平，也就维持了安定团结的大局。按照现在的计划安排是 8 000 亿元左右。三者之和，去掉重复部分，大数是 20 000 亿元。

综上所述，1994 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在 1993 年的基础上增长大约 50%，总额将会突破 1993 年的 12 000亿，最高可能达到近 20 000 亿元左右；其中成为投资热点的将可能是以房地产和建筑建材业发展带动的相关基础产业。

二、金融垄断的自我改革与货币发行

按照常规，在100元的投资中，将有30%～50%以现金方式转化为消费基金。一般在投资规模增长50%的情况下，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货币发行也将会随之增加20%～50%，即可能增发1 800～2 000亿元。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超发货币”的增长并非源于市场对货币的强烈需求，而是源于以部门利益驱动的金融改革举步维艰这种体制的弊病：

一是现行我国银行制度的特征恰是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的高度垄断；既定的金融、投资体制的改革方案本质上仍然带有集中计划的阴影。国家金融部门的贷款大约60%仍要按计划投向国营企业；已占产值份额超过50%的民营经济依然很难得到银行的信用服务。又由于历次紧缩银根的首要对象是民营企业，所以，对于民营经济来说，最可靠的结算手段是现金。

二是1989年“萧条”期以来企业信用崩溃、三角债泛滥导致银行信用过度膨胀。而银行贷款结构不合理和信用本身的不可靠，则使货币难以回笼，体制外循环。去年夏季以行政命令来“整顿金融秩序”，银行在不可能收回套在房地产和股票投机上的资金的情况下，为完成任务又制造了银行信用危机，对企业只收不贷，三角债死灰复燃，再次泛滥。

三是国营银行经营机制不活，信用工具不足，汇总、结算手续复杂，而且不对个人开立除储蓄之外的账户；发行信用卡作为吸储手段，逼迫用户交存大笔现金；以及保险、按揭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法理喻的条件问题。上述问题的根子在于垄断。如果银行允许打破垄断，鼓励民间商业金融发展，促进竞争；信用手段充分、灵活、可靠，对包括个体户在内的民营经济主体也像对国有企业一样一视同仁，就无需增发

大量货币。

始于1993年的工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建立，在已经巨大的财政赤字上又增加了一笔工资开支；并且在追求平均收益率的作用下，必然连带城市劳动力价格大幅度上涨，进而使最无力消化活劳动成本的国营企业利税下降，政府财政也会更加拮据。为此，政府的做法只能有二：一是增加国债发行额度；二是大规模举借外债。在人民币与外汇比价不合理的情况下举借外债无异于放血。可这对于社会安定来说，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上述做法带来的后果会最直接地体现在成本和物价上，物价上涨的结果又会迫使银行提高利率。1994年一季度资金市场利率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已突破利息每年2分的高水平。年初即强调紧缩，企业普遍缺乏活动资金，如果二季度年息1.4分的1 000亿国债大面积上市，将会刺激民间利率再上高台阶。资金价格的上涨会进一步使企业增加成本，增大债务份额，然后是下一个连锁负债的恶性循环。

三、物价上涨的主要制约因素

1994年一季度物价涨幅较大，前两个月上涨幅度超过20%；其中基本原材料价格涨幅较高，钢材在去年大量进口、一度库存积压销售不畅的情况下仍上涨了5%～10%。尽管各界对此评说不一，我仍坚持认为全年物价总水平不会比去年高出多少，预计仍会在30%左右。这是国家放开物价和人民币汇率并轨后必然出现的涨价幅度，属中度通货膨胀，大可不必惴惴不安。

之所以认为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不会大幅度提高，是寄希望于打破垄断的可能和基于对中国民间投资主体正处在生长阶段以及既往消费市场疲软的经验性分析。

过去两年是资本市场形成的最初两年，较高的投资回报

的示范将鼓励更多的社会民众参与民间投资，参与企业内部集资，更多的人将加入买债券、买股票、买房地产的行列。据调查，我国部分地区民间集资额已占家庭全部金融资产的17.2%，参加集资的家庭已占38.6%。

国际经验表明，在放开物价的同时推行国有企业的拍卖、租赁、转让，开放要素市场，将会有效地从一般消费品市场吸收社会资金投向资本市场，抑制近期消费需求，降低通货膨胀率。3月份市场主要家电品种有70%不同程度地降低销售价格，即是一个例证。

最近，据南方某省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城镇居民家庭耐用机电消费品已出现周期性饱和状态，家庭储蓄用途已转向中长期。有83%的被调查者认为，今后的购买对象是住房，储蓄的目的除了供养子女和老人以外，"购买住房"占17.4%，排第二位。调查还显示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加以后，不像前几年那样投入市场，购买商品，而是存入银行或持币待购。居民不仅对物价上涨的心理承受力有所增强，而且消费行为趋向成熟。"买涨不买落"变成"买落不买涨"，这就直接对形成价格的重要因素——"需求"造成影响。例如，1994年初的国内市场销售表现平稳，如果排除季节性的农村市场旺销所占的销售额，城市消费品市场是低增长或是下降的；一定原因就是在于同期物价水平较高。

此外，有专家认为，1994年随着城市住房改革步伐加快，将会出现中小城市和县乡城镇建设的高潮，建筑建材业将会有很大发展，其他相关基础产业也会随之发展。这将吸纳更多的民间资金，有效地抑制一般消费需求，从而使物价涨势趋缓。

四、财政状况继续恶化，下一个“危机”期初露端倪

财政将是个大窟窿。国家财政包下来的那块人口费用将大幅度上升，这部分人所追求的已不再是维持生活基本需求的目标，而是追求扩大投资规模，追求收益率。这种需求是个无底洞。与财政收入饥渴的同时出现的是税源问题，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着职工收入增加、产品成本上涨、效益下降、上缴税收减少的局面。1994 年分税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在 1993 年年底加大了税收的力度，从而增加了今年的税收基数，使得分税制的改革难见成效。因此，1994 年的实际财政赤字可能突破 1 000 亿元。

令人感到乐观的是，中国经济的走向是好的，这是因为中国民营经济的生长态势非常好，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这种好的态势。民营经济的份额将越来越大，上缴税收也越来越多，提供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充分。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将逐渐让出部分市场份额。

除非大幅度打破部门垄断，改变国有企业的部门所有制产权，实行国家资本社会化，否则目前这种通过改善企业外部环境来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的努力很难奏效。但是，触动国有产权的改革很难，这将冲击由于部门垄断所带来的巨大的部门利益。对这种冲击的抵触，则可能迫使今年的改革进程延缓。

总之，1994 年经济走向依然可用四个字概括：喜忧参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突破既定目标，控制物价目标可能实现。但这可能不是控制的结果，而是一个灰色的民间资本市场自行运作产生的结果。

建国以来的经济周期及其相关调控政策分析

——兼论 1995 年的经济趋势问题*

摘要：

1. 1994 年的通胀危机已成定局。这是中国第四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符合规律的必然反应。其与前三次危机的不同在于信用膨胀所导致的信用崩溃。

2. 危机的成因首先是连续八年财政赤字吃空了银行自有资本金，造成货币大幅度贬值；其次是巨额超发货币量与国营企业亏损加总算账所对应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几乎是“资不抵债”；其三是高息国债和银行超限负债所导致的信用过度膨胀。

3. 1995 年的宏观调控将使国有企业的增长率再度回落至一位数，股票市盈率下降甚至崩市；社会犯罪问题随城乡统算失业率高于两位数而愈发突出。

4. 其后的经济复苏取决于能否进一步开放国企资本市场和进一步利用外资于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立足国情促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带动失业率下降。

---

* 本文是 1994 年 12 月以中国科协信息中心亚太社会调查研究所名义完成的《1994～1995 年“形势与国情”分析报告》(No. 04)，发表在上海政府信息中心内部刊物《经济信息与预测》1995 年第 4 期上。文中数据全部源于国内公开的报刊，主要摘引自《中华工商时报》和《金融时报》。

5.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处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倘不能破除部门垄断资本集团进行控制和剥夺的体制基础，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时值岁末，有关中国1994年物价上涨指数即使有权数作用，也必然成倍超过年初调控目标。通货膨胀危机所引发的问题的讨论，在京地已经通俗化到街谈巷议的地步。人们似乎来不及讨论年初的调控目标是否失误，也顾不上深入分析危机的真实成因，非常现实地直接论及的是即将到来的1995年。

年初我在发表“1994：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问题”时，曾根据近几年的数据指出：

第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会增长50%（因为仅正常的后续投资追加幅度就会大于40%），因此投资压不下来。

第二，新增货币投放将会增长30%（固定资产投资中一般会有50%用货币支付的劳务），如果再坚持不开放资本市场，不在存量资本调节上下功夫，就不可能吸纳过量的超发货币，通货膨胀的发生则势所必然。

本文进一步认为，1994～1995年经济连续高涨之后将是中国第四次经济危机的发生阶段。1992年以来连续两年的投资、消费双膨胀所必然引发的通货膨胀，不仅完全符合经济周期的客观规律，而且有其“信用过度膨胀”正在引发“信用崩溃”的新特征。不过，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因为早在我1988年发表“危机论”和1993年发表“国家资本再分配和民间资本再积累”时，即已经对近半个世纪的危机周期作过总结。此次应上海经济预测中心之约再度捉刀，旨在从研究角度剖析历次危机政策的得失，并试图说明经济危机与中国屡次进行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的相关因果关系。

至于1995年，在统计部门公布其由《统计法》确认的权威数据之前，本文只能作规律性的分析：一是认为中国在90年代初的改革十字路口的选择上，垄断资本利益的集团化作用很可能会左右决策导向……。二是认为中国区域发展的巨大差异将会在国外过剩资本流入中国、从而一定程度缓解危机或萧条阶段产生停滞的过程中，产生明显的制约作用。倘若采取全国性的改革政策且开放资本市场的动作大，则不发达地区走出危机尚且有望；否则，将只有类似长江、珠江三角洲（包括上海）这种海外资本最易于进入的地区能够保住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整个90年代外债还债高峰期内，惟有1994～1995财政年度处于还债低谷因而引进外资政策干扰较小的情况下。由此还可以认为，地方与海外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联系及相关政策安排将会在危机期起重要作用。

此外，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还应进一步鼓励甚至直接组织有实力的企业建立跨国公司或参与国外市场开拓，以期绕过国内垄断金融和汇兑的控制，通过国外子公司直接进入海外融资市场；另一方面，应在出现资本过剩的条件下走出去：立即着手研究向国内不发达地区或国外（周边国家为主）进行资本和技术投入的有关政策条件，以便在适时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移出弱质产业。而对于不发达地区而言，削减财政开支，拓宽民企领域，尽快开放国有（政府）资本市场，显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一、建国以来的四次经济危机周期及其相关政策

1. 第一次经济危机周期（1958～1968年）

1958～1960年，危机发生。政府财政赤字1958年约为60亿元，1960年达到100亿元，占当年收入的比例从5.6%

增长到14.3%，三年赤字总额达到200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最高才600亿元左右，高额赤字挤占了财政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机会的开支。1960年以后，由于财政投资能力下降，就业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动员大约2 000万城市人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

1960～1962年，经济萧条。国家财政年收入进一步由572.3亿元下降到313.6亿元。从1982年重新修订并公开出版的60年代的政府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1960～1962年这三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呈下降趋势，"未增加人口"大约为2 000万人，这其中大部分可认为死于饥饿。人们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1962～1963年，经济复苏。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机压力下改革"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放松了政府对农村基层的全面控制，允许农民搞"三自一包（这种以"放"为特征的经济改革15年后再次重演，只是改名叫'大包干'或者叫'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因此，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由8%上升到22%，财政形势有所好转。

此时，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上的路线斗争越来越明显；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无法解决基层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孕育阶段。

1963～1966年，高涨期。国家在经济形势初步好转后，增加了对工业的投资，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紧接着财政赤字再次出现……随后，1968～1972年数百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其真正原因仍在于城市无法解决的高失业率。

此后即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阶段。尽管非经济因素作用在这个阶段上明显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但也仅仅只是把危机期的阵痛延长而已。

2. 第二次经济危机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机发生。国家财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亿元大关后，连年亏损，到1978～1979年，赤字进一步增加到每年约为200亿元，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高达20%左右，比上一次危机爆发时的比例还高5%。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只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影响，还有“洋跃进”——大规模举债用于基础工业投资，以及中越边境战争直接造成的非预算性开支等等。

1980～1981年，经济萧条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降低了农业税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开放集市贸易。这就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与上一次经济危机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关、停、并、转”，压缩基建投资，使几百万基建职工“停工待料”，几千万城市人口“待业”。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自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结束，后集权主义体制（Post Totalitarian System）缺乏准军事化的国家动员机制，无法再像60年代初那样迫使城市人口去农村来解决失业问题，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国开展两次“严打”运动，监狱暴满。

1982～1983年，复苏阶段。由于全国范围对农村土地的再分配和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开放，粮食产量每年创历史纪录地增加20%，1982～1984年三年的总增加量约为75亿吨。中国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农业产值也提高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

1984～1986年，高涨阶段。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加快，同期财政赤字增加到每年大约100亿元。其中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年“利改税”之后形成的国有资产“单位所有制”。由于国家垄断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财政投资的无偿，相对于较高的物价水平而言，任何单位获得投资本身即是意味着

吃进利差；又由于单位内部“利益同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一般会有40%～50%以各种渠道转化为消费基金。因此，自1983年以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也大幅度增加。在“投资和消费双重膨胀”的压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转化的超发货币量终于引发全面通货膨胀危机。

3. 第三次经济危机周期（1988～1994年）

1988～1989年，危机爆发。以1988年夏季大抢购为表象的全国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危机和1989年的社会政治危机相继发生，如果可以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来分析政府决策，则可以看到，从1986～1988年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强行压减投资、消费双膨胀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政府于1988年末开始连续大幅度调高利率，以此吸纳社会即期货币，减轻通胀压力，存款利率跳跃式地升高到70%～80%。而同时，贷款利率又在行政强制下不得提高，于是造成银行当年出现400多亿元的政策性亏损，最终冲入财政变成赤字。然后，高额赤字压迫政府改变决策行为，相应调高贷款利率，危机又恶性循环转嫁给企业。这种流量资本调节的极端性措施是在不触动存量资本的情况下运作的，必然由于企业产权虚置而造成极端性后果：银行高利率造成企业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动资金贷款最多的商业企业被迫减少资金占用，改购进为代销，向生产企业转嫁成本负担——生产企业如法炮制，缓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业转嫁产品成本占压资金负担——连锁负债迅速波及全社会。

对1988年通货膨胀缺乏经验和规律的认识，在经济调节和行政控制上都反应过度，是第三次经济危机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观原因。不仅货币政策过度调整是连锁负债的内在原因，而且市场政策的过度调整也是当时“市场疲软”的内在原因。

中国在进入90年代之前，既无资本、技术、劳务、物资等要素市场，也无住房、保险、医疗、旅游、教育等社会消

费市场。10亿民众可以进入的只是一极高档大件消费品市场以及另一极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这是一个“翘翘板”型的“两极”消费品市场。为了抑制通胀发生时本属短暂的对高档商品的抢购，政府在大幅度调整存款利率的同时还大幅度调高以彩电为代表的大件消费品价格，另加高档消费税，使等量货币的市场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几乎一瞬间就人为地关闭了两极市场的一极。翘翘板一头空了，而另一头，据测算，早在1986年大多数农业主产品即已受到“市场需求制约”，于是，1989年初城市消费品市场开始呈现疲软之态。

1990～1991年，经济萧条阶段。政府采取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政策，投入1 500亿元贷款，但此时的连锁负债已达2 000亿元之巨。同期，国营企业库存产品占压资金也已超过1 000亿元。另据统计，国营企业亏损面已大大超过50%，遂不得不将“全面倾斜”改为“点贷解扣”。

国营企业连年亏损，造成以国企税收为主要来源的政府财政连年赤字。先是1989年秋冬之交试图财政、外贸收权不果；接着以财政解困为目标，政府“甩包袱”式的改革政策便相继出台。其效果之一，即萧条阶段财政取消农产品购销补贴后的农村市场也走向全面疲软，这是因为：以往国营流通部门凭借财政补贴，垄断性地占有农业主产品商品量的一半以上，当1990年取消购补，销补暗转明之后，国营流通部门的直接反应是立即大幅度减少购进和库存，同时挪用银行专项资金用于高利润经营。

这一行为的直接作用是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不再有“蓄水池调节”作用，导致各种欺行霸市和价格波动无序化，并且随时诱发社会动荡，经济矛盾日益社会化，“菜篮子”等与是否稳定相关的问题渐渐成为各级政府分外重视的主要矛盾。

其间接作用：一是2亿多小农户无法适应原有的国营大买主市场份额迅速下降到20%以下的新局面，“农产品卖难”再次普遍发生，农民收入随之连续三年下降，占有基本生活

消费品市场60%以上的消费额并且一向稳定的农村随之出现全面市场疲软；二是农业比较收益过低的老问题在农产品"卖难"和农民收入连年下降的作用下陡然突出起来，逼使农民背井离乡，"民工潮"大范围涌流。

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渐渐复苏，并随即转入高涨。刺激经济复苏的兴奋剂有两支：

一是1988～1989年的高利率政策失败之后，政府又把利率连续调低甚至低于原来水平，高利率时期大量吸收的存款必须贷出，因此资金环境暂时相对宽松，同时资本市场初步开放，低利率政策又使货币持有者转向风险大但收益率高的股票、证券市场和其他投资市场。

二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半数以上县级财政长期亏损，政府利益在财政分配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仍然每年以集团消费递增25%～30%的速度迅速膨胀。在第三次危机已经吃空了以行政占有的流量资本的逼迫下，政府及所属部门的利益之手伸向能够即占即盈的房地产投机。全国性的开发区圈地热和房地产、股票、期货三大投机一齐上的存量资本瓜分浪潮，忽然间似狂飙拔地而起，的确在暴富了一批投机于权钱交易的食利者的同时，在病态的经济背后又猛击一掌。

1993～1994年，经济高涨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992年的7 600亿元跃增至1993年的约13 000亿元，1994年又在上年增长70%的高比例上再增50%左右。任何对存量资本的重新分配都会促进经济成长！尽管90年代初以圈地运动和泡沫经济为表象的中国经济发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其实质不过是周期规律作用和对国家资本的又一次再分配。

之所以说是"又一次再分配"，是因为80年代初那次农民曾对人民公社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作过一次再分配，并迅即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不同的是，那次分配是农民凭借社区成员的天赋权利和农业文明的均平传统所作的社会化

占有；而这次分配是食利者凭借政府权力或以“寻租行为”对赎买到的法权关系所作的特权占有。

无论如何，相隔10年的两次国家资本再分配尽管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相左因而不尽如人意，但都形成了经济发展最起码的基础——利益目标明确的活跃的经济主体——因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可以从历史角度肯定其进步意义。

4. 第四次经济危机周期（1994～1995年）

1994～1995年，第四次危机发生并伴生市场疲软、失业率、犯罪率上升等萧条现象。与前三次滞胀型危机不同的是，这是一次信用过度膨胀导致的通胀型危机，现象过程如下：上次滞胀型危机过程中，政府财政甩包袱只部分减少了亏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税收主源——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的问题，企业亏损面一直在50%上下徘徊。到1992年，自然赤字额已高达近500亿元，1993年不计入债务的亏空据估计进一步上升至800亿元左右。此时，连续8年的财政向银行透支，已吃掉了国有银行全部自有资本金，使金融系统100%负债。尽管1993年末政府宣布不再向银行透支，发行1 200亿国债抵补财政亏损，但银行部门“掏口袋”仍占其总额的70%。对银行而言，这意味着用债务（社会存款）来买债，亦即寅吃卯粮了；而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用公众存款充填政府消费，显然是政府信用危机！

又由于上次危机中失误的利率政策使企业连锁债务一直未能根本解决，向国营企业倾斜和“花钱买大好形势”、“贷款发工资”等保稳定的政治任务又进一步迫使银行贷款中的近40%逾期难以回收。实际上即是用60%的可贷出资金产生的利润来支付100%的存款利息。有的银行资深研究人员指出，如果不是以国家为名，银行早该破产了。

金融部门如此困境之中既然不能破产，其解困行为只有两条路：一是投入高利润领域，提高贷款利率，以高盈利来

抵补以往亏损；二是转向国际资本市场吸收其过剩、低息资金来缓解中长期投资需求压力，防止进一步亏损。

尽管国家现行政策限制使之无法公开走第一条路，但暗中违纪拆借或利用自办公司参与金融投机仍屡禁不止，使得国内资金市场利率一直在年息 2 分左右，高利贷由此横行全国；而第二条路——大规模举借外债（对外扩张信用），则显然正在发生作用。1994 年上半年中国外债总额从上年 800 多亿元激增近半，达到 1 200 亿，即是明显例证。同时，由于逾期贷款包袱越背越重，银行也不得不眼光向内扩张信用。1994 年各项存款大幅度上升也是明显例证。但是由于没有自有资本金的银行发行的任何货币都是对货币实值的人为贬低，因此人民币本币大幅度贬值（1994 年一次性下降 50%以上），此时的外债增加，无疑会使后来政府的财政困难雪上加霜！

进一步分析则可以看到，金融体制改革要转换机制、实现"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因全行业统算竟无自有资本金并且超额负债而势难成立，惟有在划分职能之际将逾期贷款和亏损重负甩给政策性银行由国家财政背起来，才可能做到让银行有正常经营利润。但甩给财政的包袱势必恶化财政亏损局面，转而演化为新增内债，仍会扩张长期信用。

1995～1996 年，将是萧条与调整复苏同步。一般而言，当信用膨胀到临界点，必然发生信用崩溃。上一轮"三角债"的恶梦淫威犹在，新一轮连锁负债重又发生，这即是信用崩溃的表现之一。可预见的政府对应之策的性状特征与上次类似。即针对高涨期的投资、消费双膨胀采取行政手段紧缩银根，控制物价等。随着宏观调控"加强"，物价涨幅有所回落的代价也是不容忽视的：国有企业产值年增长率将落至一位数，非国有企业将维持在 20%左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将会低于 30%，造成失业率两位数的增长。此时，刑事犯罪发案率若也有两位数的增长，则属"社会性犯罪"大面积发生。尤其是此次压缩基建会相对影响几千万进城民工的就业，

社会犯罪问题必然日益突出，且由于基数巨大而防不胜防。

与上次不同的是：一是若 1994 年财政增收比例低于 30%，则赤字导致的新增国债会高于上年，并且只能高息发行。此举将使资金市场维持高利率并使股市熊气持续不散；二是税费征收力度自上而下加强，国企和中小型民营企业亏损面增加，从而失业率和市场疲软问题进一步突出；三是如果年底“复关”成功，可能加剧国内企业的不景气，使生产停滞、库存占压资金和连锁负债问题更难缓解。

可以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在 1994 年农民收入增长 7%的形势下，农业投入比例会同步增加，因而产出增加足可稳定向城市的供给；并且极有可能成为国民收入再分配不均衡条件下社会安定局面的主要支持因素。占人口 80%的中国农民以其相对稳定的信用行为和消费行为帮助危机“软着陆”。

1998 年新一届政府即任之后，可利用的资源所剩无多，地方利益与部门利益之间“条块冲突”加剧，并且集团化、政治化。其后的社会性痛苦过程将伴随经济增长而有所麻木……

二、中国的四次危机异同分析

改革前中国处于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间发生的两次危机基本一样：工业扩张、投资膨胀的同时农业供给下降；其后是财政赤字导致分配不足，新增生产能力下降引发就业问题……其中，由于分配和消费都在严格的计划控制之下，因此对物价上涨的反应并不明显。同样由于计划体制的强有力控制，一手紧工业，一手松农业的两手政策效果明显。对应危机的行政性政策大体是相同的工业“关、停、并、转”；农业“三自一包”。

改革后的两次危机则显然与前两次迥异：一是危机成因复杂。第三次危机形成于部门资本垄断利益导致的国营部门投资、消费双膨胀，进而造成通货膨胀，第四次危机则不仅

有上一次的成因，而且有信用膨胀的内在推动；二是对应危机所采用的行政计划手段与改革后的经济结构不适应，过度紧缩往往造成国有企业的生产停滞，反过来再作用于政府财政，形成恶性循环；三是随着市场化的民营经济逐渐成长和海外资本的大量涌入，政府毕竟已开始尝试着运用利率、汇率、税率等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在国有资产瓜分狂潮和随之而来的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动荡大体就序之后，一个理智的政府将有可能在对以往危机教训的认识中建立起使之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平民政府的“学习机制”，不再像过去政府那样大起大落地运用行政手段或搬动“经济杠杆”，变幼稚无度为稳健干预。

四次危机的周期阶段基本上都是可以明确划分的。但四次危机发生的周期时间却一次短于一次：第一次 1960 年——第二次 1978 年（18 年）——第三次 1988 年（10 年）——第四次 1994 年（8 年）。今后的危机周期在阶段性上可能更加难于明确划分，高涨与危机同步，或复苏与高涨同年；而且周期的时间距离会更短。如果当非国有（国营）经济渐渐成为主要经济成分，而且在国家垄断金融、外贸和计划控制要素市场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中国经济将可能较少出现以往那种损失惨重的明显的大规模滞胀型危机。

此外还应看到：一方面近年来国际剩余资本对缓解中国资金供给趋紧、市场利率过高的矛盾有愈益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并轨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国际性经济波动的影响。

三、本世纪末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前瞻

如前文所述，中国在近半个世纪中已有四次明显的经济危机。而历次缓解危机对策的得失之中，最有效的是“大包干”，即把国家资本在农村的一半作了一次静悄悄的分配，根

据区域血地缘关系所赋予社区成员的天然权利分配到农户，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于是，农村户营经济有了“民间资本再原始积累”的基础，从而不期然地创造了80年代上半期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其理论意义，类似现在捷克已被国际社会公认是成功的“国家资本社会化”。其不同点：一是中国的农村是国家垄断资本统治最薄弱领域。农村的国家资本再分配迫使国家资本垄断经营获取剩余价值的基础——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同时解体，中国从此有了发育独立经济主体和政治主体所必需的市场化前提；二是这种再分配为“民间资本再原始积累”奠定了产权关系基本清楚的基础。劳动替代资本，即个体经济或户营经济不计报酬地大量劳动投入，创造出成倍高于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民间资本再积累率。

中国农民自发地按照平等原则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权利财产的再分配，使得农户经济在形成之初即有机会获取最起码的“启动资本”，可以在户或村域规模内优化要素配置。农户家庭和具有家族（家庭）结构特征的农村社区组织在经济上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区域资源配置；二是收入、福利的整合。在农村组织创新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这两者都是无成本或低成本的。因此，效益最优，收益和剩余绝对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改革的特殊贡献。

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不仅是从事商品生产的独立经济主体，而且已经演变为纳税人阶层。除交纳农业类税赋外，还向地方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交纳以提留、统筹为名的“行政税”，以农业主产品合同定购为名的“经济税”。因此，农民与基层政府的政治关系日渐“现代化”，即农村社区自治组织通过普选实现直接民主；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建立经济契约关系，变行政控制为管理服务。而在城市，除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者之外，市民仍为非纳税人并且是享受全面消费补贴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城市政府对于市民仍通过既得利益分

配机制来保持集权政体的行政控制关系。

"大包干"之后，村、户之间形成两极化的产权构造，利益关系基本清楚。其后的发展，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农户经济的发展，实质是一次非官方民间资本的再原始积累，表现为农户家庭成员不计成本的活劳动替代物化劳动资本投入所创造的高积累；农村户营经济的剩余必然转化为货币，并且投向在剪刀差作用下可以产生超额利润的非农产业。然后是城乡壁垒条件下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与第一次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浪潮不同的是，第二次是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随着农村工业对于规模经济的追求和市场条件下不同产业之间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乡镇企业团地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将会同步发展。此时，农村中以国家资本再分配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及其相伴生的大规模市场交换，必然对另一半国家资本即城市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和政府房地产形成压力，可能迫使城市国有资产逐步进入资本市场，在存量资本调节过程中对部门垄断资产实行社会化再分配，并且生成新的经济主体，以此为城市非官方民间资本再原始积累奠定基础，形成本世纪末市场趋向的第三次工业化浪潮。然而，从 90 年代初以来的发展过程看，部门垄断资本利益明显出现集团化、政治化趋势，并且已对政府决策形成压力。中国在改革与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所作的选择可能是最有历史意义的美学追求！

90 年代中期发生的信用危机（1994～1995 年），将会使企业新增连锁债务和新增库存占压资金加总超过上一次的 3 000亿元，进一步恶化城市国营经济"负效益"的局面（企业亏损加上历年财政赤字形成的超发货币量，已经大于国营工业实值固定资产）。如果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算总账资不抵债，那么财政收支赤字将因无处透支销账而继续加重政府信用危机。一般情况下，当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采取对应政策之中的首要一条是压缩政府开支，精简机构，裁员减支。

但上一次危机发生时政府的精简裁员努力未果；这一次在财政赤字上涨的同时，反而不断增加政府开支。显然，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不可能大幅度削减自身消费的前提下，会影响政府的有效决策能力。

中国尽管屡次面临危机，步履维艰，但从长期看，仍然不会垮而且会维持发展。这一方面在于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商品生产者所提供的占农副产品商品市场绝对份额的供给量，“九亿人给两亿人搞饭吃”，足够保证吃饱穿暖；中国城乡关系好比“四抬大轿”，四个农人抬一个城人，四平八稳。更何况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贬值达50%以上，这就突然一次性地给中国农产品留出了30%～50%的涨价空间，农民收入由是增加，农业投入产出比也显得比上年合理。这将造成1994年冬季粮食播种面积多于上年，并将使1995～1996年维持高产，从而间接维持城市供给的稳定；另一方面在于被隔绝于城市计划体制之外的非国有经济已经有了十几年市场化的民间资本再积累，创造出粗估总值约90 000亿元人民币（包括地产）的新财富增量，并且其产值已经占到GNP的一半以上（1993年）。即使在经济危机给国营经济造成极大损失的年份，民营经济仍表现出较高的增长势头。

应该看到，中国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在15年的改革进程中有了新的变化：集中的部门垄断经营的城市资本与分散的民间市场化的农村资本相对立；与之相关联的则是城市政治和农村政治因为利益结构不同和权力指向不同而相对立。这两种对立的统一，是中国得以在前苏联、东欧巨变之中幸免并仍可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

有鉴于此，本世纪末中国的发展前景仍取决于能否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一是对国家负责任的政府主动推进国有资产的社会化、民营化改革，允许民资继续对国有企业产权进行改造融合，促使其存量资本活化；二是改善对外开放政策，利用外资于基础建设并与政府主导的解决劳动力过剩的密集就业计划相结合。

危机论*

——结构性危机向周期性波动的转化

一、发生在城里的农业危机

农村改革10年来，农村经济一直持续增长。客观地说，农业并没有危机，只有农产品不同品种的供给和价格变动。但是，享受大量补贴的城市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食品短缺。价格猛涨，票证供应，不能不使人议论这场发生在城里的农业危机。

早在1979年，就有四位年轻理论家提出“社会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的论述**。10年后，农村已基本上摆脱了这种结构性危机的阴影，开始转化为周期性的波动。改革把市场机制引入农村，旧体制已经解体，公社社员重新获得了经营权利并成为具有独立财产地位的农村经营者。他们在商品生产中所表现出的资金投向、资源整合，是在比较利益的原则下随市场波动的。自我调节、农业生产的自然周期和从城乡

---

* 这是我在1988年5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该发言当即受到批评，因为那时的主流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经济周期问题，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由于有批评，我便把发言稿整理成文，刊登于《经济学周报》1988年5月15日第20期第2版，此文随即被《新华文摘》当年8月号全文转载。当然，13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再讳言中国的经济危机了。

** 1979年中国第一篇讨论经济危机的文章是由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等四人联名发表的。当时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他们的观点对我有极大的启发。

二元经济体制互相冲突的利益结构中过滤出来的扭曲的市场信号，成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波动的基本动因。这三者也是计划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向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转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

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尚未打破，城市利益分配仍在计划和补贴的壁垒之中，当城市经济近两年严重地出现结构失调的危机局面时，农产品供给波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旧有分配制度的弊病，促进这种维系旧体制的利益结构的变化，从而使城市经济摆脱结构性危机的束缚。另一方面，由于旧体制是以利益分配结构固化其中为存活条件的，所以，对分配的刺激又必然形成城市社会的全面反应。每一个城市居民在城乡对立社会结构中都凭借社会身份习惯性地参与了三十年对农村的剥夺，当然不会坐失超经济占有的利益份额。这种反应对财政、流通都有足够的压力，甚至迫使政府决策向逆价值规律的方向扭曲。

因此，发生在城里的这种农业危机有二重含义：一是它本身是城市经济体制不改不行的危机；二是它又可能是迫使已经在改革中初获发育的新体制倒退回去的危机。

二、农业周期性波动与市场调适功能发育

农村的改革为农业摆脱结构性危机开辟了道路。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说，“大包干”允许农民分户经营只是中国农业经营传统的恢复，但是，允许农户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指出了商品经济是农村发展的战略方向。而且，这个变革是在城市大工业已成体系、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又给农村发展留下了巨大的体制空间的情况下提出的。农村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突然获得了一个庞大而又原始的市场。无论如何，这毕竟是可以在买与卖之间体现财产权利的市场。同时，机会利润所提供的示范效应和市场风险所提供的学习机

制，对农民经营者来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时机。

从此，农业中主要受自然和政治因素支配的经济危机让位于主要受市场因素影响的周期性供给波动。例如，1982～1984年粮食平均每年增产约150亿公斤，1985年减产280亿公斤，而同期农作物因自然灾害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重并无明显变化。同时，引人注目的是，除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仍旧由国家计划控制外，几乎所有其他进入市场的农产品均大幅度增产。事实表明，1985年农村市场放开后出现的不同品种的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不是农业出现了危机，而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又如，1986年大旱，近一半秋粮作物枯死。《人民日报》1986年10月8日曾预言："旱涝无论对夺取1987年农业丰收还是对农业发展登上新的台阶，都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然而，1987年却成为仅次于1984年的粮食丰收年。显然，这里起制约作用的是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价格以及其他经济因素。

从我国经济波动的历史中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次农业危机与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基本同步。80年代为农业导入市场机制之后，农业的周期波动则受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的制约，不再成为结构性危机的主要动因，也不再与结构性危机同步变化，而开始进入了商品经济必然的同期性波动阶段。

不容忽视的是，农业周期性波动的调适功能正日益受到旧体制、旧结构的影响。以粮食为例，1982～1984年，受价格和政策双重刺激，粮食连年大幅度增产。由于严重的需求约束，市场粮价大跌，农民自动接受价格信号调整产业结构，调减了粮田面积，农村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这是农村经济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是正常的自我调适。**不正常的是维护旧体制和旧利益结构的调控行为。**粮食大幅度增产，国家照样进口粮食；粮价下跌，粮食部门一面拒收，一面抛售存粮；粮田面积减少，产量下降，反而一面强调粮食转化，一

面维持全民全品种粮食补贴，同时还多头抢购，粮食出口。这一切逆价值规律而动的现象，并不只是行政体制运转不灵的滞后调节，而是旧体制自我保护的“机体排异功能”。

自从1985年除粮、棉之外的农产品价格放开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已受到冲击。农村经济的价值规律导向下的自我调适机制刚刚发育，就遇到了城市尚未改造的旧体制的排挤压抑。**城市旧体制不仅试图继续以扩大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向农村转嫁危机，甚至把危机的原因归罪于农村改革，**正像许多无知的人把物价上涨归因于市场开放一样，所希图的只是维护旧体制，保住30年来对农民剥夺的历史中形成的既得利益。

三、结构性危机与城市企业的结构矛盾

1978年至1987年这10年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初步表现出周期性特征。其中，1986～1987年，城市经济的危机现象反映出来的却是在旧计划体制下必然造成的结构失衡。

1979～1986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实际国民收入年均递增8.6%。其中，1984年为13.5%，1985年为12.3%，而1986年下降为7.4%。1985～1987年物价总指数增长25.7%，全民企业工人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仅2.4%，而人均工资总额年增17.5%。其中，资金部分年增25.7%。据1987年对部分城市大中型企业调查的资料分析，企业中实发工资年增长近40%，奖金总额增长89%，1986年标准工资仅为全部工资总额的63.8%。另据测算，1984～1986年间，全民企业新增投资实际年均递增约30%，而其中约1/3以各种渠道转化为消费基金。到1987年，累积货币发行量大于商品可供量已达5 000亿元，形成了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

当职工的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急剧增长时，劳动积极性却在相对下降。有些企业不得不靠农民工、合同工、外包工等

方式维持运转。有专家认为，全民企业职工“贵族化”，是城市改革难以逾越的障碍。

以高额通货膨胀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双下降为标志的“滞胀”型危机，基本上仍是三十年来形成的倾斜式发展的工业体系结构失调的表现。基建战线过长，能源和基本材料短缺，投资结构失调，长线产品积压，短线产品不足等等。随着 1983～1985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 1984 年以后的通货膨胀，社会需求结构迅速变化，使产业结构中已有的短缺与滞存并存的问题更为突出。如我国钢材库存量 1986 年比 1982 年增加了 1 000 万吨，但品种规格却不对路、不配套；而进口钢材中，又大部分是国内完全可以生产和涉足的。于是，耗用国家外汇 13%左右的钢材进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轧钢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再如，大量出口石油造成了国内数万汽车无油难行；棉纱、坏布大量出口造成国内一大批骨干企业停工待料等等。

四、城市企业的消费扩张

产生经济危机的病源必须深入到企业积累和分配两方面的运行规律中寻找。

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城市企业制度中缺乏积累和消费的制衡机制。在企业组织中，企业主与职工形成了利益上的同构体。企业追求投资以增加留利总额，并以多种形式转化为消费的扩张冲动，而得不到制度上和组织上的约束，必然形成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缺口。再加上客观经济体制上条块分割的利益矛盾，资金和原材料市场的不发育，使得本来短缺的资源不能优化配置，这恰恰又放大了需求与供给的实际差距。一旦遇到某项资源或资金的超常规紧缺，就会迅速辐射扩散，甚至形成社会震荡。

企业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利改税，接着是奖金与企业利

润挂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初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但是，在企业财产权属不清晰，经营法人地位不明确的情况下，企业主和职工都有同样的扩大企业留利、增加消费份额的愿望。于是，以放权让利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企业的消费扩张冲动。由于企业工资仍受国家控制，所以企业追求留利增加：一方面尽可能转化眼前消费，表现为奖金和其他津贴在 1983～1986 年间平均年递增 25.7%，人均劳保福利费支出 1985 年比 1980 年增长了 84%；另一方面尽可能转化为长期消费，表现为建住宅和购轿车，现代化办公用品等集团消费猛增。全民企业“一五”期间到“五五”期间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平均比重为 21.5 %，而 1981～1985 年增至 45%左右。

不仅如此，企业追求留利中消费比重提高的冲动，必然直接导致投资扩张和上缴税利讨价还价，甚至偷税漏税大量发生。其后果是基建投资失控，战线过长。同时，财政分级包干之后，由于财政分配投资远远不能满足企业投资饥渴，于是，争取财政预算外投资和银行贷款成为中央财政计划难以制约的两个投资源。据统计，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 1981 年的 29.4%下降到 1985 年的 17.6%；而预算外财政收入占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51.4%上升到 1985 年的 82.3%。上述种种因素进一步恶化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导致了结构性经济危机。

五、体制结构的“影子重合”

企业微观机制失衡何以能迅速放大，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大动荡，这里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我国改革前的社会体制是一座完整的“科层金字塔”型。它的结构特征是层次分明，依次固定。任何层次和位次上的具体单位的结构均与整个社会体制结构重合，所以，称其为“影子重合”。这些特

征也是"超稳态"社会停滞不前的内在原因。

80 年代初人民公社在农村改革中解体，科层体制在农村中失去了基础。县以下在体制上出现了基于政府与农户财产关系断裂而造成的体制断层。过去，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均被严格控制，不得不承受剪刀差的剥夺。一旦体制断裂，他们即获得了巨大的主体发展和组织发育空间。农村经济之所以活跃、多样化，体制断层留下的发育空间是一个必要条件。

由于城乡改革不同步，城市依然维持着旧体制的科层金字塔。在这种体制中，一个企业的微观机制与社会体制内影子重合的其他同构体大致无二。所以，消费扩张、投资扩张、生产增长有限等企业病就是所有同构体的通病，是体制结构本身的弊病，表现在工资改革上，就成了无论企业盈亏，无论职工贡献大小，只要调资，必须人人有份。1982 年事业单位调资，1983～1984 年也不得不给企业普调一级。1985 年事业单位实行结构工资制，1986 年国务院又不得不准许企业仿照事业单位自费套改的钱按人均 7.5 元列入成本。旧体制同构没打破，体制内所有同构体必然追求相同等级的收入。同理，各企业以各种名目截留利益、扩张消费时，事业单位也不甘示弱。其结果，财政收入增长远不及支出中消费部分的增长。这些同构所造成的消费追逐上升，必然导致财政赤字。同理，经济结构失调能够放大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

应该进一步作分析但很难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如果把农村改革所激发的活力归因于旧体制的解体，而这个解体在县以下又充其量只是股、科级的话，那么，城市经济若想进行类似的变革几乎是不可能的。全国 40 万个大中型企业都有高于股级、科级等的层次，更何况还有一大批依附于或盘踞其上的既得利益阶层。企业改革，对于工人、企业负责人和管理机关的干部来说，是自我革命，自我利益再分配，或称割肉自啖。这显然并非易事。

事实上，农村改革是农民摆脱被剥夺者地位的一场革命。

而城市改革，则是打破长期形成的先赋社会身份获取既得利益的自我革命。惟其如此，面前的危机局面对于城市改革来说才尤其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机会。